

---

# 蘇軾研究

2016 年第 1 期（总第 44 期）

（季 刊）

## 卷首语

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等皆有开创贡献和卓著成就，且在天文、地理、医学、养生、烹调、治墨、酿酒等方面也颇有建树。著名苏学专家，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参观眉山三苏祠时题写了：“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

在这一期杂志中，庆振轩、丁沂璐《千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苏轼与医学文化探论之一》，饶学刚《旷世神品，价值连城——兼论苏东坡书法的最高成就在黄州》，陈建裕《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说略》，陆雪卉《浅析齐鲁酒文化与苏轼命运的交融》等文章分别从医学、书法、科技、饮酒等方面着笔，相信会给大家新的启发。

---

# 苏轼

## 研究 SUSHIYANJIU

2016 年第 1 期（总第 44 期）

（季 刊）



##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张志烈

□副 主 编：周裕锴 方永江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mailto: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  
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 年 3 月

### □苏学论坛

评欧阳修与苏轼的忘年交契 刘尚荣/04

黄庭坚和苏轼手书赤壁词真伪考 王兆鹏/10

千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 庆振轩 丁沂璐/20  
——苏轼与医学文化探论之一

试论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下) 潘殊闲/25

旷世神品，价值连城 饶学刚/30

——兼论苏东坡书法的最高成就在黄州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说略 陈建裕/34

苏轼贬逐期回归自然的因缘与方式 郑秉谦/38

论东坡词中的“孤鸿”意象 艾茂莉 王 斌/41

——以《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为例

浅析齐鲁酒文化与苏轼命运的交融 陆雪卉/45

东坡枯木笔迹禹城沉浮考(上) 夏爱民 赵艳娟/50

——从东坡先生枯木笔迹沉浮看文物兴废

□顾问：李 静 罗佳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卢晓光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

##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十） 徐 康/56  
《龙川略志》译评 胡先酉/58

## □新书评介

笃行：德艺双馨的不懈追求 张志烈/65  
——读方永江《且行：苏祠外仰视》  
我的抗战 方永江/68  
——《且思：苏祠外浅尝》序二

## □本期关注

“苏学”开启新征程 熊 莉/71  
——眉山市 2016 年“寿苏会”纪略

## □研究史话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五） [韩] 洪瑀钦/73

## □苏学专家

冷成金老师教学研究散记 马 蓉 董宇宇/76

## □景苏札记

寻访湖州苏轼遗迹 刘清泉/78

## □苏学动态

“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实践”征文启事 /80  
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袁 丁/80

# 评欧阳修与苏轼的忘年交契

刘尚荣

**内容提要** 欧阳修是苏轼童稚时的偶像，读其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师。嘉祐二年礼部试，欧阳修慧眼识苏文，提拔为论文第二名，虽引起一场风波，亦令科场风气大变。苏轼的成名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引出一桩趣闻。熙宁四年，欧、苏最后一次聚会在颍州，游宴赋诗，谈医论药，引荐诗友，探讨美学，交流“好士”的经验，领会人生的道理，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欧、苏年龄相差三十岁，结为忘年交，两代文宗相继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联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历史上“欧苏”并称，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

**关键词** 欧阳修 苏轼 嘉祐二年 颍州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坛耀眼的双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苏轼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们分别团结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欧、苏两代宗师忘年交契，亦传为佳话。

## 一、大苏总角慕欧公

苏轼自幼聪明伶俐，童蒙时期稍闻欧阳修雅名，便心向往之。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自请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在一篇特意撰写的祭奠欧阳修及其夫人薛氏的文章中追忆说：

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吾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sup>〔1〕1956</sup>

欧、苏首次相见是在嘉祐二年（1057）二月，苏轼时年二十二岁，上溯十五年则为七岁。七岁顽童是如何知道欧阳修的呢？这应感谢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四月作《范文正公文集叙》时，述说了个人成长的烦恼：

庆历三年（1043），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了，则已私识之矣。

〔1〕311

庆历三年的苏轼，虚龄七岁，何谓“人杰”？实难“尽了”，但欧阳修等文坛巨子的大名，已深深印在脑海中，成为他儿时的偶像了。

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试礼部高中进士后，在酬谢主考官阅卷恩师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中，有更详细具体的描述：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sup>〔1〕1385</sup>

苏轼在《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中也讲过类似的话：“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可见苏轼对欧公的仰慕，始自少年时。直言“私识欧公”，“已见其诗”；“昼诵其文，夜梦见之”；“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虽未能深解乡先生所谓“人杰”的含意，却认定欧公乃超凡脱俗，“自乐其乐”的高人。于是，后来苏轼毕生以欧公为师，追随欧公，一脉相传欧公的诗文革新事业并发扬光大之，盖其来有自也。

## 二、初试礼部巧相逢

如前文所述，直到嘉祐二年（1057）初，苏轼才见到了他朝思暮想、崇拜已久的文坛领袖欧阳

修。而他们的初次相逢，也充满了戏剧性。

嘉祐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他的诗友梅尧臣（字圣俞），则充点检试卷官。当时欧阳修等人正在大力倡导“古文”，而“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欧阳）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欧阳修传》）<sup>[2]</sup><sup>10378</sup> 欧阳修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借助于主考官的威势与权利，改革科场积弊，痛击浮华险怪的文风，引领诗文革新运动向纵深发展。

弱冠之年的苏轼携弟苏辙一起应礼部进士试。他自称“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谢梅龙图书》）<sup>[1]</sup><sup>1425</sup> 正由于“不学时文”的另类教育，酿成其与生俱来的些许“野”性，应合了欧公的诗文革新主张。尤其是他在此次应试中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数百份考卷中脱颖而出。先是梅尧臣阅卷时发现了这篇笔力豪骋的政论迥异“时文”，为之叹赏；他推荐给欧阳修审核，欧公也以为文章超尘拔俗，不同凡响。由于考卷封闭了作者姓名，欧公主观认定只有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才写得此等美文，为避嫌未将该文“冠多士”，违心地抑为第二；发榜时方知作者并非曾巩，而是素不相识的眉山苏轼。关于这件事，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专节细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及许多宋人笔记也有精确的述评。

接下来苏轼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sup>[3]</sup>殿试中乙科。据文献记载，与苏轼同榜赐进士及第及同出身者三百八十八人，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家曾巩、苏辙；理学家程颢、张载；政治家刘庠、吕惠卿等。应该说，欧阳修及其同僚通过这次考试为北宋朝廷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各类人才，从而为北宋政权建设及文化学术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这次考试却引发了一场风波。那些崇尚险涩时文的考生不服输，流行已久的“太学体”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事毕，向之器薄者（按，即擅长时文的狂傲考生）伺（欧阳）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看那阵势，似乎要掀起“学潮”，聚众闹事，围攻并恫吓主考官，不惜破坏社会治安。而欧阳修凭借着一股浩然正气，顶住了各种压力和阻力，终令“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而且由于欧阳修的积极推荐，苏轼“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sup>[4]</sup><sup>512</sup> 苏轼与其父洵、弟辙联手，以其行云流水、朴实无华、

清新晓畅的各类散文，征服了广大读者，也令当初的反对者不得不甘拜下风。三苏为古文运动奉献了足以傲视后人、堪与韩柳比美的实绩，体现着欧阳修整治文风的丰硕战果。

这次考试及苏轼成名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欧阳修与苏轼的初次相逢提供了天赐良机，同时也奏出一段众所周知却依然值得回味的小插曲。原来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曾引经据典云：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sup>[1]</sup>

文章写得雄辩而有说服力。可惜欧阳修记不得该典故的出处，梅尧臣也想不起来了。二人遂“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认定其文笔绝妙。揭榜以后，欧公知其作者并非门生曾巩而是二十二岁的苏轼，欣喜之余仍念念不忘文中用典，便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sup>[5]</sup><sup>102</sup> 事后苏轼遵照当时的“行规”登门拜谢主考官，这也是苏轼第一次拜见儿时偶像、文坛巨擘欧阳修。而欧公却平易近人，谦恭地一定要搞清苏轼用典的来龙去脉，于是我们在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见到了如下的精彩描述：

坡（按苏轼后来自号东坡）来谢，欧阳修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关于此事，宋人笔记、诗话相关记载多有异同。其同者，苏轼对于典故出处的自辩之辞，诸家所记均为“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或“意其如此”。其异者，欧阳修等人对于苏轼诡辩的反应，赵令畤《侯鯖录》卷七的记载是：“数公大笑。”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的描述是：“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而《打虱新话》记载略同于《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则说：“（欧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只有杨万里的上述记载最为详尽具体。

苏轼不愧为才子，而且年轻气盛。当他在答卷

中因辨析刑赏遇到困难时，竟敢“想当然”地编造“名人名言”，并用作强有力的论据，实在有些顽皮。岂不知“小把戏”被揭穿后，主考官欧阳修也陷入了被考生戏谑的尴尬中。因此欧公或“大笑”，或“大惊”，或“太息”，都属于意外受窘的正常情态，不足为奇。可贵的是欧阳修并未丧失理智。纵观欧公对苏轼的态度，有几点值得玩味。首先，欧公遇有出处不明的“典故”，偏要寻根究底，不耻下问，显示出他在学术上一贯的谦虚谨慎、好学深思。其次，在苏轼不得不招认杜撰事典后，欧公没有认可其做法之合理性，表明他在学术上依然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再次，欧公对苏轼没有严厉批评，而是正面引导，还委婉赞许其“善读书，善用书”，仍夸奖《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风豪迈雄俊，体现了欧公对后学晚辈惯有的呵护备至。最后，又鼓励苏轼说：“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预祝这位青年学子前途远大。欧阳修的宽弘大度而又用心良苦，胸怀坦荡而又循循善诱，令苏轼终生难忘，亦堪称宿儒、教师的榜样。

后来，欧阳修又引荐苏轼拜识韩琦、富弼等文坛名家、政界高官，他们亦“皆以国士待轼”。<sup>〔1〕 311</sup>当梅尧臣接到苏轼的《上梅直讲书》后，不仅立即作答，而且将来书与答书一并呈欧阳修寓目。欧公在嘉祐二年春作《与梅圣俞书》云：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sup>〔4〕 2459</sup>

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先是赞叹欧阳修“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已见上述，接着又说：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按，此指梅尧臣）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饶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

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sup>〔1〕 1385</sup>

苏轼通过梅尧臣向欧阳修表达的不仅是对两位大师的仰慕与知遇之感，还有关于“乐道”的独到见解。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孔子既有“大道”而“天下莫能容”，然“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遂足以为乐。对比于梅尧臣的“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待遇不公而安贫乐道，“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殆因亦有天下贤良为伍也。年轻的苏轼能够领会崇高思想境界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以结识贤达为梦寐以求的乐事，这让欧阳修感到欣慰，乃至连呼“快哉”，连称“可喜”，还放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豪言。得到欧公的赏识，苏轼非常感动，并因此而终生受益，念念不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与欧公初次相逢并总结此事对他的影响时，满怀深情地说：

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sup>〔1〕</sup>

1979

欧阳修善于发现和精心培养“接班人”。他奖掖后进，扶植青年，甘愿做“人梯”，为新人“让路”。其明智的举措与高尚的人格，九百五十年来一直为文人津津乐道。他永远给智者启迪，让庸人警醒。

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栽培与期望，他为了追随欧阳修把诗文革新运动进行到底，奉献了全部的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他的名字永远与欧阳修的提携与“避路”不能分离。在文学史上“欧苏”并举成为北宋“古文”鼎盛标记，也成为传统文化中精英相继的典范。

### 三、颍州欢聚富诗意

自嘉祐二年礼部试后，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从未间断过，而且持续地有新收获。甚至在欧公辞世后，苏轼仍同欧公后人保持着友好往来。然则当历



史的长镜头摇向北宋的颍州小郡聚焦探寻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文坛泰斗欧阳修与其后辈巨星苏轼，历尽艰辛备尝甘苦后，以他们不朽的诗文业绩，在这里实现了最后一次“会师”。

熙宁四年(1071)春末夏初，欧阳修连呈三“表”力请辞官退休，六月十一日获准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他选择颍州为养老的“福地”。苏轼当即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祝这位“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代之师”的老前辈得以“明哲保身”；并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再次感戴恩师。与此同时，苏轼主动放弃了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的显要官职，坚乞外补而终得除杭州倅。这年七月苏轼离京赴杭，途经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先去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苏辙，兄弟相聚七十余日。然后苏辙陪同苏轼，专程拜谒了致仕归颖的欧阳修，陪同这位乍卸公职稍嫌孤寂的恩师，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众所周知，早在北宋皇祐元年（1049）三月至次年七月，欧阳修就曾自请出知颍州，此后又有短期居颖与长久思颖及退休后归颖的阅历，为此留下大量知颖、思颖的诗词，后来他还特地撰写过《思颖诗后序》及《续思颖诗序》。<sup>[1] 600、604</sup>无独有偶，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次年三月，也曾自请出知颍州，同样留下不少知颖及日后思颖之什。半个世纪内，欧苏两代宗师虽不同时，却被同一个颍州所吸引，并都用上百篇诗词歌唱颍州、神往颍州，此非巧合，实因颍州魅力独在。颍州治所即今安徽阜阳，当时处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通往江南的要冲，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曾使它成为文人骚客向往之地。欧苏的知颖、思颖之什，客观记述了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与交游，真实描绘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永远铭刻着他们在此地曾有的德政（如兴修水利等）。这是他们留给颍州百姓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容抹煞的光辉一页。

颍州西湖是欧公的最爱。早在皇祐初知颖时，他就写过《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西湖泛舟》、《西湖戏作》等诗寄友人或示同游者。<sup>[4] 188、801、193</sup>又有《西湖念语》及《采桑子》连章组词十首赞美西湖风光。<sup>[4] 2056、1991</sup>致仕归颖又写了《初夏西湖》等诗词。<sup>[4] 831</sup>此番苏轼兄弟来访，欧公当即在西湖边开宴，大苏、小苏陪侍，遂亦有诗。苏轼在《陪欧阳公燕西湖》诗中吟道：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揭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  
 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  
 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  
 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  
 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  
 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箏。<sup>[6] 275</sup>

容光焕发的欧公，面对着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难以掩饰满怀的豪情。当双方谈及新法初施的时局时，未免言辞激烈；而当换到寿夭神俗的话题时，又平添了乐往哀来的感慨。苏轼晚年回忆这次所见到的欧公形象是：“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此可印证上述苏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公言百岁如风狂”，“已将寿夭付天公”，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苏辙亦有《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诗，赞美“西湖草木公所种，仁人实使甘棠重。归来筑室傍湖东，胜游还与邦人共”。<sup>[7] 57</sup>写得真切朴实。

欧公蓄有石制屏风，他让苏轼苏辙以此为题各作一首咏物诗。苏辙的《欧阳公所蓄石屏》诗，亦载于《栾城集》卷三，写得清淡无奇，诗如其人。而苏轼却极其用心地将《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写得气势恢弘，想像奇特：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sup>[6] 277</sup>

欧阳修的石屏乃庆历八年（1048）友人所赠：“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欧公以为这是“古所未有”之“奇物”，又请画工在石上加工刻画怪松图案，“其树横生，一枝外出”。他写了《月石砚屏歌》寄苏子美，并作《序》记述此石屏之“奇”。<sup>[4] 63、951</sup>当年苏子美、梅圣俞都有诗唱和，欧公诗文雅趣盎然，充满哲理。二十四年后苏轼用同样题材为诗，则别具一格，有意创新。

紫石上的天然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视之如枝叶老劲而横生的月下怪松，苏轼则将之比作孤烟落日、崖崩涧绝的山景，并把它和家乡峨眉山西雪岭确实存在的孤松串连起来，遂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了。石屏来自虢州（见欧阳修《月石砚屏歌序》），苏轼突发奇想，说唐代擅长画松的高手有毕宏和韦偃，恐怕这两位画家死后葬于虢山下，其“骨可朽烂”而画未已，故其“心难穷”，灵感触发了“神机妙思”，遂在石屏上展现出烟云霏微、雪岭怪松的奇妙影像。将石屏图景设计为毕、韦二人精魂所化，纯属诗人的驰骋想像，借事生波；然又不觉突兀，入情合理。画家与诗人在艺术上是相通的。于是苏轼在诗的结尾又奉劝石屏的主人恩师欧阳修，再写诗好慰藉二位画师孤愤不遇的神灵。这篇杂言体的古风，充满浪漫主义情调，是形象思维的成功范例。诗人为自由抒发思想感情而改变惯用写法，突破格律拘束，诚如清人汪师韩所说：“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诗自一言至九言，皆源于‘三百篇’，此诗‘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从古诗人所无也”。<sup>[8]</sup>

<sup>1817</sup> 苏轼以七言为主，间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的超长句式和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制，为宋代“以文为诗”做示范，也为诗文革新作新的尝试。不妨说这是欧公对苏轼诗才的最后一次“测试”，而苏轼也交出了足以令欧公欣慰的答卷，从而也为欧、苏的颍州团聚、诗人相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诗情画意让两代人心旷神怡，息息相通。

#### 四、忘年之交乐融融

欧阳修与苏轼既存师生之谊，也具文友之情。他们年龄相差三十岁，却能结为忘年交。通过真诚坦率的交游，实现了优势互补，彼此受益，自然苏轼受惠更多。这里仍从熙宁四年欧、苏颍州聚会二十来天的其他活动安排中，摘举数事稍加考述。

首先，鉴于苏轼即将通守杭州，欧阳修遂向他举荐了自己的诗友西湖僧惠勤，使苏轼与惠勤相识进而相知。苏轼在《六一泉铭并叙》中有过记述：

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钱塘，见公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间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

下，抵掌而论人物。曰：“（欧）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勤语虽幻怪，而理有实然者。明年，公薨，予哭于勤舍。<sup>[1] 565</sup>

应该指出的是，欧公与惠勤的交游纯属以诗会友，双方都无功利目的。经过一段直接接触，苏轼也感觉到惠勤确实是“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十八年后当苏轼再度南来知杭州时，惠勤也已仙逝。但在当年苏轼与惠勤相聚的旧舍讲堂之后，突然冒出一眼“甚白而甘”的泉水，苏轼便命名为“六一泉”，并撰铭文与叙，希望再现欧公的遗风余烈以警示后人。

其次，欧阳修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言谈举止感染苏轼，期盼他也以奖掖贤士为乐。苏轼在为惠勤所作《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

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sup>[1] 321</sup>

欧阳修举贤好士，苏轼是受益者和见证人。他耳闻目睹了欧公“不远千里”求道于贤士的壮举，为其“尽致天下豪俊”而庆幸，也为某些士人知恩不报反而背叛欧公的行为而气愤，遂臆测欧公暮年举贤才的热情将因偶遇挫折而锐减。岂料归颖退休的欧公仍想利用个人的声誉和影响力，为天下贤士铺路架桥，助其显达扬名，“唯恐其不闻于世”。至于个别人辜负他，背叛他，欧公仍虚怀若谷地说：“罪在我，非其过。”首先检讨自己。这是何等的器量！于是苏轼想起了汉文帝时的廷尉翟公，在位时宾客盈门，罢职后门外可设雀罗；光复原职后宾客又来投奔，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sup>[9]</sup> 苏轼认为欧公贤于翟公，气度就是衡量的标准。



这一点对于今后还要经历仕途坎坷的苏轼，极有借鉴价值。

再次，欧、苏共论文同诗，探讨美学，各有高论。《续墨客挥犀》卷四《与可诗精绝》云：

东坡尝对欧阳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

《冷斋夜话》卷一《东坡论文与可诗》也有相似的记载。今人孔凡礼考订，“或为此时事”，见《苏轼年谱》卷十。按文与可（1018～1079）名同，北宋画家、文学家，擅画墨竹，诗文亦佳。苏轼称道的那两句诗，见于文同《秦王卷衣》怀古篇。唐人王建《调笑令》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那是形容美人娇柔憔悴的病态美。文同笔下的美人则是容光焕发，无需以扇遮面，反而大胆地抛头露面地坐在庭院中，因为她自信其美貌足以令百花羞愧而纷纷坠落。在文同诗中，美人却扇是写实，花羞自落是虚构，虚实结合显示出诗人独到的视角与合理的想像，以花衬人，对比鲜明，确属佳句。欧公谓“与可拾得耳”，也正是感叹这清新自然的诗句，在“胸有成竹”的画家文同，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朴实的语言，幽美的意境，是欧、苏两代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可谓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一点通。

最后让我们回味欧、苏闲情逸致，谈医论药的异闻趣事。欧阳修在熙宁元年（1068）知青州时，道人徐问真从潍州来，游久乃去。熙宁四年欧公致仕归颖，徐问真又来投奔。据说徐问真“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神验”。欧公足病难愈，徐问真“教公汲取，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苏轼明言是在汝阴（即颍州）“见公，具言如此”。后来苏轼贬官黄州，“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腿病（脚浮肿）”，苏轼便用欧公转告的徐问真口诀为其疗治，“七日而愈”。于是也叹徐氏乃异人。徐问真当年是匆忙而神异地辞别欧公的，后亦不知所终。而当元祐六年苏轼自请知颖，得与欧公之子欧阳棐（叔弼）及辩（季默）重逢后，追怀熙宁旧事遂详记之。<sup>〔1〕 2318</sup>

又有一次，欧阳修与苏轼笑谈医者以意用药事。欧公说起有位“乘船遇风”、受惊吓而患晕船症的人，医生遂“取多年桅牙为施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按《本草注》

引《药性论》曰：“止汗用麻黄根及故竹扇末服之。”对医药学并无深入研究的欧阳修随口说道：“医以意用药，多如此。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关注医学，今有《苏沈良方》可为证。他不太相信医者以意用药的偏方，便借题发挥，故作荒诞推理，对欧公说：

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馐馐，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sup>〔1〕 2323</sup>

话音未落，便把欧阳修逗得开怀大笑。这是苏轼元祐六年赴颍州途中，舟行将入颍州界，想起熙宁四年与欧公团聚的趣事，特意追记下来的。

欧阳修与苏轼在熙宁四年秋的颍州欢聚，不仅仅是宴聚赋诗传佳作，在待人接物举贤任能的教诲中，在诗歌创作美学理论的探讨中，在求医问药治病救人的闲话中，在妄年之交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中，欧阳修自然而然地把诗文革新的接力棒传给了苏轼，同时也传给他许多宝贵的人生体验，这些都成为苏轼日后昂首阔步于文坛、奋力挣扎于仕途的精神财富，既给苏轼留下美好记忆，也给今人以启迪。

#### 注释：

-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2]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 [3] 参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南省讲三传》及文题下郎晔注。
- [4] 李逸安校点《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 [5] 陆游著《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
- [6]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7]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 [8]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 [9] 参见《苏舜钦集》卷五《永叔石月屏图》；《宛陵先生集》卷三三《咏欧阳永叔石砚屏》二首。

刘尚荣，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

# 黄庭坚和苏轼手书赤壁词真伪考

王兆鹏

**内容提要**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1087）黄庭坚行书赤壁词，自南宋以来，既有原书真迹传世，也有石刻拓本流传，传承有序，源流清晰。今存山谷行书赤壁词石刻及其拓本，虽然不一定是山谷手书的真迹，却是可信的文本。东坡草书赤壁词的传藏经过，不如山谷行书赤壁词那样历历可考，只知明嘉靖以前已有石刻。与山谷行书赤壁词互证，东坡草书赤壁词的文本有可信度，即便字不一定是苏轼所写真迹，内容应是苏轼所作。山谷和东坡所书两种赤壁词，是现存最早最接近东坡赤壁词原作的文本，可据以校正诸本异文的正误得失：其中“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应作“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强虏”是南宋人所改，藉以影射金人。

**关键词** 黄庭坚行书 苏轼草书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词 石刻

苏轼经典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简称赤壁词）的异文颇多，读者难辨哪种文本是苏轼的原作。按理说，苏轼草书赤壁词石刻，应是赤壁词最早也是最可信的文本，然因有人怀疑苏轼草书赤壁词是伪作<sup>[1]</sup>，故不被人信据。无独有偶，黄庭坚的行书赤壁词，一则由于知见者少，二则也被人怀疑是“伪迹”<sup>[1][2]</sup>，同样不受重视<sup>[3]</sup>。近日得见有关刊物和网络披载的黄庭坚行书赤壁词石刻和拓本照片（见图1、图2）后<sup>[4] 78~79</sup>，觉得苏、黄这两种书法作品，是赤壁词传播历程中值得珍视的文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兹对这两种文本的来源、真伪和价值作一考释，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讨。



图1 山东武氏祠所藏山谷行书赤壁词石刻原碑照片（来源于网络）



图2 山东武氏祠所藏山谷行书赤壁词拓本（照片来源于网络）

## 一、黄庭坚行书赤壁词的传存源流

为便于后文比较，兹先考黄庭坚所书赤壁词的传存源流及其真伪。

黄庭坚所书赤壁词，最初为其门人元不伐收藏<sup>[5]</sup>。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载：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sup>[6] 317</sup>。

虽然洪迈不知黄庭坚所书赤壁词的下落，但其友人向巨原却见过元不伐藏本<sup>[7]</sup>，不然向氏就不会知道山谷所书赤壁词与当时流行之本在文字上的差异。洪迈的记载，至少表明山谷所书赤壁词在南宋初期尚为人收藏。<sup>[8] 273</sup>

宋末元初，赵孟頫曾见过黄庭坚所书赤壁词，曾仿其笔意自书一本。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就著录有赵孟頫行书“《大江东去》，依鲁直书”<sup>[9]</sup>。鲁直所书赤壁词是行书，赵孟頫也是行书。所谓“依鲁直书”，是仿黄庭坚的笔意而书。显然赵孟頫是见过或藏有山谷行书本，故能



仿作。

至明代，山谷行书赤壁词卷，一度为权臣严嵩所有，后归书画鉴藏名家、长洲人韩世能（字存良）<sup>(10)</sup>。张丑《清河书画舫》曰：

（黄庭坚）元祐丁卯岁行书《大江东去》词，全仿《瘞鹤铭》法。后附《次韵子瞻题郭熙秋山图》诗，小楷精紧。右帖高头长卷，颇属合作，惜纸墨不甚称耳。今在韩太史存良家，余屡欲购之亦未得。本严分宜故物也。<sup>(11)</sup>

韩世能家藏、张丑欲购而不得之本，应是黄庭坚的法书真迹，因为法书真迹名贵，而纸墨不理想，故张丑惜其“纸墨不称”。若是据石刻拓印之本，似不会以“纸墨不称”为憾。如果不是相当珍贵的墨迹，也不会被著名的书画鉴藏家韩世能家人如此珍爱而不愿出售<sup>(12)</sup>。后来的石刻拓印本词末所附小楷《次韵子瞻题郭熙秋山图》诗字迹模糊不清（详后），而此本词末所附小楷却相当清晰，故张丑有“精紧”之评。张丑（1577~1643）《清河书画舫》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sup>(13)</sup> 965，则书中所言“今在韩太史存良家”之“今”，时当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即是说，山谷行书赤壁词原本，明万历年间尚存于世。

黄庭坚行书赤壁词卷，原为严嵩“故物”，后来如何为韩世能所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原委：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sup>(14)</sup> 211

原来严嵩所藏书画被籍没入内府，穆宗隆庆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低价出售，多为朱希忠所得，朱氏转赠张居正，张居正卒后被籍没入官。后被掌库宦官盗出售之，韩世能等争相购藏，“所蓄皆精绝”。山谷行书赤壁词卷，当是其中之一。

与韩世能（1528~1598）同时的詹景凤（1532~1602）曾寓目韩世能藏本，并跋曰：

韩敬老收山谷书坡翁《大江东词》，字如拳大，鹤膝蜂腰，怪怪奇奇，笔若骨消，了无肌肉，后自题叙乃七言古诗，笔滋墨腴，秀润雅畅，字如《圣教序》大。观题叙诗，乃知坡公大江东词以题郭熙山水而作。<sup>(15)</sup> 32

韩敬老即韩世能，因其号敬堂，故称。詹景凤所叙，与前述张丑著录韩本相同。其中谓山谷所书词卷“字如拳大，鹤膝蜂腰，怪怪奇奇”，正与今传山谷赤壁词石刻本相合（详后），盖山谷所书，行、楷、大草相间，确乎有些怪怪奇奇。詹氏所见，显然是写本原卷，而非拓印本，写本

字迹清晰，故能见词后所附七言古诗小楷有“笔滋墨腴，秀润雅畅”之妙。

同时的王世贞（1526~1590），也曾见《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帖》，并跋云：

铜将军铁著板唱“大江东去”，固也。然其词跌宕感慨，有王处仲挝鼓意气，傍若无人。鲁直书莽莽，亦足相发磊块。时阅之，以当阮公数斗酒。<sup>(16)</sup>

王世贞认为，山谷所书与东坡原词，相得益彰，足以相互发抒胸中块磊。其所题帖本，应为真迹，然是否为韩世能家藏本而题，则不敢臆断。

世贞之后，孙矿（1543~1613）藏有一拓本，并在王世贞跋的基础上再跋《山谷书大江东去词》：

苏此词、黄此书，俱非雅品，非当行，而皆磊落自肆，正是一派。真足当阮公数斗酒。余有此旧本，而失却首幅，不知刻石在何所，愧无从觅补。<sup>(17)</sup>

孙氏的题跋，提供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有山谷手书赤壁词的“旧本”；二是旧本由数幅组成，他失去了“首幅”；三是想据石刻校补，却不知原碑在何处，故无从补之。当时山谷手书赤壁词应有石刻，并有拓印本传世，只是孙氏不知石碑藏于何处而已。

明盛时泰（1529~1578）《苍润轩碑跋纪》也著录有《宋黄鲁直行书大江东去词》：

右后有跋，已模糊。涪翁此书，不如“缺月挂疏桐”。

(18) 73

盛氏未明言所见山谷行书赤壁词是石碑，还是拓本。从其书题跋的都是碑本来推断，盛氏所言不会是真迹写本，而是拓本。其所见本词后跋文“已模糊”不清，这与前述韩世能藏写本词后所附文字清晰可认形成鲜明对照。韩本是原写本，字画清晰，故知词后所附是小楷书写的山谷本人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秋山图》诗，而非跋语。盛氏所见拓印墨本词后所附文字模糊不清，故笼统地说“词后有跋”。今存石刻及相关拓印本，词后所附文字依然模糊不清（见图3）。盛氏《苍润轩碑跋纪》前有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自序，其成书即在此前后。盛氏此跋再次表明，嘉靖年间已有山谷行书赤壁词石刻拓本流传。



图3 山谷行书赤壁词末幅（1930年日本东京美术书院影印本）

晚明董其昌(1555~1636)也见过山谷所书赤壁词本,并仿米芾书意自书一本。董氏自识云:

山谷尝以本家笔书东坡赤壁词,余以米海岳书意为之。米尝自谓“名在苏轼、黄庭坚之间,不入党与”。然坡公所作《韩魏公赞》。余见米迹,尝亦书此词,恨世无传耳。<sup>[19]</sup>

董其昌谓黄庭坚以自家笔法书写赤壁词,他则以米芾的笔法书写之。可见董氏也熟知山谷所书赤壁词。董氏又谓曾见过米芾所书赤壁词真迹,可惜世无传本。与董其昌同时而稍晚的高濂(1573~1620)和汪珂玉(1587~?),也曾分别著录黄庭坚《大江东去词》和《书东坡大江东去帖》。<sup>[20]</sup>

至清代,山谷行书赤壁词仍有传本。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就著录有“黄鲁直书大江东去词,行书(原词不录)”。<sup>[21]</sup>他特地注明“原词不录”,显然是亲见其本,因原词是名篇,故未录原文。不录原文,甚是遗憾,如录有原文,我们就可以藉此比勘异文和辨识其源流。

雍正七年(1729),李光燾撰《金石文考略》,也曾述及山谷所书诗词:

米元章曾讥黄鲁直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观之,信然。如“缺月疏桐”之横放,《晚登快阁》之清劲,《大江东去》之转折,则又种种臻妙。<sup>[22]</sup>

李氏是得到朱彝尊所藏金石碑刻后,“哀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写成《金石文考略》<sup>[23] 742</sup>,所言山谷书赤壁词,或为其收藏之本,至少他是见过其本,故称其书法多“转折”而“臻妙”。

令人称奇的是,山谷手书赤壁词真迹,已然传至近代。近人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四著录并考释云:

宋黄山谷书东坡大江东词卷,麻纸,色黄,高工尺九寸三分,四纸,长一丈六寸,无昔人藏印,殆割去也。每行三四字,楷行大草相间,卷尾用“黄氏庭坚”朱文、“山谷道人”白文二印。弇州山人跋已失去。

大江东(原注:去、浪损)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庭坚书。

……是卷既载《年谱》,屡见前人著录,诚炫赫有名之迹。公至晚岁,恒眷眷于元祐间书,自谓不工。公自谓不工者,正后人之所谓工也。余所藏公大书《发愿文》、《观音》、《烧香》二赞、《华严疏》,以此卷校之,皆公五十后书。而元祐间唯《砥柱铭》一种健拔少顿挫,不及此卷远矣。此卷杂以大草,原出藏真,自叙直同草篆,其楷法又出入《兰亭》《鹤铭》之间,时以顿挫取妍媚,足与坡仙妙词并峙千古。青父(鵬按,指张丑)谓“纸墨不称”,尚非笃论。此乃唐代冷金麻笺,与他宋纸白净不同。映日照视,其波拂勾勒墨晕,浓淡轻重毕见,迥非钩填能至。不得

谓纸色黝暗,遂以“不称”目之。此词久有刻本。己未九月,吾乡李姓常卖铺持来求售,装潢倒置,而索价颇昂,余一见惊叹,磋磨久之,始肯割让。此亦鲁直元祐间一钜迹也。为之狂喜,即寄吴门,付良工装池并影照刊入《壮陶阁帖》,以垂不朽。景福识于蚌滨。<sup>[24] 119~120</sup>

裴氏对山谷行书赤壁词卷的纸色、尺寸、印记及购藏经过,言之甚明。此本显为山谷手书真迹,从明人韩世能家流出后,至晚清入裴氏同乡李姓常卖铺,民国八年己未(1919)为裴景福购得。原件如今不知藏在何处,幸而裴氏将山谷手书真迹影刊入《壮陶阁续帖》中,我们尚可窥其原貌。

如今能见到的山谷行书赤壁词,有四种:一为民国十一年(1922)裴景福刊《壮陶阁续帖》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金石组有藏),二为日本昭和四年(1930)东京美术书院影印的石刻拓本,三为山东嘉祥县武氏祠藏石刻,四为江西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九曲回廊石刻(依《壮陶阁续帖》本上石)。

## 二、山谷行书赤壁词的真伪

由上文所考,可知山谷行书赤壁词传承有序,源流清晰。宋代以来,既有原书真迹传世,也有石刻拓本流传。自明清至近代,迭经书法家、鉴藏家收藏题跋,无一怀疑是伪作。只是到了当代,才有人疑为“伪迹”。如水赉佑《黄庭坚伪迹考叙》直接将《壮陶阁续帖》本黄庭坚行书《东坡大江东去词》列作“伪迹”,但未说明理据。

书法作品的“真伪”,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书法层面的真伪,二是文本层面的真伪。书法层面的真伪,追问的是“字迹”是不是书法家亲笔所书,是否跟书法家的真迹一致。如果是据书法家的真迹入石与拓印,即为真;如果是据真迹临摹、仿作甚或是杜撰,即为伪。文本层面的真伪,追问的是文字内容是否跟书法家手书原件的文本相同,只要是据原件临摹、仿作而没有改变原作的文字内容结构,即可视为真实可信。如同判断一部古书的真伪,也是涉及版本和内容两个层面。若不考虑版本因素,只要内容和结构没有改变,即便不是初刻本、原刻本而是重刻本、翻刻本、修补本、影抄本或传抄本,我们都视为一部真实可信之书。如果是鉴定版本的真伪,那就要考虑是原刻本还是翻刻本或重编本了。

从书法层面看,今传《壮陶阁续帖》本、山东武氏祠所存山谷赤壁词石刻,也许不是山谷行书的真迹。<sup>[25]</sup>但从文本内容层面看,《壮陶阁续帖》本、东京美术书院印本、山东所存石刻和江西修水石刻,都是据山谷行书赤壁词真迹临摹或仿写,字形可能有些失真走样<sup>[26]</sup>,内容却完全可信。如同一部古书,虽然它不是作者的手稿本,也不是原刻本、初印本,而是重刻本、影抄本,也依然是一部真实可信之书。

且以山东所存山谷行书赤壁词石刻为例,来说明其文字内容的可信。

其一，石刻与裴氏所藏真迹原卷的篇幅、行款、字体相同。

山东赤壁词石刻，据网传照片，原石长360厘米，宽(高)35厘米(见图1)，而前述裴氏所藏真迹纸卷长一丈六寸(合353.3厘米)，高九寸三分(约31厘米)。二者的篇幅尺寸基本相同。原石略大于纸卷，自属合理。

纸卷有四幅纸，而石刻亦由四幅碑石组成，二者又完全一致。

原卷“每行三四字，楷行大草相间”，石刻也是每行三四字，楷、行、大草相间(见图2)。行款、字体又完全相同。

其二，石刻的文字内容与裴氏所藏真迹纸卷完全相同。纸卷录文已见上引，石刻原文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东坡赤壁词的异文颇多，而石刻的文字与真迹纸卷的文字完全一样(纸卷中“去浪”二字缺损，另当别论)，特别是异文也完全相同，如通行本的“谈笑间”，石刻与纸卷俱作“笑谈间”；通行本的“人生如梦”，此二本均作“人间如梦”。

无论是从篇幅大小、行款字体等外在形式看，还是从文字内容看，今存山谷行书赤壁词石刻及其拓本都是真实的文本，完全可以信据，我们可以怀疑它不是山谷手书的真迹，但不应否认是山谷书写的文本。

### 三、苏轼草书赤壁词的真伪

考定了山谷行书赤壁词文本的真实性，再来讨论东坡草书赤壁词的可信度。

东坡草书赤壁词的传藏经过，远不如山谷行书赤壁词那样历历可考。所幸的是，东坡草书赤壁词，今有两处石刻：一在湖北黄州赤壁公园的坡仙亭，一在山西太原郝庄村双塔寺(又名永祚寺)。

太原石刻(见图4)，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西巡抚鄂弼依家藏旧拓摹勒，<sup>〔7〕</sup>碑有篆书题名《苏长公大江东词》，词作原文为：



图4 太原双塔寺藏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照片(王洁提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

词后有鄂弼题跋：

右东坡先生自书“大江东”词，乃醉后神到之笔，余家藏旧拓也。词与书并挟英伟劲杰之气，雅类其为人。余爱而重之，因复钩摹勒石，以广所传。按先生脱御史台狱，谪黄州团练副史，前后《赤壁》二赋，成于迁所。此词寄托略同，应亦是时所作。观其淋漓杯酒，意兴遄飞，伸纸挥毫，盎然天趣，非见道深而胸无块垒者能之乎？吁，信可爱而重也矣！乾隆二十有七年壬午仲夏西林鄂弼跋(后有“鄂弼”、“竹间居士”二印)。

黄州赤壁公园坡仙亭内共藏有东坡手书四首词的石刻，除赤壁词外，另三首词的石刻分别是：署“元祐六年



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满庭芳》（归去来兮），“东坡居士书”《临江仙》（九十日春光过了），“绍圣二年重九日眉山苏轼书”《行香子》（清夜无尘）。赤壁词原文和词末苏轼自跋（见图5），与太原石刻全同。据近人汪荣考订，以上“四词共石八方，明郭凤仪重摹，经兵燹残破，仅遗数片于雪堂。清同治戊辰，又复翻刻”<sup>〔28〕 301</sup>。可知黄州所藏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原由明人郭凤仪据旧石重摹，至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又经翻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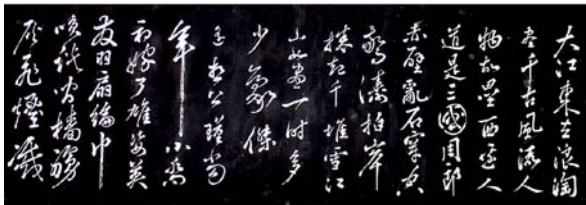


图5 黄州藏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照片（赤壁公园周慧敏提供）

按，郭凤仪，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后任黄州知府<sup>〔29〕</sup>。其重摹东坡草书赤壁词，即在此期间。虽知郭氏是据旧刻“重摹”，但旧刻又是从何而来，已无从知晓。

上海有正书局1918年影印刘黻抱残守阙斋藏本《宋拓苏长公雪堂帖》中有《苏长公大江东词》，词作原文及东坡自跋都与黄州石刻一致<sup>〔30〕 2570</sup>，唯行款和字形略有不同。将《雪堂帖》和黄州石刻、太原石刻东坡草书赤壁词相较，《雪堂帖》的行款和字形更接近太原石刻，而与黄州石刻差异较大。如《雪堂帖》首幅有篆书“苏长公大江东词”题目，太原石刻亦同。《雪堂帖》词末东坡自跋文字，写作八行：“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见图6）太原石刻亦与此同（见图4）。而黄州石刻词后自跋作六行：“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见图5）是《雪堂帖》与太原石刻为同一来源，而黄州石刻则据别本上石。

《雪堂帖》虽名为“宋拓”，但宋元明清书画著作未见著录，是否确为“宋拓”，尚无文献可征。故《宋拓苏长公雪堂帖》还不足以证明今传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是“宋拓”，也无法证明是东坡真迹。

苏轼是否草书过赤壁词，文献记载不详。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有则记载，可间接提供一点历史信息：

淮东将领王智夫言，尝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檣櫓灰飞烟灭”，知后人讹为“强虏”。仆考《周瑜传》，黄盖烧曹公船时

风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知“檣櫓”为信然。<sup>〔31〕 273</sup>

王智夫，字愚可，仙居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sup>〔32〕 7547</sup>。其所言，当有一定可信度。唯将《念奴娇》误作《水调》，不知是王智夫的口误，还是王楙的笔误。我们关注的是“尝见东坡亲染所制”云云。所谓“东坡亲染”，当然是指东坡亲笔所书。这表明东坡确曾书写过赤壁词。只是不知王智夫所见，是东坡的原手稿，还是后来所书，更不知是否为今传的草书。王智夫又谓“谈笑处”，或许是其误记，就像他把《念奴娇》记成《水调》一样，也把“笑谈间”（或“谈笑间”）记成“谈笑处”了。

元人刘沔曾慨叹无法得到东坡自书的赤壁词。其《跋文信公和东坡赤壁词后》曰：“坡公此词，妙绝百代，然恨鲜得其所自书者。信国文公所和，雄词直气不相上下，而真迹流落如新，尤可谓二美具矣。”<sup>〔33〕</sup>刘氏见到文天祥自书的和赤壁词手迹后，遗憾不能见到东坡“自书”的赤壁词真迹，可见元人也罕见东坡自书的赤壁词。

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我们不能像确定山谷行书赤壁词那样，对东坡草书赤壁词的真实性作出确切的判断。我们现在能明确的是，明嘉靖以前，东坡草书赤壁词已有石刻。孤立地看，东坡草书赤壁词，来历的确有些不明，特别是明代以前未见有明确记载。但与山谷行书赤壁词互证，东坡草书赤壁词的文本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即是说，今传东坡草书赤壁词的字不一定是苏轼的真迹，但文本内容应是苏轼所作，不应是后人伪造<sup>〔34〕</sup>。理由是：

东坡赤壁词在历代传本中有多种异文（详后），唯独这份草书赤壁词石刻文本与山谷行书赤壁词文本高度一致，只有“人间”和“人生”一字之差。特别是南宋以来各本无一例外的“谈笑间”，唯有东坡草书和山谷行书赤壁词是作“笑谈间”。这不应该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二者同出一源。如果草书赤壁词是后人伪造的文本，其文字内容只可能依据南宋以后通行的文本来书写，而不大可能与传本甚罕的山谷行书赤壁词的文本暗合。合理的解释是，东坡草书赤壁词，是东坡本人所写，山谷是依据东坡本人所录示的文本书写，故两个手书文本高度一致。山谷行书赤壁词的文本既然真实可信，那么，东坡草书赤壁词的文本也具有可信度。即令东坡草书赤壁词的字迹是后人仿作或伪造，其文字内容也应是东坡本人的原作，具有可信度。

#### 四、山谷行书和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的文献校勘价值

既考明山谷行书和东坡草书赤壁词石刻之可信，再来讨论其文献价值。要说明其文献价值，先需了解宋人文献传录东坡赤壁词的情况。

东坡词集，北宋已无刻本传世，其详不得而知。今知最早的苏词刻本是南宋初高宗绍兴年间刊行的二种版本。一为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曾慥辑刻的《东坡词》，此本原刻已佚，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和明紫芝漫抄《宋元明家词》本《东坡词》二卷补遗一卷均从曾刻本抄出<sup>〔35〕 171</sup>，尚存其貌。二是“绍兴初”“镂板钱塘”的傅干



《注坡词》<sup>〔36〕〔39〕</sup>，此本原刻亦佚，今传有几种清钞本。这二种东坡词集都收有赤壁词。

词集之外，南宋的诗话和词选也有载录和入选东坡赤壁词的，如成书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就录有赤壁词原文。理宗淳祐九年己酉（1249）成书的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也选录了赤壁词。宁宗庆元元年（1195）以前成书的词选《草堂诗余》，原刊本虽不传，但有元至正三年癸未（1343）庐陵泰字书堂刊本（存前集二卷）、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双壁陈氏刊本和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遵正书堂刊本，题作《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此书后集卷上亦选录了赤壁词。

南宋人的其他著述，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曾季狸《艇斋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六、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五等都提及东坡赤壁词中“三国周郎赤壁”、“檣櫓灰飞烟灭”等词句，但未录全词。

综上所述，载录有东坡赤壁词全文的，都是南宋以后的文献。只有山谷行书和苏轼草书赤壁词，是北宋的文本。其中山谷行书赤壁词，作于哲宗元祐二年丁卯（1087）。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云：

《黄鲁直年谱》载：元祐丁卯岁行书《大江东去》词，全仿《瘞鹤铭》法。<sup>〔37〕</sup>

张氏所言《黄鲁直年谱》，不知何人所撰。查南宋黄蓍《山谷年谱》，未载述其事。元祐二年（1087），山谷在京城秘书省任职，与同在京城的苏轼往来密切，唱和频繁<sup>〔38〕 185~203</sup>，得到苏轼所示赤壁词原作并手书其词，自属可能。张丑所引《年谱》，当有所据。近人裴景福也认同张丑的记载，订为元祐间作品（见前引《壮陶阁书画录》）。兹再补充一条证据。山谷行书赤壁词后附有小楷《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诗，巧的是，苏轼原唱《郭熙画秋山平远》和山谷和作《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亦作于元祐二年<sup>〔39〕</sup>。可能是山谷行书赤壁词后，应他人之请而将同时所作《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诗用小楷录于词后。山谷行书赤壁词既录有元祐二年所作诗，则赤壁词当书于元祐二年或稍后。此可佐证《黄鲁直年谱》载山谷行书赤壁词写于元祐二年为可信。东坡草书赤壁词的年代虽不可考，但总是东坡生前所作。

山谷和东坡所书两种赤壁词，是现存最早最接近东坡赤壁词原作的文本，使我们得以了解东坡赤壁词原文的真相，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其一，可以校正诸本异文的正误得失。

为便于比勘苏黄所书两种文本的校勘价值和东坡赤壁词的异文，兹将宋元以来重要词籍和诗话所录赤壁词的异文依时间先后列表如下：

各本赤壁词异文一览表

书名、版本	主要异文
山谷行书本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人间如梦

东坡草书本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曾慥本《东坡词》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人间如梦 <sup>〔40〕</sup>
傅干《注坡词》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人间如梦 <sup>〔41〕〔48〕</sup>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2〕〔23〕</sup>
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3〕</sup>
元延祐本《东坡乐府》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人间如梦 <sup>〔44〕</sup>
元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5〕</sup>
元至正本《草堂诗余》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6〕</sup>
明洪武本《草堂诗余》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7〕〔44〕</sup>
明陈耀文《花草粹编》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48〕</sup>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人间如梦 <sup>〔49〕〔45〕</sup>
清朱彝尊《词综》	浪声沈……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多情应是笑我生华髮，人间如寄 <sup>〔50〕〔38〕</sup>
清万树《词律》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处、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51〕</sup>
清《历代诗余》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sup>〔52〕</sup>
清《钦定词谱》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人间如寄 <sup>〔53〕</sup>
四印斋所刻词本《东坡乐府》	同元延祐本《东坡乐府》
《强村丛书》本	同元延祐本《东坡乐府》

南宋以来的传本，有的时代相近而文字有异，让人无从判断这些异文的是非。如今有了最早的苏、黄两种手书文本作参照，我们就能够校正和判断各本异文的是非了。

先说最关键的异文“檣櫓”（“檣櫓”）和“强虏”（“狂虏”）。南宋最早的两种词集（曾慥本、傅干本）和稍晚的黄升选本均作“强虏”（“狂虏”），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则作“檣櫓”。依成书时间的早晚而言，曾本、傅本均早于胡仔的《丛话》，若从文本的时间先后来看，似乎以曾、傅二本为是。按版本的多少而言，南宋有三种词集和词选（即曾本、傅本和黄氏选本）作“强虏”，只有胡仔一家作“檣櫓”。作“强虏”的版本多于“檣櫓”。有了苏、黄手书石刻文本，我们就可以判断，胡仔引作“檣櫓”，更符合东坡词原文和原意。而胡仔所引，又可反证今传苏、黄两种手书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前引王楙《野客丛书》谓淮东将领王智夫曾见东坡手书赤壁词真迹，也是作“檣櫓”。王楙又从赤壁大战的历史背景分析，认为作“‘檣櫓’为信然”，是“后人讹为‘强虏’”。

稍晚于王楙的张端义，其《贵耳集》卷下曾谈及赤壁词，虽未引全词，但所引“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一句，

也是作“檣櫓”。其说云：

李季章云：苏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如《赤壁怀古》词所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中语，云：“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也。”

李季章，即李壁，著名史学家李焘之子，《宋史》本传说他“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于典章制度尤综练”。<sup>[54]</sup>

<sup>[210]</sup>李壁所见《赤壁怀古》词，虽无法知是刊行本还是东坡手写本，至少表明其所见本是作“檣櫓”。

孙宗鉴的《东皋杂录》，也载有类似的内容，更能说明问题：

李章奉使北庭时，馆伴发一语，云：“东坡作文，多用佛书中语。”李答云：“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云：“火出木尽，灰飞烟灭。”北使默无语。<sup>[55] 185</sup>

张氏与孙氏所述内容大体相同，而述及“灰飞烟灭”一句时，张氏引作“檣櫓”。李章（当为“李季章”，即李壁<sup>[56]</sup>）使金时，对北方馆伴使称引赤壁词，故意将“檣櫓”改作“狂虏”，藉以影射讽刺金人。这条记载，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宋传刻的东坡词集和相关词选将“檣櫓”改作“狂虏”或“强虏”，原来是南宋人藉以暗寓对金人的蔑视。这又印证了《野客丛书》所言“后人讹为‘强虏’”之说。

有了苏、黄手书的赤壁词文本，我们就可以断定东坡赤壁词的原文是“檣櫓”，而不是“强虏”。南宋人改为“强虏”，虽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但既不符合东坡词的原文，也不符合东坡词的原意。三国时孙吴与曹魏的赤壁之战，不是华夏与夷虏之战，苏轼绝不会以“强虏”或“狂虏”来指称曹魏军队<sup>[57] 30</sup>。作“强虏”，显然于理不通。正如前引王楙所指出的，赤壁之战中，东吴火烧曹船，“烟炎涨天”<sup>[58]</sup>，赤壁词作“檣櫓灰飞烟灭”，正是写实。于事理、于史实，赤壁词原文都应从苏、黄手书文本作“檣櫓”，而非“强虏”。

李白《赤壁歌送别》之“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亦可参证。李白也称孙吴与曹魏的赤壁之战是“二龙”决斗，并非华夏与胡虏之争。其“烈火”“楼船扫地空”，正是东坡赤壁词“檣櫓灰飞烟灭”之意。《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注引李白《赤壁歌》后亦曰：“诸本多作‘强虏灰飞烟灭’。按，李白此歌，既曰‘楼船扫地空’，则用‘檣櫓’二字，其义优于‘强虏’。”<sup>[59] 443</sup>

次说“穿空”、“拍岸”与“崩云”、“裂岸”。苏、黄手书文本和南宋所传诸本，俱作“穿空”、“拍岸”。唯元延祐刻本《东坡乐府》始改作“崩云”、“裂岸”。虽然“崩云”，可以从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找到依据（详后），但洪迈的说法并不可靠。所以，后出的元延祐本所改之字，不可信据。同样，“裂岸”之“裂”，于宋本无征，或是据《容斋随笔》所言“掠岸”而擅改为“裂岸”。

再说“谈笑”与“笑谈”。南宋以来所传东坡词集，几乎无一例外地作“谈笑”，唯有苏、黄手书文本作“笑谈”。“笑谈”二字，依《念奴娇》词调，应作平仄，与苏轼同时的沈唐《念奴娇》（杏花过雨）、苏轼另一首《念奴娇》（凭高眺远）、黄庭坚的《念奴娇》（断虹霁雨）和南宋金源词人追和东坡赤壁词韵的《念奴娇》，如叶梦得和赤壁词（“云峰横起”）、文天祥和东坡赤壁词（“乾坤能大”）、金赵秉文和赤壁词（“清光一片”）<sup>[60]</sup>，于“笑谈”二字处均作平仄。故依调谱，东坡赤壁词应作“谈笑”。而东坡草书和山谷行书均写作“笑谈”，似更切合东坡原词的稿本样态。后来传本，依平仄改作“谈笑”。就词意而言，“笑谈”似优于“谈笑”，盖“谈笑”，是无意间的闲谈笑谑；而“笑谈”，则是庄重正式的晤谈，但气氛轻松。“笑谈”，更切合赤壁词的词境词意，当依苏黄手写本作“笑谈”为是。作“谈笑”，有宋本可据，有调谱可依，也不算错。万树《词律》“谈笑间”作“谈笑处”，当是从王楙《野客丛书》而改。虽有所本，但不足信，盖《野客丛书》有可能是误记。“谈笑间”之“间”，是指时间；“谈笑处”之“处”，指空间。东坡原词显然是指时间而言。作“谈笑处”，与原作词意不合。

至于“人间”与“人生”，宋元诸本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山谷行书本和东坡草书本，也彼此相异，颇难辨是非。当从东坡草书作“人生”。金人所传赤壁词，亦作“人生”。元好问《中州集》卷七载一轶事云：“卫承庆，字昌叔，襄城人。父文仲，承安中进士，以孝友淳直称于乡里，官至文登令。年七十余卒。临终沐浴，易衣冠与家人诀，怡然安坐，诵东坡赤壁乐府，又歌‘人生如梦’以下二句，歌阕而逝。”此事辑评苏词者鲜所留意，兹录以博闻。

其他异文，略述如次。元延祐本《东坡乐府》“三国”原校“一作‘当日’”，“当日”出自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东坡大江东去词，其中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陈无己见之，言不必道“三国”，东坡改云“当日”。

今印本两出，不知东坡已改之矣。<sup>[61] 307</sup>

东坡的原词作“三国”，陈师道建议东坡改为“当日”。也许后来东坡尊重陈师道的意见而改之，但至少东坡草书赤壁词和山谷行书赤壁词时，仍作“三国”。后出各本亦作“三国”，而无作“当日”者。故“当日”，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江山”，明刊胡子《苕溪渔隐丛话》作“山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江上”，应属抄刻之误，不足为凭。

“嫁了”之“了”，明梅庆生注本《苏东坡全集》作“正”。有人认为“正雄姿英发”，词意更胜<sup>[62]</sup>。无论“正”字是否比“了”字更优长，都没有切实的依据。宋元所传东坡词集各本及苏、黄手书本赤壁词，无一作“正”字者，当是梅庆生所臆改，不可信据。“了”，近人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又改作“与”，并说《念奴娇》原词“通首出韵，然自是豪语，不必以格求之。‘与’旧作‘了’，嫁了是嫁与他人也，故改之”<sup>[63] 428</sup>。王氏擅改原词，无任何版本依据，实不足取<sup>[64]</sup>。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曾批评说：“曩见陈伯弢斋头有王壬老读是词校字，改‘了’字为‘与’，伯

戮极倾倒。余笑谓此正是湘绮不解词格之证。即以音调言，亦哑凤也。”<sup>(65)</sup> 4324

其二，可以了断洪迈引发的一段公案<sup>(66)</sup>。

除上述异文外，东坡赤壁词还有几处特殊的异文，始作俑者是洪迈。前节引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八《诗词改字》的全文为：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如“浪淘尽”为“浪声沈”，“周郎赤壁”为“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为“崩云”，“惊涛拍岸”为“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髮”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髮”，“人生如梦”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洪迈所记赤壁词异文，在宋元明三代无人理会，到了清初，始为朱彝尊所注意。朱编《词综》，选录东坡赤壁词，原词文字——依洪氏所言改过，全词作：

大江东去，浪声沈，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我生华髮。人间如寄，一尊还酹江月。

朱氏又特地加按语说：

他本“浪声沈”作“浪淘尽”，与调未协。“孙吴”作“周郎”，犯下“公瑾”字。“崩云”作“穿空”、“掠岸”作“拍岸”。又“多情应是笑我生华髮”作“多情应笑我，早生华髮”，益非。今从《容斋随笔》所载黄鲁直手书本更正。至于“小乔初嫁”宜句绝，“了”字属下句乃合。<sup>(67)</sup> 38

其后《钦定词谱》虽未据《词综》录入，却认同《词综》之说：

按容斋洪迈，南渡词家，去苏轼不远。又本黄鲁直手书，必非伪托。《词综》所论，最为谛当。但此词传诵已久，采之以备一体。<sup>(68)</sup>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也肯定《词综》所改：

东坡《赤壁怀古·念奴娇》词盛传千古，而平仄句调都不合格。《词综》详加辨正，从《容斋随笔》所载山谷手书本云：大江东去……。较他本“浪声沈”作“浪淘尽”，“崩云”作“穿空”，“掠岸”作“拍岸”，雅俗回殊。不仅“孙吴”作“周郎”，重下公瑾而已。惟“谈笑处”作“谈笑间”，“人生”作“人间”，尚误。至“小乔初嫁”句，谓“了”字属下乃合。考宋人词后段第二三句，作上五下四者甚多，仄韵《念奴娇》本不止一体，似不必比而同之。万氏《词律》仍从坊本，以此词为别格，殊谬。<sup>(69)</sup> 271~272

郑文焯也赞成《词综》的意见。其《大鹤山人词话》引《容斋随笔》后曰：

此从元祐云间本，唯“崩云”二字与山谷所录无异。汲古刻固作“穿空”“拍岸”，此又作“裂岸”，亦奇。愚谓他无足异，只“多情应是”句，当从鲁直写本校正。

先著、程洪则不认同《词综》的说法。其《词洁》云：

此词脍炙千古，点检将来，不无字句小疵，然不失为大家。《词综》从《容斋随笔》改本，以“周郎”、“公瑾”伤重，“浪声沈”较“淘尽”为雅。予谓“浪淘”字虽粗，然“声沈”之下不能接“千古风流人物”六字。盖此句之意全属“尽”字，不在“淘”、“沈”二字分别，至于赤壁之役，应属“周郎”，“孙吴”二字反失之泛。惟“了”字上下皆不属，应是凑字。

“谈笑”句甚率，其他句法伸缩，前人已经备论。此仍从旧本。正欲其瑕瑜不掩，无失此公本来面目耳。<sup>(71)</sup>

133

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词综》所改，其出发点都是洪迈所载山谷手书本。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怀疑洪迈所言山谷手书本是否可信。其实洪迈本人并未亲见山谷手书原本，也不知向巨原说的元不伐家藏山谷所书赤壁词卷的下落。洪氏是据其友人向巨原所“云”记录，因而向巨原所言是否可信，值得怀疑。张鸣教授已注意到这一关节。如果没有山谷手书本印证，当然无从判断。今既知山谷行书赤壁词文本的真相，就可肯定洪迈《容斋随笔》所记“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的异文不可信。洪迈所载异文，不是向巨原误记，就是洪迈为标新立异而杜撰。就像《词综》舍世间所传各本不从，而偏偏依《容斋随笔》改东坡原作一样，都是为了标榜自己见到了世人不常见的词作文本。今传四种山谷行书东坡赤壁词石刻和搨本，可以确证洪迈所言数处异文根本不是山谷手书本的原貌，而是向巨原或洪迈的误导。真相大白之后，有关“浪声沈”、“孙吴赤壁”等异文的争议，也就是无谓而没有意义的了。

综上所述，东坡赤壁词最可信的文本，是东坡草书和山谷行书本。其原作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凡与其不同的异文，都是后世传本所改，不足信据。

## 注释

[1] 如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传世有《至宝堂法帖》及《雪堂石刻》载有东坡醉笔《赤壁怀古》……毫无疑问是伪造的。”《光明日报》，1982年4月16日。另参丘述尧《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指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2] 如水费佑《黄庭坚伪迹考叙》即将黄庭坚行书《东坡大江东去词（拓本，刻于《壮陶阁续帖》）》列作“伪迹”，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35卷），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版。

[3] 在相关苏轼和词学研究论著中，笔者唯见北京大学张鸣教授曾用黄庭坚此行书来校勘苏轼赤壁词的异文，见所撰《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4] 苏永祁《“苏黄”双绝——黄庭坚书苏轼《赤壁怀古》词刻石》，《苏轼研究》，2013年年第2期。石刻原石，现藏山东省济宁市



嘉祥县武氏祠。

[5] 元不伐。名勋，随学山谷二十余年。《山谷集》别集卷十《与元勋不伐书》题下注云：“勋，圣庚之子。自元祐初从山谷游，几二十年。终春陵太守。”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九亦载：“十五年而得具茨元不伐。具茨，太史黄公客也。”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元勋，字不伐。阳翟人。政和间知宁国县事。”按，具茨，即阳翟。

[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 向巨原，为洪迈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九曾言及：“亡友向巨原，自少时能作诗，予初识之于梁宏夫坐上。”“后哀其平生所为诗，目为《容斋杂稿》，倩予为序。”（第524页）洪迈曾为向巨原作《临湖阁记》（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七；《全宋文》222册4918卷第72页）王义山有《念奴娇·题临湖阁阁在东阳向巨原所创洪容斋作记旧赞慕居其下》词纪其事（《全宋词》第305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 元不伐生卒年虽不详，但绍兴二十五年（1155）尚在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载：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癸巳，“诏追官勒停人赵令衿复左朝请大夫，追官勒停人阎大钧，除名勒停人元不伐复右朝散大夫。”中华书局，1988年版。

[9]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惜赵孟頫所书原文未见著录，如有传录，即可确证今传山谷行书赤壁怀古词文本的真伪。

[10]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云东拾草提要》：“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召入，兼翰林学士。事迹附见《明史黄凤翔传》。世能以鉴藏书画名一时。张丑所为辑《南阳画表》也。”

[11]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黄庭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四、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一《书画舫》亦载此条，可参。按，严嵩为江西分宜人，故称严分宜。

[1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定武兰亭》所载跋事可为一证：“《兰亭》自殉昭陵后，人间仅留欧、虞、褚、薛四临本。今虞、褚尚有墨迹，为好世家所藏，以予所见，声价俱重。然断以为二公真手笔，则终未敢定也。楔帖石刻，以定武为正嫡子孙，石晋时。为虜骑将去，帝狃归日，弃置中途。今所传宋拓本，皆属之定武。然其价已不赀。顷乙酉、丙戌间，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与定武略同。说者遂以为真广连时所弃，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时吴中韩敬堂宗伯为祭酒，拓得数百本，以贻朋友。今石以敲摹年久，渐就剥蚀，并韩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宝晋斋，曰神龙临本，纷纷翻刻，几数十种，又出桑世昌《兰亭考》之外，不可胜纪。然质之定武，则近矣！”韩世能（号敬堂）得《兰亭》石刻后，拓数百本送人，而不是秘而不宣。

[13] 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三《清河书画舫提要》，中华书局，1965版。

[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

[15]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三，《中国画全史》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16]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孙矿《书画跋跋》卷二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盛时泰《苍润轩碑跋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278册。《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七亦引录苍润轩此碑跋文。按，盛氏所言“缺月挂疏桐”，为黄庭坚所书苏轼《卜算子》词。孙矿《书画跋跋》卷二下：“《山谷书东坡卜算子帖》，临江人王说谓坡此词是为惠州一女子作，意或近之。”

[19] 《石渠宝笈》卷三一《明董昌书一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李光燾《金石文考略》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参《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观妙斋金石文考略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24] 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四，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25]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史教授陈志平博士专研黄山谷书法，2013年8月31日电卞永誉王兆鹏说：“此件作品我曾在山东武氏祠亲见过，从书风推断，绝非山谷所作。”

[26] 笔者请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隽一比较裴氏《壮陶阁续帖》本和山东武氏祠石刻拓本山谷所书赤壁词，发现二者字形确有较大差异，其中“少”、“江”、“国”、“年”、“巾”、“人”、“多”、“应”、“笑我”、“早”、“梦”、“月”等点画结构差异尤其明显。又，裴帖赤壁词卷末铃印两枚，上为长方形“黄氏庭坚”印，下为正方形“山谷道人”印，下印较上印要小。武氏祠石刻的铃印正相反，上为“山谷道人”印，下为“黄氏庭坚”印。可见裴帖与武氏祠石刻所据来源不同，山东武氏祠石刻当为伪写本。

[27] 据《清史稿》卷二〇二《疆臣年表》，鄂弼自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任山西巡抚，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戊戌改任陕西巡抚。《清史稿》卷一二《高宗本纪》亦载，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乙未，以鄂弼为山西巡抚”。

[28] 汪槩纂集、王琳祥点校《黄州赤壁集》卷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按，此书初印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又，光绪十年刊《光绪黄州府志》卷三十八亦载有《东坡手书四词石刻》，并录有原文。

[29] 《黄州赤壁集》卷十据《黄州府志》载有“白龟渚”三字碑（佚），为“嘉靖己酉知府郭凤仪刻石”（第305页）。同卷又录有郭凤仪画“东坡老梅”石刻及附记（石刻今存坡仙亭），记中有“迄今嘉靖戊申，枯本犹存”云云，嘉靖戊申、己酉，分别为嘉靖二十七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据知郭凤仪任黄州知府在此间。《光绪黄州府志》卷十三《秩官传》亦载：“郭凤仪，字舜符，祥符人。进士。嘉靖间黄州知府。”《中国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4册，第4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30] 孔凡礼点校本《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六《题跋》据影印刘鹗藏本《宋拓苏长公雪堂帖》将东坡赤壁词自跋拟题为《题大江东去后》，文字录作：“久不作草书，适口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口出也。东坡醉笔。”（第257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两处空框和“纷然”二字，系孔先生未能识别和误读。非原拓如此。又互联网载有《苏轼手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辨疑》（作者不详）一文，将刘鹗说成是“元代吉安永丰人，字楚奇。累官翰林修撰。为文风骨高秀，学者称孚云先生。有《惟实集》传世”（见2006年4月17日《长江网讯》，网址<http://www.cj.cn/jczn/200604/t66816.htm>），实则此刘鹗为近代《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而非元代《惟实集》的作者刘鹗。

[31] 王楸《野客丛书》卷二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

[32]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四“淳熙五年陈说榜”下有“王智夫，仙居人。字愚可，终修武郎，知郁林州”。《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影印本。

[33] 刘诜《桂隐文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郭沫若认为是伪造，但没有说明理据。郭先生所言“伪造”，应该是从字迹、书法风格作出的判断。

[35] 参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按，明抄吴讷《百家词》本，今存天津图书馆；紫芝漫抄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3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五。另参刘尚荣校证《傅干注坡词》代前言《〈注坡词〉考辨》，巴蜀书社，1993年版。

[37]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黄庭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四、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一亦引《书画舫》此条，可参。

[38] 黄蓍《山谷年谱》卷二十：“元祐二年丁卯，先生是岁在秘书省兼史局。正月，除著作佐郎。按《国史》，正月辛未，黄庭坚为著作佐郎。”另参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185~20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9] 参《苏轼诗集》卷二八，第150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六，第779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0] 据明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紫芝漫抄本《东坡词》。

[41] 刘尚荣校证《傅干注坡词》，巴蜀书社，1993年版。

[4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3] 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四部丛刊》影明刊覆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狂虏”作“樯艚”。

[44] 苏轼《东坡乐府》，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元延祐本。

[45] 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46]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后集卷上，元至正十一年（1351）双壁陈氏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47] 吴昌绶、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48] 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十，陶凤楼影印明万历十一年刻本。

[49] 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50] 朱彝尊《词综》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康熙三十年裘村楼刊本。

[51] 万树《词律》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52] 沈辰垣《历代诗余》卷七十，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康熙四十六年刊本。

[53] 《钦定词谱》卷二八，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

[54] 《宋史》卷三九八《李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5] 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说郛三种》本，第1855页。“虏”字原作空白，依词意补。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郛》作“谈笑间，狂樯艚飞烟灭”，当是四库馆臣所误改。原拟将“狂虏”改为“樯艚”，不小心将“狂虏”误改为“狂樯艚”了。又按，孙宗鉴（1077~1123）为北宋人，徽宗宣和五年（1123）已去世。其书不应载有李壁之事。此条当系误入《东皋杂录》。涵芬楼本《说郛》卷二所录《东皋杂录》即无此则。《宛委山堂》本和《四库全书》本《说郛》卷四十《东皋杂录》将此则录入原书之末，也显现出从他书窜入的迹象。也有一种可能，李章不是李季章，而是北宋人（参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第360~361页，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有待进一步考实。

[56] 李壁曾于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出使北庭（金）。《宋史》卷三九八《李壁传》：“壁受命使金，……壁至燕，与金人言，披露肝胆，金人之疑顿释。”《金史》卷六二《交聘表》：泰和五年“闰八月辛巳，宋试吏部尚书李壁、广州观察使林仲虎贺天寿节”。

[57] 参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58] 《三国志·吴志》卷九《周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59] 吴昌绶、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60] 参元好问《遗山先生集》卷四十《题闲闲书赤壁赋后》，《四部丛刊》本；徐钊《词苑丛谈》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61] 《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62] 参洪静渊《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小议》，《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5期。亦有不同意见者，参童勉之《关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几个问题质疑》，《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63] 王闳运《湘绮楼评词》，《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4] 郭沫若倒是很欣赏王闳运改“了”为“与”（参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光明日报》1982年4月16日；丘述尧《郭沫若〈读诗

札记四则〉指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实不足据。擅改原作，乃校勘大忌。

[65]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6] 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对此公案已有讨论，可参。

[67] 朱彝尊《词综》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68] 《词谱》卷二八，北京中国书店1979年影印本。

[69]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70]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71] 先著、程洪《词洁辑评》，《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72] 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王兆鹏，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书名：苏轼“立人”

主编：方永江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开本：787×1092mm 1/16

页数：178页

定价：36.00元

# 千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

## ——苏轼与医学文化探论之一

庆振轩 丁沂璐

**内容提要** 宋代医学文化发达，形成宋人尚医的独特文化现象。苏轼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意识地将医道医理与治政之道结合，以医喻政，针对现实政治，在仁宗朝、神宗朝、哲宗朝不同时期，因时因事，对症下药，形成其论政为文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 苏轼 医学文化 以医喻政

我国医学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国语·晋语八》即有“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之说；<sup>〔1〕</sup><sup>528</sup>逮及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倡言：“古之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sup>〔2〕</sup><sup>3</sup>有宋一代，一改前人“巫覡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sup>〔3〕</sup><sup>140</sup>之成见，执政者对于医学卫生事业十分重视，视医术为仁者之术，医生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医学得到进步和发展。“士人尚医”成为一代医学文化的特色。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应，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占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sup>〔4〕</sup><sup>381</sup>

于是，在时代思潮的熏陶下，在范仲淹的直接影响下，宋代文士不仅崇拜其先忧后乐的圣贤精神，而且服膺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淑世情怀。

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用丰富人生诠释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人文内涵，本文试图就其“上医医国”之高论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同好。

苏轼一生之志在于致君尧舜，匡扶社稷，治国之病，祛民之疾，以求宋王朝兴利去弊，长治久安。于是深谙天下治乱，熟知诸子百家，又究心当朝政事民心，且对于医药文化有特殊兴趣的东坡，在论说国策政事之时，会自然而然地以病喻世，以医喻政，时有高论。并且其以医喻政之思想行为贯穿其一生，融入其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其在《晁绎先生诗集叙》中说：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sup>〔5〕</sup>

968~969

虽为评价他人诗文，实为东坡夫子自道。有为人著有为之言，且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期匡时济世，苏轼践行一生。但在不同时期，则针对现实政治，全面深入论析，阐述政治主张，对症下药。

### 一、仁宗朝针对上下晏安之政局，希望振荡涤刷卓然有立

苏轼自幼即奋厉有天下志，初入仕途，其全面系统的政治见解主要体现在嘉祐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所撰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以及制科考试所作《王者不制夷狄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这一系列著述代表了苏轼仁宗朝的政治主张，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有论者认为苏轼“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建议，比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议论更为透辟”。<sup>〔6〕</sup><sup>132</sup>

苏轼的策论乃“深思熟虑”之作（《策总叙》）<sup>〔5〕</sup><sup>771</sup>，在策论中作者借古鉴今，为当代政治视症把脉，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时政之弊：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惶惶，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

苏轼对于仁宗朝的总体评判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以医喻政，十分形象地形容时政病象曰：

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苏轼对症下药，阐述了自己的治疗方案：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策略一》）<sup>(5) 775</sup>

苏轼针对时政之病开列的“药方”，就是要仁宗改革弊政，励精图治，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具体地讲就是苏轼所论述的《课百官》、《安万民》、《教战守》、《厚财货》、《训军旅》等一系列的变革主张。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到其《策别课百官》之三《决壅蔽》依然是以医喻政，苏轼认为既要政治上卓然有立，就要破除壅蔽，下情上达，上令下行，得心应手。他形象地比喻说：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苏轼明确指出当时“壅蔽”之症候：

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

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决壅蔽》）<sup>(5) 817~818</sup>

纤毫之事，务为留滞，乃其时政坛奇观，苏轼为之开列的药方简单明了，要根治朝廷壅蔽之病，关键在于“仁宗励精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sup>(5) 3104</sup>

励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策别课百官》之三《决壅蔽》）<sup>(5) 817~819</sup>

苏轼以一身之疾痛苛痒、关节脉理与心、手关系喻政通人和，上令下行，下情上达，理明而词畅。

苏轼早期的政治主张已经可以见出其稳健的执政风格，他提倡渐进的政治变革，反对操之过急。他把养生医理与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略谓：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礼以养人为本论》）<sup>(5) 201~202</sup>

尽管苏轼在纵论天下大势时曾说：“请言天下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但二者相较，“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sup>(5) 786~787</sup>所以我们研讨苏轼早期的政治主张，在两个方面印象极深，一是其论之全面深入；二是其以医喻政的特色。正如浦起龙评价其《决壅蔽》篇所言：

胥吏窃权而事积，是壅蔽，是病；任人励精而自上率，是决之之方，是药。（《决壅蔽·集评》）<sup>(5) 821</sup>

## 二、神宗朝针对纷纭朝政，力主安靖，反对政令迭出

由苏轼前期的政论、策论，我们已可看出其与王安石政见有所异同，及至熙宁三年，苏轼态度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上皇帝书》

以养生喻治国，其言曰：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上神宗皇帝书》）<sup>（5）2881~2882</sup>

其《再上皇帝书》亦以医喻政，他将王安石新法施行中“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喻为医生用人的生命来试验毒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断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sup>（5）2944~2945</sup>尽管苏轼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对自己早年对待新法的态度有反思，有改变，但其曾激烈反对新法，以医喻政，是确凿无疑的。

苏轼以医喻政，批评熙宁变法，还突出表现在其写于熙宁九年的《盖公堂记》。文章针对当时政坛王安石、吕惠卿、韩绛政务纷纭，加以批评，“以医为喻，起尽议论，却将正意一证。”（茅坤《苏文忠公文钞》卷25《盖公堂记》）<sup>（5）1084</sup>洪迈《容斋五笔》卷四《东坡文章不可学》引述了《盖公堂记》大段文字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轼《盖公堂记》写道：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果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瘰疽痈疥眩瞤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销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所丧之

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盖公堂记》）<sup>（5）1079~1080</sup>

而为萧、曹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者即盖公也。洪迈认为“是时熙宁中，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其议论病之三易，与秦汉之所以兴亡治乱，不过三百言而尽之。”<sup>（7）871~872</sup>言苏轼《盖公堂记》讽刺新法，大致不差。苏轼撰文前后，变法派人事更迭，法令纷纭，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韩绛为相，吕惠卿参知政事。罢方田法；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知陈州。又罢手实法；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吴充、王珪为相，冯京知枢密院事。关于新党内讧，史料多有记载，《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条载：

初，吕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骤至执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王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一时朝士见惠卿得君，谓可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时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惠卿争论，度不能制，密请帝复用安石，帝从之。惠卿闻之不安，乃条列安石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进，七日至汴京。<sup>（8）364</sup>

正是面对或预见人事纷更，苏轼有感而发，“三易医而病愈甚”，“昔之为政者亦然”，借医喻政，借古喻今，颇中时病，故陈基《夷白斋稿》卷二一曰：

苏长公辈论秦汉间得失，引医为喻，而卒归之于清净，天下至今颂之。<sup>（9）922</sup>

### 三、元祐年间，针砭时弊，视病发药

苏轼上医医国的理念贯穿其一生，元祐年间针对西北战事纷争，其一系列奏章，见解独到。《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针对朝廷欲屈己求和，以求暂时安宁的局势，坦言：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惮屈己，而臣献言，乃欲艰难其请，不急于和，似与圣意异者。然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径行，未有获其意者也。若权其利害，究其所至，则臣之愚计，于安边息民，必久而

固，与圣意初无小异。然臣窃度朝廷之间，似欲以畏事为无事者，臣窃以为过矣。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sup>(5) 3133</sup>

元祐七年十一月，屡历世患的苏轼，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面对已经成年的哲宗，出于对哲宗的多年的观察和隐隐的不安，他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二首之二中说：

恭维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慈者，谓好生恶杀，不喜兵刑。俭者，谓约己省费，不伤民财。勤者，谓躬亲庶政，不迹声色。慎者，谓畏天法祖，不轻人言。诚者，谓推心待下，不用智数。明者，谓专信君子，不杂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祿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sup>(5) 2760</sup>

对于此表，曾枣庄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开药方就证明有病，开的什么药方就证明有什么病。苏轼要求哲宗慈、俭、勤、慎、诚、明，可见他感到已经成年的哲宗存在不慈、不俭、不勤、不慎、不诚、不明的问题。”<sup>(10) 194</sup>

苏轼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所开列的药方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元祐八年五月，东坡竭尽忠贞，在《乞校正陆摯奏议上进札子》中再一次对症下药，略谓：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贄，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

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贄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贄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贄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sup>(5) 3566~3567</sup>

苏轼与吕希哲等认为陆摯奏议“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期望其“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但对于已成见在胸的哲宗而言，苏轼们的良苦用心，他“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历史已经走到了新的转折点。

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再一次告诫哲宗：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覬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sup>(5) 3590</sup>

尽管此时肺腑之言，对于哲宗已如秋风过耳，全然不起作用，然而苏轼以医喻政的拳拳爱国之心铭刻在历史上，其系列雄文为后人珍视。也正是从相近角度考虑，韩昌箕精选了苏轼策论百篇，并高度评价说：

东坡先生集中所著策论一百余篇，羽翼经史，阐释理道，近裨时务，远备边功，当时仁庙读之，未尝不叹为奇才。至其因时制宜，视病发药，在嘉祐则务变更，在熙宁则务安静，在元祐则主免役，一是之从而不徇人为爱憎。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韩昌箕《苏文忠公策论选叙》）<sup>(9) 1072</sup>

其言苏轼不同时期的政论、策论“因时制宜，视病发药”，匡救时弊，利在天下，是很中肯的评价。也是苏轼“上医医国”的目的所在。

由于特殊的社会现实，宋世士大夫有极高的参政议政热情，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从范仲淹到欧阳修，再到王安石、苏东坡，一代具有突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色彩的文学家，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为使宋王朝长治久安，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特别是现实政治，都有各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论析，值苏轼关涉时

势之际，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医学文化的重视和普及，士大夫由于对医学养生的重视，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关切，“以医论政”“以医喻政”者渐多。方健所著《范仲淹评传》已注意到范仲淹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常年劳累多病在身，所以十分注重养生。<sup>(11) 112~115</sup>范仲淹曾向韩琦、尹洙等推荐养生之术，推荐药方。他劝告韩琦：“宜少服药，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集气成真’是也。惟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也，余皆迂怪。”（《与韩魏公书》之九）<sup>(12) 670</sup>。如果说范仲淹重视医学，多在于亲友养生治病，那么博闻强记的王安石，虽《难经》、《素问》无所不读，偶尔会以医喻政，王安石《上时政疏》中说：“《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sup>(13) 18</sup>其在《上凌屯田书》中也说：“俞跗，疾医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经，耳目之所接，有人以此，狼疾焉而不治，则必餒然以为已病也。”<sup>(13) 45</sup>则王安石乃以古代良医自喻，欲对现实政治投以猛药。王安石之外，“以医喻政”、“以医论政”者时有其人。

庆历三年，仁宗擢用韩琦、范仲淹，罢免夏竦，蔡襄针对政局和仁宗用人方略进言，认为“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道出了国医良术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同时表示了对朝廷用人多疑的担忧。<sup>(8) 239</sup>熙宁四年，正值王安石变法之际，右谏议大夫吕诲在其所上乞致仕表中“以身疾喻朝政”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药剂，浸成风痺，遂艰步行，非祇惮炙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sup>(8) 351~352</sup>王安石变法，法非不善，用人不当，所用之人，或因法以病民。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吴充欲有所变革，司马光贻书吴充，以病喻政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弊法。……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sup>(8) 366~367</sup>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划革略尽”，毕仲游针对朝中复杂人事关系、政治情势上书司马光曰：“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不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sup>(8) 418~419</sup>亦以病喻政。元祐四年，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被贬，范纯仁上言太后，认为“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

窜诛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sup>(8) 430</sup>绍述、崇宁，政局翻覆，陆佃论政，主张“参用元祐人才，尤恶奔竞”，尝曰：“今天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餌辅养之，须共安平。苟为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sup>(8) 481</sup>虽时势不一，用意则与范纯仁相近。大观三年，以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学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今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天下黯然而失望。执中虽不敢若京之蠹国害民，然碌碌常质，初无过人。天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腑受疹已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执中夤缘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经体赞元，是犹以蚁负山，多见其不胜任也。”<sup>(8) 493~494</sup>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尽管相关论者政治立场、论事视角各别，但其以良医以喻贤才，用庸医借指庸才，以病况喻时政，从一个侧面见出北宋中后期“以医喻政”的特点。但也正是在这综合比照中，我们更能见出苏轼上医医国宏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传统政治文化、医学文化中的造就及地位。

相比较而言，苏轼对于医学更为精通，并且自觉地以医喻政，以医论政，借医寓理，留下诸多妙论。除上文论及篇目外，其《休兵久矣而国益困》、《代滕甫论西夏书》亦是如此。后者曰：

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年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者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sup>(5) 3679</sup>

正由于如此，茅坤曾推崇《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一文说：

长公所最得意识见，亦最得意奏条。借贽之所苦口于德宗者感动主上。（《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集评》）<sup>(5) 3573</sup>

所以一生志在“上医医国”的苏轼，“以医喻政”是其为文为政的一大特色，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前贤偶有论及，启迪之下，草就此文，以彰贤者，以就教于同好。

（下转第 33 页）



## 试论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下）

潘殊闲

**内容提要** 苏轼成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不是偶然的，在诸多因素中，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要而言之有三：一是天府之国的毓秀，二是两河流域的滋养，三是巴蜀学派的晕染。这三种因素相互叠加，使巴蜀文人普遍具有异于他乡的特异禀赋。他们博览百家，较少束缚；他们想象丰富，敢于标新；他们厚积薄发，兼容并包；他们性格张扬，勇于担当。所以，一旦他们冲出夔门，有了合适的机缘，他们就会脱颖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且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天才。从司马相如开始，直到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莫不如此。而苏轼则无疑是这一地区灿烂星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明星。

**关键词** 地域文化 巴蜀文化 苏轼 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到印度取经的唐三藏玄奘，18~22岁期间曾到成都大慈寺求学受戒，成都成为玄奘法相唯识之学发蒙的地方，是其佛学百科总体系奠定基础的地方。而玄奘之所以选择成都学律五年并受具足戒，是因为当时的成都聚集了四方的高僧大德，实际上是各宗派佛学、南北文化交融的大都会，为玄奘“转益多师”，融汇各种文化资料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以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至唐末僖宗时已出现了“菩萨在蜀”的说法。<sup>[53]</sup>而玄奘也开拓了巴蜀佛学由唯识启疑惑求真知的探索风气。当六祖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的时候，六祖的师兄弟智洗则在资中创立了净众——保唐禅系。这是巴蜀禅系之始，其特点是兼容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既兼有南北顿渐禅风，同时又有“不北不南”特征，非常便于向“由禅入净”的路径发展。到禅宗八祖什邡人马祖道一，则进一步弘扬了六祖慧能一系，提倡“平常心是道”，创立农禅丛林制度，使禅宗生活化、人间化，成为人间佛教。

马祖道一为禅宗中国化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sup>[28]</sup> 15

另外，被苏轼描绘为“我家峨眉阴”（《送杨孟容》）的中华名山峨眉山，是普贤文化的发祥地，其特色是“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李白《登峨眉山》）。所谓峨眉的普贤文化，实是圆融仙道思想在内的大乘禅宗文化。<sup>[54]</sup>

作为蜀人，苏轼对佛禅甚感兴趣，这与他的家庭浓厚的佛教氛围有很大的关系。苏轼的父母对佛教都相当敬奉，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一文中，曾说他的父母都很仁慈宽厚，对佛教的“三宝”崇信不疑，且家里藏有十六罗汉像，经常设茶供养<sup>[15]</sup> 591，以祈福佑。也许是受父母崇信佛教的影响，苏轼在其父母去世后，曾将他们生平喜好的赏玩之物都施舍给寺庙，并令人画佛像，以求父母之冥福。<sup>[55]</sup> 585

关于苏轼的出生，还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里。苏轼说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五祖戒禅师求宿。且他稍大（七八岁）时，还经常梦见自己是五祖戒禅师，言外之意，五祖戒禅师就是他自己的前身。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有载：

苏子由初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子由，未卒，聪至。子由迎呼曰：“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亦欲同说梦乎？”聪曰：“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二人大喜，追笋舆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东坡至。坐定无可言，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

其顾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sup>(56)</sup> 56

无独有偶，苏轼去世前两天所作的绝笔信，是写给五祖戒禅师的隔世弟子怀琰的弟子径山维琳的。且苏轼去世时维琳仍在身旁。苏轼一生与佛的渊源可谓从始至终。

这种渊源，决定了苏轼对佛教的浓厚兴趣，这可以从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戒和尚、眉阳居士，以及人称东坡道人、海上道人等称呼可以看出其追求和影响。<sup>(57)</sup> 2

苏轼好动，热衷游览，诸多的贬谪，一方面让他身心倍受摧折，但另一方面，又给他提供了饱览大好河山和名胜佳迹的机会。检读苏轼仕履可以发现，苏轼几乎每到一处，只要有寺庙，一定要造访；只要有名僧，一定要交往。因此，苏轼一生到过不少寺庙，与不少僧人禅师有密切的关系。检索苏轼的这一行踪，其实颇有意味。

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轼游历过的寺庙有近百处，如：

棲云寺、宝相寺、华藏寺、大圣慈寺、兴国寺、宝梵寺、相国寺、戒坛院、法云寺、开元寺、天柱寺、真兴寺、大秦寺、中兴寺、普门寺、灵隐寺、明庆寺、吉祥寺、灵感观音院、法喜寺、净土寺、功臣寺、水陆寺、盐官南北寺、吉祥寺、祥符寺、海会寺、净慧寺、多福寺、法惠寺、净慈寺、寿星寺、六和寺、慈严院、龙华寺、昭庆寺、南屏寺、七宝寺、净住院、报本禅院、景德寺、本觉寺、普照寺、延寿院、国清院、治平寺、太平寺、虎丘寺、西菩山明智院、甘露寺、南禅寺、资福寺、石经院、厄台寺、开元寺、定惠院、安国寺、师中菴、清泉寺、承天寺、大别寺、圆通禅院、简寂观、慧日寺、无相寺、真如寺、资福寺、宝云寺、延洪禅院、石塔寺、龙兴寺、崇因禅院、崇庆院、建封寺、月华寺、寿圣寺、峡山寺、蒲涧寺、嘉祐寺、大云寺、佛迹院、香积寺、三山庵、净行院、净慧寺、龙光寺、显圣寺、景德寺、南塔寺等等。

而与苏轼交往过的僧人也相当多，如惟度、惟简、怀琰、荣长老、维琳、惠勤、惠思、澄慧、文及、辩才、法芝、梵臻、宗本、惠觉、惠勤、惠思、

清顺、可久、惟肃、义詮、法通、法言、契嵩、怀立、明雅、祖印、久上人、仲渊、佛印、模上人、道潜、惟胜、法明、法秀、有聪、法照、继连、广惠、宝觉、圆宝、择老、承皓、了性、法涌、本觉、佛慧等数十位。

由于与禅宗的密切联系，苏轼还被纳入禅宗临济宗黄龙派东林总法嗣。《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有云：“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黎明献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未几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泉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后过金山，有写公照容者，公戏题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州。’”<sup>(58)</sup> 1146

由于与佛禅有如此多的缘分和交往，苏轼的佛学素养相当深厚，可谓深得佛教义理的精髓。这一点连排佛甚力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苏轼对佛理“曾下功夫”，能把事理说得透彻。<sup>(59)</sup> 3116 这种佛禅意趣渗透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的文学创作、他对佛禅义理的阐释、他的行为处世等，都有浓郁的佛禅痕迹。<sup>(60)</sup> 67~71

### （三）巴蜀前辈名家的濡染

首先，慕循乡党之遗风。如前所述，因为文翁的化蜀，“蜀学一时比于齐鲁”，这种成效并非虚誉。《汉书·地理志》有这样一段文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sup>(10)</sup> 1313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核心思想是说文翁改变了蜀中的教育制度，改善了蜀中的教育生态，而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司马相如到京师之后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改变了蜀中过去不良的习俗，纷纷“慕循其迹”，于是接二连三出现影响卓著文章冠天下的人物，如王褒、严遵、扬雄。司马相如就是他们的活教材，好老师。对于远离中原，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来说，只有家乡出了名人，才能引起乡人的轰动与效仿。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习惯。

以西汉蜀中乡贤为榜样，成为后世蜀中乡人共同的理想。苏轼在其《眉州远景楼记》中就曾这样



概述：“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sup>(15) 352</sup>“西汉文词”既包括《史记》、《汉书》，也包括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眉州因为属于非中心城市，各种时尚的东西传入较慢，人们习惯传统的思维和习俗，所以，保留古风遗韵较多，这也就是苏轼在本文开篇中所感叹的“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sup>(15) 352</sup>正因为有这样的乡土基因和古风遗韵，所以，三苏到京城之后惊艳世人，成为欧阳修麾下矫正宋初绮靡文风和新近流行的奇险怪癖的“太学体”的生力军。张方平这样评价老苏：“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风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sup>(61)</sup>而苏轼苏辙又曾这样自我总结：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欧阳修）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sup>(15) 1425</sup>

嗟维此时，文律颓毁。奇邪滂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病唇齿。咀嚼荆棘，斥弃羹馘。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欧阳修）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踽踽元昆（苏轼），与辙偕来。皆试于庭，羽翼病摧。有鉴在上，无所事媒。驰词数千，适当公怀。擢之众中，群疑相脍。公恬不惊，众惑徐开。滔滔狂澜，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为谈俳。<sup>(42) 431</sup>

苏轼说“人之幸遇，乃有如此”，苏辙说“驰词数千，适当公怀”，都道出了二苏坦易晓畅的文风与擅长用当时的策论文正迎合了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革新运动以及科场文风改革的需要。说这两兄弟是时代的幸运儿固然没错，但命运的垂青需要事先的准备。以眉山为中心的西蜀地区对西汉乡贤的敬慕、学习风气客观上为三苏冲出夔门，轰动京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杂家风范。如前所述，巴蜀偏于一隅，远离中原，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种区位特点，加上古蜀文化留下的深刻印痕，这里的人们自有一套生存方式和发展之道。他们精通易老庄，杂揉儒佛道，其他如纵横之学、炼养击剑，亦

多喜爱。还是回到西汉。在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正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但司马相如却未受影响，他好读书击剑，博学多才，与章句之儒各行其道。扬雄生当西汉末年轻学炽盛、谰纬弥漫之际，却“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sup>(10) 2608</sup>唐代陈子昂，“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sup>(62) 229</sup>又“驰侠使气”，<sup>(62) 264</sup>“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sup>(62)</sup><sup>130</sup>其父陈元敬于“群书秘学，无所不览”，<sup>(62) 131</sup>“居家园以求其志，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sup>(62) 264</sup>这对陈子昂也产生了影响，他曾说“余家世好服食，昔尝饵之”，<sup>(62) 15</sup>又说“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sup>(62) 186</sup>因此之故，被誉为“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sup>(62)</sup><sup>264</sup>唐代蜀中另一位天才李白，“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志》）<sup>(34) 1460</sup>又“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sup>(34) 1240</sup>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sup>(34) 1245</sup>

受这些巴蜀前辈名公的影响，三苏的学术特点也可以用“杂家”概述。他们融儒道佛三家于一体，表现为一种杂家特色。王安石将苏氏蜀学视为战国纵横之学，被朱熹视为“杂学”。朱熹专拟“杂学辨”来评述《苏氏易解》，有云：“《乾》之彖辞，发明性命之理，与《诗》《书》《中庸》《孟子》相表里，而《大传》之言亦若符契。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后之务为闪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甚简。今将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适所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然道衰学绝，世颇惑之，故为之辨，以待后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不合者，亦并附焉。”<sup>(63)</sup>这虽是朱熹的批评乃至抨击，但从中可以看出苏氏杂取多家，不循故辙的思维特性和学术风格。

再次，张扬个性。巴蜀偏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苏轼《眉州远景楼记》曾这样概述当地的百姓：“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

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sup>(15) 353</sup>这段文字告诉世人，眉州之老百姓是遵纪守法的，但他们要看长官是否“有道”，如果“不以其道”，他们是不服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易治而难服”，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怕事的，用四川方言说是“比较扯的”，“很 Wāi 的”。这是宋代的苏轼对眉州的民风的陈述。时间上溯到汉代，如前所引，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形容蜀地“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这是文翁化蜀之后，司马相如享誉家乡内外之前的事。无论是班固的叙述，还是苏轼的陈述，其实都说明一点，巴蜀之人是非常有个性的。特别是这些巴蜀名人。司马相如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的人，他被另一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嵇康所赞佩：“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犍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sup>(64)</sup>至于相如琴挑文君，夤夜私奔的放纵，更是徒令诸多文人拍案惊奇，自叹弗如。扬雄“简易佚荡”，“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sup>(10) 2608</sup>以至秉心任性，敢赋《剧秦美新》。陈子昂初入京师，即以千缗买胡琴，当众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观者，一月之内，哄动京城，<sup>(65) 102</sup>更不要说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横制颓波”了。李白之使高力士殿上脱靴的霸气以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的狂傲，无人能比；甚至一向被认为温和的苏辙在仁宗皇帝主持的崇政殿御试中也敢直言皇上娱乐耗财之不是，以致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直斥皇上，出言不逊，则力请黜落，引起一番激烈争论。凡斯种种，均是巴蜀之人鲜明个性的彰显。苏轼也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他自己形容“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朱弁的《曲洧旧闻》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剴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

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sup>(47) 2993~2994</sup>

乌台诗案与苏轼的这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石林诗话》曾记载文同对苏轼的劝告：

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sup>(66)</sup>

所以，林语堂先生由衷感叹道：“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光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sup>(1)</sup>至于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诸多“尝新”与“创举”，就不用赘述了。

#### 四、余论：苏轼与巴蜀文化的不解之缘

苏轼成为苏东坡不是在家乡，苏轼那些震惊中外的美文没有诞生在家乡，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英雄”，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与他的家乡巴蜀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说他所处的时代，与他之前之后进士及第的人还少吗？如果说他的不幸，新旧党争中此起彼伏的倾轧，迁谪受累之人也绝非少数。何以不在文化中心地带的西蜀之人苏轼能够一跃而起，震古烁今？而他人却难以匹敌？个中的缘由不得不在他的家乡，在他成长的土壤中去寻找。

如前所述，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古蜀文化有自己的文明话语和文明体系，这些文明话语和体系我们可以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诸多古蜀文化遗址中窥见和想象。秦并巴蜀之后，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融入到了中原。大禹治水、李冰父子治水，使水患连连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而文翁镇蜀之余又以文化蜀，蜀地得到化育，以至“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蜀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耕读传家的乡风民俗，不断夯实着蜀地的文化底蕴。所以，从西汉开始，西蜀大地文星璀璨，光彩夺目。由于远离政

治中心,长期以来少战乱,自古被称为“大后方”。多次的移民迁徙,不断地改善着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品味,自唐迄宋,高潮迭起,以至蜀郡成都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洵为“西南大都会”。蜀郡之南的眉州,虽为僻远小州,但因离西南大都会成都都不远,唐宋以来也接纳不少南迁名门望族,以至文化家族与家族文化交相辉映,宋时眉州已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而勇立全国文化中心的潮头。民国《眉山志》卷七《选举志》,对两宋眉州登科进士作过统计,有云:“眉州科第莫盛于宋。考旧志及雁塔碑所载,南北两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人。”这还不包括进士甲乙科以下,以及明经诸科等类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州在三百年间拥有如此多的士子登科折桂,实在是了不起的现象。苏轼自然是这八百八十人中的冠冕。俗语云“有数量才有质量”,这是不无道理的。没有良好的社会氛围,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读书之人;没有如此众多的读书之人,要在残酷的科举竞争中成批成片地崭露头角,“群体突围”,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由于蜀地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和不断累积的文化底蕴,蜀之文人普遍具有异于他乡的特异禀赋。他们博览百家,较少束缚;他们想象丰富,敢于标新;他们厚积薄发,兼容并包;他们性格张扬,勇于担当。所以,一旦他们冲出夔门,有了合适的机缘,他们就会脱颖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且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天才。从司马相如开始,直到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莫不如此。而苏轼则无疑是这一地区灿烂星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明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轼是世界的,是中国的,更是巴蜀的,眉山的。

#### 注释

〔1〕 林语堂著,张振玉翻译《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0〕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8〕 徐希平主编《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谭继和《巴蜀文化概说》),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4〕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42〕 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47〕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53〕 参见谭继和《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5期。

〔54〕 谭继和《巴蜀文脉的鲜明个性》,《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1期。

〔55〕 如苏轼《阿弥陀佛颂》云:“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6〕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

〔57〕 参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

〔58〕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

〔59〕 参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60〕 以上参考潘殊闲《叶梦得与苏轼》第三章“叶梦得的学术兴味与苏轼追求”之五“佛禅意趣”,巴蜀书社,2009年版。

〔61〕 [宋]张方平撰《乐全集》卷三十九《文安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 [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卷九《谏政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3〕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 [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魏嵇康集·司马相如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 [宋]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6〕 [宋]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卷中,石林遗书本。

潘殊闲,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 旷世神品，价值连城

## ——兼论苏东坡书法的最高成就在黄州

饶学刚

**内容提要** 本文追述了苏轼《黄州寒食诗贴》所体现的高超艺术成就和卓越艺术价值，及其所包涵的宦海沉浮与书迹流难的传奇色彩，同时提出苏东坡书法的成就当以黄州时期为最高的观点。

**关键词** 《黄州寒食诗贴》 旷世神品 多灾多难 苏轼书法 最高成就 黄州

书法，是抽象的线条艺术，即错落的、曲直交叉的线条和疏密相间而进退有序的结构与章法的艺术。

苏东坡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书家。他的书法理论与书法实践，自成一派，开创了宋代书法“苏体”一派。曾统领一世，风行百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 苏东坡书法的成就当以黄州时期为最高

苏东坡书法遍览晋唐诸家，受益多师。早年远宗王羲之，随后学习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师承李北海，不断地理解、吸收，融化诸家书法之精华，形成了挥洒自如、飘逸苍劲的独特书法风采。

苏东坡书法的成就当以黄州时期为最高。其代表书法作品为《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题大江东去后》等手迹。

藏于黄州东坡赤壁的“大江东去”碑刻，同词本身的风格一样，刚健苍劲，浑厚豪放，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真可谓“别出机杼，自成一家”（杨葆初语），笔力“欲透纸背”，“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董其昌语）。东坡说：“久不作草书，适口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口出也。东坡醉笔。”（《题大江东去后》，元丰六年作）真是想象丰富，曲尽其妙。

其代表理论作品为《杨氏所藏欧蔡书》、《为唐炯作六家书跋》。

元丰三年十二月，东坡在黄州撰写《评杨氏所藏欧蔡书》，揭示了他从唐宋以来书法发展

不凡路程中的艺术追求。他写道：“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汨没者。”“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作《为唐炯作六家书跋》，评述了唐林夫家所藏永禅师、欧阳率更、褚河南、张长史、颜鲁公、柳少师等历代书法家的成就与艺术特点，袒露了他书法的生命在于融会诸家笔意的新体悟。

东坡对书法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其书法美学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提倡书法艺术的个性、自由、创造，摆脱传统束缚，强调天然和字外功夫，追求意趣，把“意”摆在首位。他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子由论书》）“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苞舒醉墨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论书》）

东坡书法很讲究选用文房四宝，也许是他成为书家的一大秘密，是他黄州书法高峰的珍贵元素。东坡说过：“吾平生无所嗜好，独好佳笔墨。”（《付过书》之一）纸必用澄心堂的，墨必用李廷珪的，笔必用诸葛的，砚必用歙地的。元丰三年四月，为杜沂记其父君懿所藏诸葛笔。东坡应试时受过宣州通判杜君懿之诸葛笔馈赠。俟后25年来黄州，那枝笔仍然“良健可用”，且掌握了君懿护笔的方法：“胶笔永不蠹，且润软不燥。”（《书杜君懿藏诸葛笔》）元丰四年八月十五日，与客饮江亭，醉甚，应求书好友郑元舆绢纸。元丰五年三月，书庞安常见遗李廷珪墨。据传东坡收藏墨中许多为李廷珪造，价值很高。庞安常给人治病，“不敢取一钱，独求此墨。”（《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同年，东坡得王齐愈觿砚，以遗蒲宗孟，并作铭，赞扬砚之珍贵：“點、歙之珍，匪斯石也。觿形而觿理，金声而玉色也。”（《觿砚铭并叙》）又作《丹石砚铭》，赞扬唐林夫之丹石砚，“粲然如芙蕖之



出水，杀墨而宜笔，尽砚之美。”

东坡编管黄州期间，还与川僧清悟、老乡王文甫等书家密切往来，切磋文房四宝之技艺，成为千古佳话。



### “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帖》的前世今生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东坡编管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发苍凉惆怅孤独的贬谪人生之叹，在“东坡雪堂”作五言诗《寒食雨二首》：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诗书合一作品。先作《黄州寒食二首》诗，书成后名曰《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纵 33.5 厘米，横 118 厘米，行书，17 行，129 字，无款及年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东坡行书高峰的代表作。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光彩照人，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元代书法家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有后人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文稿》是至哲贤达的风格，《黄州寒食诗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各领风骚，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的前世今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与《画禅室随笔》中曾言：“东坡作书，于卷后余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是的，东坡“高自标许”。《黄州寒食诗帖》书后确实留下后人 11 篇题跋，其

中 7 篇着重记述“诗帖”沉浮的收藏传奇。东坡书迹本文与黄庭坚题跋上夹盖着的 50 多方印鉴，便是《黄州寒食诗帖》颠沛流离的记录。民间与皇室的收藏家，加盖题签藏章，将自己的印记永远留在诗帖书卷上，等于是铭刻了《黄州寒食诗帖》的生命流程。

### 《黄州寒食诗帖》，历代多灾多难。

早在宋代就流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张浩之父张公裕，与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字公择）交往甚密。张浩获得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墨迹之后，立即恳求黄庭坚为此墨迹题跋，并将题跋与东坡的《黄州寒食诗二首》墨迹合二为一，成为张浩传家之宝。

《黄州寒食诗帖》在元代曾归内府收藏。元朝第八位皇帝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耳，在其上钤盖了“天历之宝”。天历为文宗年号。流入清宫后，《黄州寒食诗帖》被列入《三希堂帖》。

清顺治年间（1644～1661），《黄州寒食诗帖》辗转到了益都人吏部左侍郎孙承泽之手。上钤盖有“北平孙氏”、“退谷”之印。清康熙年间（1662～1722），《黄州寒食诗帖》被进士、著名书画家纳兰容若收藏。他在墨迹前后钤盖了不少印章，如“容若书画”、“成德容若”、“成子容若”等等。

《黄州寒食诗帖》卷面下缘有着曾遭烟火烧灼的连续痕迹：一说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黄州寒食诗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由广东高要人陕西巡抚冯展云收藏。二说清同治年间（1862～1874），《黄州寒食诗帖》为广东冯展云（字誉骥），收藏后遭遇火灾，故其下端留有燎痕。冯氏死后，《黄州寒食诗帖》为山东省主考官国子监郁华阁主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清末民初收藏家完颜景贤（字朴孙）购得。清宣统年间，《黄州寒食诗帖》又被意园主人收藏。

到了近代，《黄州寒食诗帖》命途多舛。1917 年冬月，完颜朴孙在燕京书画展览会上，将《黄州寒食诗帖》长卷公开展览，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 年，《黄州寒食诗帖》辗转到了连平贵族颜韵伯（世清）手中。当年 12 月 19 日为纪念东坡 883 周年诞辰，颜韵伯特将此墨宝的辗转递藏之过程略述其后。1922 年，颜韵伯游览日本江户时，将《黄州寒食帖》长卷以重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

1923 年 9 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黄州寒食诗帖》抢救

出来。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黄州寒食诗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半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诗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

《黄州寒食诗帖》流失海外，让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崇阳人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黄州寒食诗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1987年，其子以高价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 《黄州寒食诗帖》旷世神品，饮誉全球

苏东坡平生酷爱写字，“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把书法看成是“静中自是一乐事”，“聊寓其心，忘忧晚岁”（《苏轼论书》）的一种精神寄托。自评“行草尤工”。东坡编管黄州初期，心灰、郁闷、彷徨，奋笔疾书《黄州寒食诗帖》，诗书显现得苍凉、惆怅、孤独，迅疾稳健，一气呵成，起伏跌宕，交相辉映，充溢着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评述《黄州寒食诗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佳篇，自古至今，美不胜收。我在此毋须赘述。最好的评价是让历史公论说话。

东坡《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等诗文书法艺术作品，对后世崇尚意趣的文人书法风格者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历代鉴赏家对《黄州寒食诗帖》推崇备至，评价极高，称它是一篇旷世神品。

北宋绍圣四年（1097），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一见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墨迹，激情难抑，当即跋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元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南宋初年，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侄孙张縠在诗稿后另纸跋曰：“老仙（东坡——笔者）文笔高妙，灿若霄汉、云霞之丽，山谷（黄庭坚——笔者）又发扬蹈厉之，可谓绝代之珍矣。”“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

南宋理学家朱熹评说：“东坡笔力雄健”，“其英气逸韵，高视古人。”（《朱熹序跋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评说：“东坡书如老熊昼游，百兽畏伏。”（《书法艺术》，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

元代书画家倪瓚评说：东坡的书法是“才德文章溢而为此”。（黄苗子、郝家林《倪瓚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明代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在帖后题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帖为甲观。已摹刻于《戏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评说：“坡翁奇气本超伦，挥洒纵横欲绝尘。直到晚年师北海，更于平淡见天真。”（《论书绝句三十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初八，乾隆帝跋曰：“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已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坡论书诗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又云。读书万卷始通神。若区区于点画波磔间。求之则失之远矣。乾隆戊辰（1748）清和月上澣八日御识。”盖“乾隆”、“几暇临池”、“乾隆御览之宝”等印于帖后。为彰往事，又特书“雪堂余韵”四字于卷首。“雪堂”和“余韵”间有乾隆的大红印章一枚。

1913年2月，晚清学者、藏书家梁鼎芬（字星海），题签云：“宋苏文忠《黄州寒食诗帖》真迹，张文襄称为海内第一。意园物献龛藏。宣统癸丑二月，梁鼎芬题记。”

清末官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字泉孙）评说：“用笔沈著中有飞舞之势，盖兴到之作，纯乎天机者也。……曾刻入《三希堂帖》中。……此卷著录不止一书，摹刻不止一帖，苏书中之甲观也。辛亥夏日，见于友人处，云是盛伯羲祭酒郁华阁中旧藏，后闻归连平颜氏矣。”（《选学斋书画寓目记》卷上，民国间刻本）

连平贵族颜韵伯跋曰：“东坡寒食帖山谷跋尾。历元明清。叠经着录。咸推为苏书第一。”

近代学者、清学部二等谥议官、参事官罗振玉（字叔言）跋曰：“先师张文襄公嗜东坡书。光绪壬寅，公建节武昌，客有持此卷请谒，公赏玩不置，谓平生所见苏书墨迹，以此卷及内府所藏桤木诗为第一。客喜甚，言将奉献，微露请求意。公曰：‘时已仲春，貂裘适可付质库，若以价相让，当留之，否则不敢受也。’客大失望，因求公题识，时方向夕，公乃张宴，邀端忠敏梁文忠马季立孝廉与予同赏之，且语众曰：‘如此剧迹，不可不一见。明日物主人将以北行矣。’时物主方在座，喻公意，乃亟请曰：‘若许加题，当迟行程一二日’，公曰：‘山谷老人谓此书兼鲁公少师李西台之长，某意则得法于北海与鲁公。然前人所言，乌可立异。且文节为东坡老友，某安敢窃议其后’，卒不允。主人因请坐中诸人，亦无敢下笔者。客乃惘惘挟此

卷北归，故今卷中无公一字。文襄事功昭昭在人耳目，而持躬严正，不可干以私，即此一事，可见一斑。此事予在武昌官寺所亲见。今重观此卷，退忆往事，爰书之卷后，以记公之清风亮节。当日与诸公并几展观情况，宛在目前，公与忠敏文忠，既先后骑箕天上，季立亦委化，惟白头门生，尚在人世耳。瑰宝重逢，曷胜忻慨。甲子仲夏，上虞罗振玉书于津沽寓居磬砚斋。”

日本内藤虎跋曰：“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引首乾隆帝行书。雪堂余韵四字。用仿澄心堂纸致佳者。东坡诗黄山谷跋并无名款。山谷跋后。又有董玄宰跋语。张青父清河书画舫云。东坡草书寒食诗。当属最胜。卞令之书画汇考亦已着录。阮芸台石渠随笔云。苏轼黄州寒食诗墨迹。卷后有黄鲁直跋。为世鸿宝。……”

《黄州寒食诗帖》复制品只有10件。大部分被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两件则下落不明。1975年前后，日本友人著名的“东坡迷”山上次郎，花巨资买下了台北展厅中的最后一幅复制品。1985年11月2日，山上次郎率日本“东坡参观访问团”来到湖北黄州东坡赤壁。出于对东坡的景仰与钟情，他将高价购得的《黄州寒食诗帖》卷轴复制品捐赠给东坡赤壁管理处，它因而成为在中国大陆的唯一珍品。1995年，又经山上次郎倡议，在东坡赤壁修建了“中日友好之舍”，首次公开展出了《黄州寒食诗帖》卷轴复制品。

1995年4月6日，为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台湾邮政部门发行专346“寒食帖”邮票一套4枚，横式四连张印刷，邮票全张4套，边纸上印有黄庭坚的《寒食诗跋》。同年底，黄州市中兴实业集团公司也推出两枚“黄州赤壁”企业拜年卡，其中第2枚（编号1996鄂BK—0003）主图为“寒食帖”（部分）。这两种精美的邮品一问世，即成为海内外集邮、书法爱好者竞相购藏的珍品。

2006年，黄冈市开工建设的遗爱湖公园入口处，竖有气势磅礴的《黄州寒食诗帖》碑刻，为遗爱湖公园的一大靓丽风景。2010年，遗爱湖公园内建成苏东坡纪念馆，馆内陈列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的《黄州寒食诗帖》，并编入大型画册《千古东坡》。实为黄州人的历史荣耀与时代骄傲。

英雄东坡，名邦黄州。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所包涵的宦海沉浮与书迹流难的传奇色彩，让当今世人饱尝价值连城的中华国宝神韵和东坡书风魅力。时至今日，东坡的人格、学问、书法，交相辉映人间，仍是国人和世人心向往

之的师法典范，东坡书风长存。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上接第24页）

#### 注释

- [1] 左丘明著、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
- [2]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 [3]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 [4] 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 [5]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6]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7] 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
- [8]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 [9]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 [10]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1]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12]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13]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庆振轩，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沂璐，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说略

陈建裕

**内容提要**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主要有拔秧说、插秧说、综合说三种。研读苏轼诗文，苏轼极力推广的秧马是供农民拔秧、插秧骑坐的农具。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众说纷纭的原因是：研读苏轼诗文不够深入，权威工具书的影响，以文献记载差误和当今秧马的用途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

**关键词** 苏轼 秧马 用途 拔秧 插秧

四川眉山三苏纪念馆、平顶山市郏县三苏纪念馆苏轼展厅中，都展陈着秧马复制品。秧马是一种古老的农具，在中国农具发展史上，秧马首见于苏轼的《秧马歌（并引）》。<sup>[1]2051~2052</sup>苏轼极力推广秧马，以减轻农民劳作之苦，秧马是苏轼“民本”思想的实物见证。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的一些稻作区还在使用秧马，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秧马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历史舞台，今天然稻作区的很多人已不知秧马为何物，一些农史专家对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的用途也语焉不详。

## 一、苏轼有关秧马的著述

北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以“讽斥先朝”之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途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见农夫田中弯腰插秧时的艰难情状，便忆起谪居黄州（湖北黄冈）时在武昌见农夫所用的能减轻劳作之苦的农具秧马，遂作《秧马歌（并引）》：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

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橈行泥上。岂秧马之类乎？作《秧马歌》一首，附于《禾谱》之末云。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剌齐。  
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  
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  
竿踊滑汰如凫鹭，纤纤束藁亦可赍。  
何用繁纓与月题，却从畦东走畦西。  
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  
少壮骑汝逮老鹄，何曾蹶趺防颠隤。  
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  
不知自有木騊駼。<sup>[1]2051</sup>

其后，苏轼作《题秧马歌后》四首：<sup>[2]2152~</sup>

2153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抃，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以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美，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琯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美儿子……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林博罗又云：“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



以梘木，则滑而又轻矣。”又云：“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

翟东玉将令龙川，从予求秧马式而去。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辄百余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

此外，《东坡志林》卷六亦提到秧马：“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sup>[3]9</sup>

苏轼《秧马歌（并引）》及题《秧马歌》后四首等，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著录农具秧马的最早文献，诗文中涉及到秧马的起源、形制、用途及推广地区等。此后历代诗文及农书都有一些有关秧马的记叙。

## 二、秧马用途诸说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拔秧说、插秧说、综合说三种。

### （一）拔秧说

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于拔秧的说法最多。例如：

刘崇德《关于秧马的推广及用途》：“人们误解了苏轼的《秧马歌》，误把秧马当作了插秧的农具，实则这是一种用来起秧的农具。”<sup>[4]199</sup>

李群《“秧马”不是插秧的农具》：“其实，苏轼已经给我们指明了：‘系束藁其首’，这完全是拔秧的需要……。由此可见‘秧马’是拔秧用而不是插秧用的。”<sup>[5]50</sup>

雷于新等《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秧马是南方水田用于拔秧的一种农具……，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曾作《秧马歌》予以称颂。”<sup>[6]188</sup>

江国宏《“秧马”并未失传》：“苏东坡所说的‘秧马’并不如赵丽宏先生所说，‘是用来插秧的一种农具’，而是用来拔秧的。”<sup>[7]23</sup>

曾雄生《水稻插秧器具蒔梧考——兼论秧

马》谈苏轼推广的秧马说：“我认为秧马为一种辅助拔秧的农具。”<sup>[8]125</sup>

王瑞明《宋代秧马的用途》<sup>[9]243</sup>、章楷《关于秧马》<sup>[10]207</sup>等，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于拔秧（或叫起秧）。

### （二）插秧说

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于插秧的说法也较多。例如：

王家琦《水转连磨、水排和秧马》：“北宋的文学家苏轼在公元十一世中过武昌时曾经看到农民使用秧马。……使用秧马，插秧快，不劳累。”<sup>[11]36</sup>

虞澄《水车秧马入诗来》：“秧马就是插秧船，可以说是插秧机的前身，在当时是先进的农业机具。苏轼在湖北见到，后来，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陆游在浙江绍兴也见到过。”<sup>[12]56~57</sup>

罗庆芳《关于“秧马”的探析》：“苏轼看到的秧马用于插秧，而且是坐在秧马上插秧。”<sup>[13]120</sup>

孙振誉《古诗今译：苏轼“秧马歌”》：“早在一千年前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用诗歌来歌颂推广当时发明的一种水稻插秧新农具——秧马，农民可坐在上面插秧。”<sup>[14]79</sup>

王若昭《我国古代的插秧工具》<sup>[15]92</sup>、郭隽杰《苏轼与秧马》<sup>[16]</sup>等，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于插秧。

### （三）综合说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综合说认为，秧马既用于拔秧又用于插秧。例如：

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由于苏轼见到的‘秧马’，既可用于拔秧，也可用于插秧……。而且诗人的感情是更偏向插秧的。”<sup>[17]648</sup>

万方《中国古代日用器物图——秧马》谈到苏轼所歌秧马说：“秧马是一种既可用于拔秧也可用于插秧之器具，在秧田作业时用以乘坐，借以减轻农夫的劳动强度。”<sup>[18]1</sup>

陈伟庆《宋代秧马用途再探》：“作为宋代出现的农具‘秧马’，由于苏轼的作品而为世人所知。其形状颇似小舟，前后翘起，中间凹陷，方便农民骑坐，因此可减轻劳作时的弯腰之苦。秧马不仅可以用于插秧，也可以用于拔秧，在生产中能显著地提高农作效率。”<sup>[19]118</sup>

王颀等《桐马禾云——宋、元、明农具秧马考》<sup>[20]7</sup>、伍晴晴《秧马》<sup>[21]57</sup>、汪泽宇《传家宝——秧马》<sup>[22]58</sup>等，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既可拔秧又可插秧。

也有人认为秧马兼可运秧。例如：成炳衡《秧马有什么作用》：“至于发明秧马的目的……，而骑着秧马扯秧，既相对轻松，还能

将秧苗运到陇边”<sup>[23]46</sup>。今四川眉州三苏纪念馆展陈的秧马复制品，腹部（即底部，与泥水接触的木板），形状像小船，长约2米，宽约50厘米。因秧马腹部太长，人坐在上面拔秧、插秧均不可能，只能用于运秧。

### 三、苏轼诗文所载秧马是供农民拔秧、插秧骑坐的农具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究竟有什么用途？答案最好还是从苏轼记载秧马的诗文中去寻找。

#### （一）苏轼诗文所载秧马可用于拔秧

证据之一，《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二：“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意思是说，弯腰曲背在田里干活，不只腰背受苦，而农夫们都在腿上打洗秧苗，时间长了，小腿都腐烂生疮。现在有了秧马，就可以在秧马的两个小颊子上打洗秧苗，这就可以保全小腿了。

打洗秧苗是拔秧的必有环节，“于两小颊子上打洗”秧根，可证秧马用于拔秧。

证据之二，《秧马歌并引》：“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意思是说，在秧马之首系着一束草，用来捆扎秧苗。

笔者生活在稻作区，骑坐秧马拔秧是栽秧季节经常干的农活。在下田拔秧之前，要准备一把捆扎秧苗的草，一般是用经过挑选的韧性好的稻草。秧苗拔出后，洗去秧根附着的泥后，用稻草捆扎成粗细基本一样的秧把。“系束藁其首以缚秧”，可证秧马用于拔秧。

秧苗拔出来后，首先就是洗去其根系带有的泥，然后用草捆扎成把，这是拔秧必有的程序。以上两条记载是秧马用于拔秧的有力证据。

#### （二）苏轼诗文所载秧马也可用于插秧

证据之一，《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一“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意思是说，林君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农夫制作秧马试验，认为秧马的背虽然应当像覆瓦一样，但必须让其头尾翘起如马鞍状，以便使其前后挪动有力。

这段话强调必须让秧马背部（供人骑坐的部位）头尾翘起如马鞍状，以便秧马向前移动或向后移动时有力。如果秧马只用于拔秧，秧马向前挪动有力就可以了，因为拔秧秧马只向前挪动，不向后挪动；如果秧马用于插秧，就要考虑向后挪动是否有力，因为插秧是向后退着插的。林君制作秧马考虑向后移动是否有力，正是考虑秧马用于插秧的需要。“使前却有力”可证秧马用于插秧。

证据之二，《秧马歌并引》：“日行千畦”“却从畦东走畦西”“忽作的卢跃檀溪”。“日行千畦”，是夸张地说秧马每天跑一千畦；“却从畦东走畦西”，是说秧马一会儿在畦东一会儿跑到畦西；“忽作的卢跃檀溪”，是说秧马突然如的卢跳出泥田。

这几句话有一个意思表达是一致的：秧马速度非常快。有稻田耕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秧马用于拔秧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如果秧马仅仅用于拔秧，苏轼这样快形容秧马速度是很不恰切的。插秧行进速度比拔秧快得多，至少十倍于拔秧，苏轼《秧马歌并引》形容的秧马速度只有秧马用于插秧才配得上。

证据之三，《秧马歌并引》：“腰如箠篲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意思是说，农民插秧时，腰弯得像箠篲一样，头像鸡啄米一样（插秧时的典型动作），精疲力竭身体剧烈酸疼。幸好有桐木秧马手中提……。

“腰如箠篲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此写未使用秧马前农夫插秧之苦。紧接着苏轼笔锋一转说“幸有桐木秧马手中提……”是写使用秧马后，农夫痛苦大大解除，“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这不正是说明了秧马可以用于插秧吗？

苏轼诗文虽然未有明确说明秧马用于插秧，但字里行间透露秧马用于插秧的意义是很容体会出来的。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是供农民拔秧、插秧骑坐的农具。

### 四、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众说纷纭的原因

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众说纷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 （一）研读苏轼所载秧马诗文不够深入

许多人坚持认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只用于拔秧，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苏轼诗文中很明显的描写秧马用于拔秧的字句；隐含于文字中的秧马用于插秧的意义没有体会出来。此问题上文已析，此不赘述。

#### （二）权威工具书的影响

许多论者在讨论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时，常引权威工具书为证。殊不知权威工具书对秧马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例如：

《辞源》：“插秧所用的农具。”<sup>[24]2304</sup>

《汉语大词典》：“古代农民拔秧时所坐器具。形如船，底平滑，首尾上翘，利于秧田中滑行”。<sup>[25]70</sup>并引苏轼《秧马歌》例。

《辞海》：“木制古农具。形如小船，前后

翘起。在水田拔秧或插秧时，跨坐其上，脚蹬滑行，可减轻劳动强度。”<sup>[26]</sup>1970

《辞源》“插秧说”、《汉语大词典》“拔秧说”、《辞海》“拔秧或插秧说”等权威工具书的影响，是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

### （三）以文献记载差误和当今秧马的用途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

秧马这种制作并不复杂的农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制、用途等有继承也有发展，这种发展变化更可能导致古代文献记载有差误，因此不能以文献记载差误和当今秧马的用途，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

首先，我们不能以文献记载有差误，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元代王祯《农书》秧马图被许多人所诟病，并以此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例如，王晓莉《秧马用途之我见》：“苏轼《秧马歌》中描述的秧马，其用途是拔秧而不是插秧。王祯《农书》引录苏轼《秧马歌》并谱以秧马图，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他却弄错了秧马的用途，谱出了一张与《秧马歌》不相符合的图画，造成了后人的误解。”<sup>[27]</sup>70 我们认为，元代王祯《农书》秧马图可能在秧马绘图比例上有差误，其它如秧马形制、用途上无多大错误，明代徐光启照搬此图用于自己的《农政全书》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元明清三代描写秧马用于插秧的文字很多<sup>[17]</sup>636~639，这正说明后代秧马继承了宋代秧马的插秧用途。王晓莉先生认为王祯《农书》所绘秧马图有差误，进而否认苏轼诗文所载秧马有插秧用途，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我们不能以今天秧马用途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例如：尹美禄《〈秧马歌〉碑及秧马的流传》：“笔者出身于农村，眼见过农家都是乘坐在秧马上用手拔秧，自己也曾亲身使用过它，未见过用秧马来作插秧的工具。”

<sup>[28]</sup>176 秧马自宋代发展到现在，有上千年历史。今天我们在南方稻作区，还能见到秧马，但形制、用途与苏轼诗文所载秧马已有不同。今天的秧马，形制上有的变成秧凳、秧船；用途上有的只用于拔秧（郟县三苏纪念馆秧马复制品只能用于拔秧），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秧马用途来否定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途。尹美禄先生以自己所见所用秧马来否认苏轼诗文所载秧马用于插秧，是有失偏颇的。

###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4] 《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 《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6] 雷于新等著《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7] 《咬文嚼字》，2004年第2期。

[8] 《中国农史》，2014年第4期。

[9]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10] 《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11]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12] 《新闻通讯》，1984年第8期。

[13] 《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14] 《基层农技推广》，2013年第9期。

[15] 《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6] 《光明日报》，1983年2月26日。

[17] 周昕著《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8] 《书屋》，2007年第10期。

[19] 《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

[20] 《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21] 《农业技术与装备》，2012年第9期。

[22] 《中华家教》，2015年第6期。

[23] 《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4]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5]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

[26]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27] 《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28] 《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陈建裕，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教授。

# 苏轼贬逐期回归自然的因缘与方式

郑秉谦

**内容提要** 苏轼天性接近自然，但因从仕而逐渐淡化；两次遭遇贬逐，却又使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归自然，晚年更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键词** 苏轼 贬逐 回归自然 独特方式

苏轼从小喜欢接近自然，子由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尝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下，擷林卉，拾涧石，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武昌九曲亭记》）<sup>〔1〕333</sup>在苏轼自己的诗文书信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讲到自己自少欲隐匿山林：“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与王庠五首》）<sup>〔2〕1820</sup>，“轼韶髫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遁。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与刘宜翁使君书》）<sup>〔2〕1415</sup>亦即自少欢喜与大自然合一，但婚宦之后，离自然渐远。而他后来两次遭贬，又使他逐渐回归自然，实现天人合一。

他22岁中举出仕，虽主要活动于官场，仍很倾慕山林。任凤翔签判三年间，游遍太白、终南二山，在汴京任职期间，也常参加“西园之会”一类雅集。在杭当通判以及担任密、徐、湖诸州知州时，遍游辖境。他更利用从一州调往另州的途中，作数月之游。但是，使他真正回归大自然的，则是黄、惠、儋三州的贬逐期。他的朋友晁以道曾告人说：“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晚贬岭外，无一日不游山。”（《蒙斋笔谈》）<sup>〔3〕72</sup>后又贬儋，也常“行歌田亩间”，或爬山涉水：“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绿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伏洄，舍舟步层丘。”（分见《侯鲭录》、《和陶游斜川》）<sup>〔3〕2318</sup>

苏轼回归自然，颇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不求名山大川，而能安于普通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他倅杭时，有位言上人，把他主持的寺庙林园，精构细作，曾将面粉一类白色粉末，洒在其中的草木上，缔造雪景，自号“雪斋”。苏轼贬黄，杭州的友人们相约醵钱购物，定期雇人送往黄州；言上人也在内。苏轼曾给言上人复信：“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与言上人二首》）<sup>〔2〕1892</sup>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醉心于那儿的自然景色。刚到黄州，便赞扬这里“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sup>〔4〕1032</sup>；到惠州不久，又写“海山葱胧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寓居合江楼》）<sup>〔4〕2071</sup>、“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sup>〔4〕2103</sup>、“罗浮高万仞，下看扶桑卑”（《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sup>〔4〕2116</sup>。在将近儋州的途中，便写风雨中的群山，“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行琼、儋间，肩輿坐睡……》）<sup>〔4〕2247</sup>他对贬地每个他住的地方，都觉得其自然环境绝好。在黄州是临皋亭，“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州，在几席上，此幸未尝有也”（《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三）<sup>〔2〕1442</sup>；“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际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王庆源十三首》其五）<sup>〔2〕1813</sup>；“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而饮之”（《与朱康叔二十首》其五）<sup>〔2〕1786</sup>；“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雪月，阴晴早暮，态状万千，恨无一语略写其仿佛耳。”（《与上官彝三首》其三）<sup>〔2〕1713</sup>并因自己乡愁颇浓，他又将眼前的大江顺理成章地与蜀地支流岷江扯上关



系。从他的诗词中可知,当时大江乃一派碧流,不像如今浑浊:“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sup>(5) 386</sup>又说:“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与范子丰八首》其八)<sup>(2) 1453</sup>眼前的这一条江,既泻尽了他心底悒郁,又稀释了他的乡愁,他因此这么赞美临皋景色就不难于理解了。他在惠州前后住过三处:一是风雨不蔽的嘉祐寺,二是广东提刑、他表兄程之才为他争取来的合江楼,三是程任满北上后他自己买地造屋二十间的白鹤新居。在他眼中,这三处的风光都好。监司行衙合江楼不用说了,它位于东江及其支流会合处,水面开阔,“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六十)<sup>(2) 1616</sup>他甚至作游仙之词:“海山葱朧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寓居合江楼》)<sup>(4) 2072</sup>白鹤峰呢?这是苏轼亲选的造屋处,“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答毛泽民七首》其五)<sup>(2) 1572</sup>;“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只此便是东坡新文也。”(《与陈伯修五首》其五)<sup>(2) 1558</sup>甚至那个不蔽风雨的嘉祐寺,在他眼中,风光仍然出色:“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和陶移居二首》其一)<sup>(4) 2192</sup>这三个不同环境的居处,在他眼里却只一个相同的字:美。他还写过一首同时称赞这三处的诗呢:“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青山满墙头,鬢髻几云髻。”(《迁居》)<sup>(4) 2195</sup>到了儋州,军使张中以“僦”为名将新修成的伦江驿给他居,但为章惇的党羽董必使知,又派人将他逐出。于他只得在南污池侧造“桄榔庵”自居。此时他已囊中无钱,此庵是他几十个学生亲躬泥水之役为他造的。因受牵连而去职的州守张中,也动手帮他“锄土”。造成后,他虽认为只是一个“蛮坞洞寮”,但还是以它的自然环境自慰:“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数朝风景凉,畦菊

发新颖。”(《新居》)<sup>(4) 2312</sup>他的这种随遇而安、随住而乐的特点,使他很容易与贬地的大自然相互融合,而回归自然。

苏轼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大自然给予他山水、树木与花卉,他就能快乐地安处其中,并不吝嗇他的赞美。对宏观环境如此,对一草一花也能作微观的欣赏,发人所未发。他在黄州东门见了一株海棠,首先将它人格化以比自己:“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其次又以人为本,用美人的衣着、形态、风韵、性格,来形容这种名花:“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寓住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sup>(4) 1036</sup>自古诗人都以花比人,如李白以“一枝红艳露凝香”比杨太真;而东坡常以人喻花,如此首就是。他在黄州还曾同样细致地观察与欣赏过红梅:“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红梅三首》其一)<sup>(4) 1107</sup>到惠州,则又尽情地描写与欣赏普通梅花。当时他写过一首《朝云诗》,在其“引”中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sup>(4) 2073</sup>朝云秀外慧中,苏轼以为只有梅花可比。而惠州独多梅花,苏轼观察梅花,欣赏梅花,也以朝云来形容梅树的形态、性格与风韵。“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sup>(4) 2075</sup>,“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再用前韵》)<sup>(4) 2076</sup>,“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花落复次前韵》)<sup>(4) 2078</sup>“月下缟衣”是形态,“玉雪为骨冰为魂”是精神,苏轼写尽了梅花也写尽了朝云。但这三首诗还只是写了梅花的整体,尚未触及细部;而追悼朝云的《西江月·梅花》<sup>(5) 730</sup>,则两者都兼顾了。据释惠洪《冷斋夜话》:“岭外梅花与中国(中原)异,其花几类桃花之色,而唇红香著。”<sup>(3) 224</sup>词中的“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是整体;“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褪唇红”,是细部。两者的结合,是岭外梅,是朝云。再如苏轼在岭外写

荔枝，也是如此：“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sup>〔4〕2121</sup>也是从形态到风韵，刻画入骨。东坡以自己的性格与诗情欣赏岭外梅树与荔枝，走入自然，消释悒郁，取得逍遥自适。

他融入自然，却不择地择物，也不择时择节。三国董遇，有三余读书之说，苏轼则改之为三余游山玩水。他不仅“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sup>〔4〕1186</sup>，而且多次夜游赤壁，元丰三年七月十五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赤壁赋》）<sup>〔2〕5</sup>；十月十五日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sup>〔2〕8</sup>；又，不知哪年的八月初五夜，“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与参寥子二十一首》其五）<sup>〔2〕1861</sup>；还有未记年月日的某夜，他“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乃作歌词，”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避暑录话》）<sup>〔3〕71</sup>他晚年被贬惠州，常常夜游丰湖；后来贬儋，又作郊行步月诗：“缺月不早出，长林踏青暝。犬吠主人怒，愧此闾里情。怪我夜不归，茜袂窥柴荆。云间与地上，待我两友生。惊鹊再三起，树端已微明。白露尽原野，始觉丘陵平。暗蛩方夜绩，孤萤亦宵征。”（《和陶赴假江陵夜行》）<sup>〔4〕2259</sup>与他不择时出游同样，他还不择节令出游。他在惠州曾写道：“岭南气候不常。吾尝曰：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江月五首并引》）<sup>〔2〕2140</sup>只要菊花开放，天天都是重阳；只要月光普照，夜夜都是中秋。能如此，那么亲近自然的机会就比别人多了，在亲近自然中所见所感也就比别人多了。

在仕宦途中，有所求，终日营营，终日碌碌，是个忙者。忙者并不是不见江山风月，而是见了只是见了，并不曾把它与造物者联系起来。在贬逐中的闲者便不同了：一是他们能发现忙者未能发现的美丽，二是他们能与大自然沟通，而顿悟其中的乐趣。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解衣欲睡，但见月色入户，又欣然起行。到承天寺找同是贬官的张怀民去。他把怀民叫到庭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

交横，盖竹柏影也”，这就是忙者所无缘发现的了。这是一。“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sup>〔2〕2260</sup>，他大彻大悟，他俩有缘发现这大自然的妙处，关键在于他俩已成了“闲人”了。成了闲人，便能同大自然对话，享受大自然为他俩准备的一切。这是二。这便是对大自然的回归。同样，东坡一早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看见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耸入。这也不是“忙者”所能发现的。这是一。“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书临皋亭》）<sup>〔2〕2278</sup>被朝廷所弃的“闲者”们，此时享受大自然为他们所准备的一切，使他们不能不满足到连呼惭愧。这是二。同样，他在《与范子丰八首》中，指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sup>〔2〕14</sup>；在《赤壁赋》<sup>〔2〕6</sup>中指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这些都是为朝廷、为主流社会所弃的“闲者”们的专利。

在官场中的苏轼，是个“忙者”，即使所居所游处不乏花树、丘壑；但由于意不在此，他并未与花树、丘壑合而为一。唯有一贬再贬，成为闲者，他方能在山水风月中见到大自然，实现天人合一。这方是人们自叩内心、追索人性的境界，也方是对自然的回归。但究其实，这种回归，除了追求天人合一的襟抱外，也只是被贬逐者躲避痛苦的一种方法。

#### 注释：

- [1] 苏洵、苏辙撰《苏洵苏辙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3] 颜中其编《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
- [4]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5]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 [6]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郑秉谦，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作家，温州大学兼职教授。

# 论东坡词中的“孤鸿”意象

## ——以《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为例

艾茂莉 王 斌

**内容提要** 意象即作者要表达之“意”与所借助之“象”的完美、有机结合。在古典文学中，意象的运用分两种情况：一是较浅显的运用，即一种意象在长期的、大量的运用中，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美学内涵；二是具有稳定内蕴的意象在具体作品里，被赋予深刻而独特的内涵，与平常使用时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区别开来。苏轼词中的孤鸿意象就属第二种。

**关键词** 意象 孤鸿 苏轼

### 一、“意象”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因为“意象”一词不仅是由我国古代文人创造的，而且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运用。“意象”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衡·乱龙》里：“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sup>[1]923</sup>刘勰《文心雕龙》也说道：“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sup>[2]187</sup>此意象即表意之象，借助一定的形象来传达一些意义。其目的有二，一是化具体为抽象，即化实为虚。比如，以“龙”象征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坚韧、明礼诚信的民族性格。另一个目的则是化抽象为具体，即借象表意。比如，古人常借“月”来抒发思乡之情，杜甫的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即是。

意象的出现有以上的文化背景，但它的发展和完善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首创期的诗人们通过起兴手法，简单地列出形象，却并未深刻地考虑它同主观意义的联系。如《诗经》中的“蒹葭”、“雉鸣”等。虽然后人给予了一定的合理解释，但这种解释多是从事物本身的相似性出发，当时的作者是没有仔细考虑这些的。

不过，这种风气一流传开来，中国诗词就开始广泛使用意象来表达情感了。

意象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比较鲜明的独特的意象在经常用于表达某种情感后就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不再仅仅具有文学上的意义了。如“柳”作为惜别和留恋的象征，“月”作为故乡和思乡的表征，“乔木”作为故国的象征等。这些意象在长期使用后，就已经符号化了，缺乏审美个性，不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另外一种运用意象的情况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将典型的传统意象与自己的独特个性结合起来，于传统中含新义。比如，余光中的《夸父》中用象征岁月流逝的“落日”来象征逐渐落后的西方文明<sup>[3]233</sup>；苏轼的《卜算子》中用表示秋季、战乱、孤单等传统含义的“孤鸿”来象征高贵、孤独的自己。这种创新，主要是因为诗人们选用的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其代表多层含义提供了物质载体，而每一种具体含义的关联与交叉又为表现更深层、更复杂的含义提供了理念基础。下面我就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来谈谈相关问题。

### 二、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与作者自己

苏轼《卜算子》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初贬黄州、暂居于定惠院时所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sup>[4]249</sup>

这首词运用了许多意象：缺月、疏桐、（滴）漏、孤鸿、寒枝、沙洲。其中有些意象具有传

统意义，但作者并未运用这些典型意义。如，月虽代表故乡，但在这里用一个“缺”字修饰，只是起到交代时间和环境的作用；孤鸿一般表达孤独、象征秋天以及比喻战乱时的流民，但这里却具有崭新的意义——象征自己的高尚人格。

词的一、二句，写夜深人静时，一弯缺月挂在枝叶稀疏的梧桐树上。用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表现场景：月是挂在天空的，但透过梧桐的枝叶看去，却觉得月亮是挂在枝头上。这就暗示：本来自由的月被挂在枝头，就像本来自由的作者被贬谪，固定在偏僻的黄州。而月之“缺”象征不圆满，恰好表示作者的不如意，桐之“疏”则暗示了黄州的偏僻。作者在“漏断”之时还未眠，明写自己的愁绪。三、四句最意味。其中的“谁”在许多版本中都作“时”，在意思上和情景上都不好讲，《苕溪渔隐丛话》作“谁”，深合东坡原意。在这两句中，出现了两个看似独立实际上却相关联甚至统一的意象：幽人，孤鸿。“诗无达诂”，我们且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作分析。

“谁见幽人独往来？”此处“幽人”是有着愁绪的人，并用一个“独”字明写出幽人的孤独。此句发问突兀。字面意思有二：一是在这个人们都熟睡的漏断时刻，还有谁看得见幽人孤独地往来？强调幽人的孤独，语气重心在“谁”字上。与此对应，下一句就该讲为：只有缥缈的孤鸿能看见“幽人”的孤独。两句就构成问答之势，幽人与孤鸿成了相对立却相关联的具体意象。这种解读从客观上强调了幽人的孤独、忧愁，用孤鸿来作侧面烘托。二是将语气重心放在“幽人”上，义即在这月光暗淡的深夜，谁能够看见在暗夜来往的人呢？“幽人”即在暗夜往来的神秘之人。和下一句联系起来，就是说在这深夜，是看不见来往之人的，只能看见夜空中飘渺的孤鸿之影。两句构成转折关系。这样，幽人的意象就基本消失，作者自己就成了孤鸿的原像。这样解读，从主观方面读出了作者的孤独：他看不见其他的来往之人，只能看见夜空孤鸿的影子，“这孤鸿的影子怕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吧”！

下阕，“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前两句既是写孤鸿之

“恨”，也是写作者之恨。孤鸿恨什么？非恨自己不听首领的话而导致如今离群索居，这从后面的高洁形象可以看出。它是恨自己同伴的背弃、排挤。而这种恨在孤单一人之时，是无人了解、宽慰的，故云“有恨无人省”。这和作者自己受新党、旧党的排挤，孤独愁闷无人了解完全相同。最后，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实际上就是作者高洁品质和迷茫情绪的综合体现。孤鸿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歇息？还要拣尽寒枝？就因它太高贵，思想上太卓尔不群。在深夜都无处可栖的孤鸿实际上也是悲观迷茫的——找不到归宿啊。所以，这和作者的主观情绪完全吻合。最后一句，意义深远。可以作“拣尽寒枝不肯栖”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寂寞冷清的沙洲根本就不是高洁的“孤鸿”所向往之地，偏僻的黄州也不是苏轼大展宏图之地！也可以作一句宽慰之词——为何“拣尽寒枝不肯栖”？沙洲寂寞又冷清，你就随便找个枝头栖息吧，天明了再追逐你的理想。前一种解释可以看出作者的高洁、忧愤，后一种解释可以看出作者的超脱、旷达。而这两种解释对于苏轼来说，都是合理的，合乎其性格，能够综合理解最好。所以，在这里，孤鸿与作者本人已经完全融合了。

### 三、传统意象幻化新义

“孤鸿”作为一个曾被广泛使用的传统意象，内涵是相对稳定的。一是表达孤独的情绪，从“孤”字就可以明显看出。如唐钱起《七盘岭阻寇闻李端公先到南楚》“阮肠暗与孤鸿断，江水遥连别恨深。”<sup>[5]2673</sup>二是表达时间概念——深秋，秋季大雁成群南飞，孤鸿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深秋了。如唐贾至《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之一“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sup>[5]2598</sup>三是传达哀伤的情感，孤鸿落伍有性命之虞，故孤鸿多“哀鸣”。如唐鲍溶《悼卢策先辈》“远客迷畏途，孤鸿伤一翼”。<sup>[5]5514</sup>四是表达高傲品质和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志向。如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七《秋怀十首以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为韵》之九“登览不可迟，去若孤鸿矫”。<sup>[6]1185</sup>当然也有纯粹作景物点缀，寓意不很明显的。



不过,我们通过对苏轼的诗词里关于“鸿”、“孤鸿”的词句进行统计和分类,发现苏轼对于“鸿”这个意象的传统含义也是广泛使用的。

### (一) 鸿作为自由的象征

《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sup>[7]96~97</sup>

《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三首》之三:“幽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sup>[7]591</sup>

《人日猎城南,会者十人,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韵,得鸟字》:“放弓一长啸,目送孤鸿矫。”<sup>[7]918</sup>

《襄阳乐》:“北人闻道襄阳乐,目送飞鸿应断肠。”<sup>[7]74</sup>

《次韵马元宾》:“塞鸿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岂可期?”<sup>[7]1401</sup>

《睡起》:“松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sup>[7]2763</sup>

《水调歌头》:“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sup>[7]431</sup>

以上这些用例都突出了鸿雁的自由,它们拥有翅膀,可以自由来去,并且,它们有广阔的天地可供自己翱翔,连猎人的弓箭都无可奈何(“放弓一长啸,目送孤鸿矫”)。这样,老是受到排挤、流放的苏轼,当然对这天地间的自由精灵艳羡不已。而他自己更有跨着飞鸿远离尘世的理想——“松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

### (二) 鸿作为归乡、相思的象征

《送刘道原归颍南康》:“朝来告别惊何速,归意已逐征鸿翔。”<sup>[7]260</sup>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三:“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郭熙秋山平远二首》之一:“日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sup>[7]553</sup>

以上用例多借鸿雁迁徙的特性来抒发诗人思念故乡的心情,这种含义也是历代文人用得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一。

### (三) 借鸿雁的漂泊流离寄寓自己的伤感情怀

《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其二:“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sup>[7]557</sup>

《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sup>[7]1054</sup>

《送陈睦知潭州》:“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还相送。”<sup>[7]1427</sup>

《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孤鸿方避弋,老骥犹在垆。”<sup>[7]2124</sup>

《老人行》:“故国日边无信息,断鸿空逐水长流。”<sup>[7]2714</sup>

《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秋风起鸿雁,我亦继华躅。”<sup>[7]1702</sup>

以上用例突出了孤鸿、哀鸿的伤感,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伤感情绪。

### (四) 用鸿雁来象征品格的高贵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sup>[7]333</sup>

《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共为竹林会,身与孤鸿轻。”<sup>[7]1750</sup>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词中的鸿雁意象经常传达的是孤独、凄清、思乡、高洁、自由等寓意。苏轼在单独使用“鸿”这个意象时所蕴含的意义都有这么多,则他能够将这众多的含义整合起来,赋予“孤鸿”一些更复杂的象征意义也很容易。那么,《卜算子》中的“孤鸿”意象有哪几层含义呢?

苏轼在这里综合了几种意义并结合自己的身世,赋予孤鸿一个崭新的形象。首先有“孤独”的情感,从字面上看,“鸿”的修饰词“孤”很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点。而整首词也在环境烘托方面强调了这一点,“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从时间上和环境描写上都告诉了我们这只鸿的出现背景。其次,“孤鸿”和“疏桐”一起暗示了季节为深秋,而“悲秋”又是文人诗作中的一大情感主题,所以,作者轻易地就奠定了词作忧伤的感情基调。再次,孤鸿意象在传达了哀伤、寂寞的感情(有恨无人省)外,还从侧面透露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正是因为新党与旧党的排挤,才使得苏轼被贬黄州,成为了一只“孤鸿”。最后,孤鸿的意象还象征了诗人高洁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从“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所以,苏轼是全面运用了孤鸿意象的各种内蕴,综合而成笔下的“孤鸿”。

#### 四、苏轼个人经历在“孤鸿”身上的投射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卜算子》中的孤鸿有苏轼自己的影子。那么，苏轼又是怎样把自己人生经历与情感投射到这个“孤鸿”的意象上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苏轼一生的主要经历。

嘉祐元年（1056），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利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唯一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当朝时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苏轼经此一狱也变得心灰意懒，公事之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由此可知，苏轼作为一个大文豪，虽然才华横溢，但在仕途上却偃蹇多舛。更令他不平的是遭到陷害，这让一个正直的文人在思想上和尊严上受到了沉重打击，故有学者认为苏轼

思想中的放达一面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苏轼在黄州期间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怎么好。这自然就引起了他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感叹。

于是，在《卜算子》中他把孤鸿与自己的境遇进行了比较、联系，给单纯的孤鸿形象灌注了全新的生命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语赋予了鸿鹄志向远大、品质高洁的特点，作者便从这里找到了自己与“鸿”的相似点。而作者的孤独寂寞无人了解、无人宽慰，又契合了“孤鸿”之“孤”。当作者在这个深秋之夜愁苦无眠时，他和孤鸿之影的巧遇，便从客观上促成了这首词作。词中的孤鸿具有的孤独、高洁、凄冷，与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完美结合，自然而然地把作者化成了孤鸿的形象。而下阙的“惊”、“恨”、“不肯”等字眼，更是形象地说明了作者心惊肉跳的后怕、无人理解的惆怅和坚持己见的个性。而“拣尽寒枝不肯栖”更成了苏轼晚年辗转漂泊的恶谶。所以，这个“孤鸿”与传统的“孤鸿”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成了苏轼个性形象的化身，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相比而言，那些只注重某个意象某一方面意义的诗人的确略逊一筹。他们缺少苏轼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不能勉强为之的。所以，是苏轼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这首《卜算子》和其中的“孤鸿”形象。这也是“意象”这一概念“以象尽意”的宗旨吧。

#### 注释

[1] [东汉]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释《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南朝梁]刘勰著，王利器校注《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6] [宋]陆游著《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7]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艾茂莉，乐山师范学院实习研究员，硕士；王斌，乐山师范学院讲师，博士。

# 浅析齐鲁酒文化与苏轼命运的交融

陆雪卉

**内容提要** 目前对齐鲁文化与苏轼关系的讨论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苏轼对当地地域文化影响的角度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则是从齐鲁文化对苏轼文风的渗透这一视角进行考察。对于后者的研究，当前的讨论虽多，但究竟是齐鲁文化中的哪些方面对苏轼产生了影响却一直无法形成共识。本文从齐鲁酒文化的角度出发，以此讨论它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及思想产生的影响。

**关键字** 苏轼 齐鲁 酒文化 豪放

提及密州，人们想到的可能会是儒家文化的盛行、山东人的豪爽、各家学派的杂融以及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目前关于齐鲁文化对苏轼影响的研究颇多，但究竟是齐鲁文化中的哪一派文化或者是哪几种文化对苏轼产生了影响，对此却众口不一。本文主要通过齐鲁酒文化这一视角，来分析它究竟是如何对苏轼创作以及思想产生了影响。

## 一、苏轼豪放类作品与齐鲁酒文化可能存在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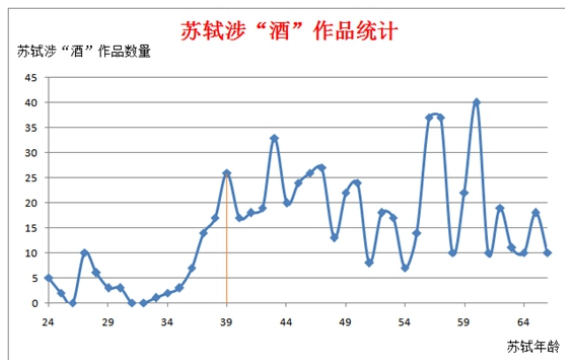
近年来，关于齐鲁文化对苏轼影响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关注对象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有学者从儒家文化的盛行及各家学派的糅杂这一角度入手，对苏轼的思想展开研究，很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一文，张崇琛在此文中提到：“密州文化之于苏轼，首先表现为以儒为主、兼容各家的学术氛围对其思想的影响。”作者在此文中通过介绍儒学、《易》、《书》、黄老、佛道等文化，指出了这类思想与

苏轼思想的关联性。同样，黄丽华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体现出的齐鲁文化特点》一文中，也认为苏轼词风的转变与齐鲁文化中忠君爱国、以民为本以及以儒为主、诸家兼容等元素息息相关。对于这类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齐鲁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苏轼的思想特点确实都存在着以儒为主、各家融合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证明苏轼的这种思想就是因任官密州而产生的。苏轼作为一名士大夫，儒家思想必然是其主导思想，他曾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可见，年幼的苏轼不仅研读儒家经典，同时还将佛、道之作列入其学习范畴。此外，苏轼早年在凤翔县任签判时，也曾任《稼说》一文中提出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所以苏轼自幼便是博览群书、广其见闻的，他不仅吸取儒家思想，同时也会受到各家文化的熏习。儒家文化作为齐鲁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不仅仅与苏轼，甚至可以说会与任何一名士大夫的思想都会存在相通的一面，所以苏轼儒家思想的形成与任官密州究竟有多大的关联也许难以知晓。另一方面关于苏轼与齐鲁文化关系的研究则是从当地民风民俗的角度入手展开的，比如从山东人性格豪迈的角度引发对苏轼豪放词风的思考，比如对苏轼的诸篇狩猎文与当地狩猎之俗关联的反思，此外还有从当地的酒文化、社交礼仪以及各种名胜山水等角度进行的探讨。

在笔者看来，上述文章所讨论的内容虽都各有侧重，但却未指向问题的重点，其实我们想要挖掘的并非是齐鲁文化与苏轼思想的相通点，关键则是要对比苏轼的思想在任密州知州的前后阶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方便讨

论，本文暂且将苏轼任密州知州以前的时期，即 1074 年（39 岁）之前的时间称为前期，而将 1074 年之后（包括 1074 年）的阶段称之为后期。通过观察，笔者发现诸篇豪放作品中的几篇涉“酒”文字均是作于密州时期，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一点引发了笔者对苏轼与“酒”之间关系的思考，苏轼能写出如此酣畅淋漓的作品，那么他的文字是否受到了齐鲁酒文化的影响呢？为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苏轼的涉“酒”作品进行统计。

此统计以张志烈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下文称《全集》）所收录的苏轼作品为依据，并以“酒”字为检索关键词。《全集》共分为诗、词、文三大部分，诗、词两部分出现的涉“酒”文字基本是借酒抒发情感，或者是对饮酒以及酿酒的直接描述，因此，这两部分的涉“酒”文字均被计入统计结果。而文集中检索出的涉“酒”文字除了诗、词两部分所包含的涉“酒”内容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对酒的客观记录及各种祭祀礼仪中酒以贡品形式的出现，如：“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策别厚货财一》），“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报，惟以告衷”（《谢晴祝文》），“牲酒匪报，维以告洁”（《谢雪祝文》）等，这类文字多与苏轼本人的经历、情感无直接关联，因而不被录入统计结果。根据统计结果（详见文末附录），笔者制作了相应的折线图：



此图以横轴代表苏轼的年龄，纵轴代表其涉“酒”作品的数量。可以看出，苏轼在 39 岁之前，即于赴任密州之前的涉“酒”作品明显较少，之后的作品数量虽呈现了小幅的起落，

但整体势态则要高于前期。此外，还有少部分涉“酒”作品的年份不详，在《全集》中只注明了年代区间，而并无详细的年份说明。经笔者统计，这些作品在嘉祐年间（1056~1063）有 4 篇，熙宁年间（1068~1077）有 1 篇，元丰年间（1078~1085）有 13 篇，绍圣元年之后（1094~1101）则有 4 篇（详见附录）。很明显，苏轼后期的涉“酒”作品要多于前期，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苏轼这一文字上的转变是受到了齐鲁酒文化的影响呢？

## 二、历史上的齐鲁盛酒之风

翻看中国的文化史，齐鲁地区历来有浓郁的饮酒之风。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曾为其弟作《酒诰》一文，以警告勿嗜酒误国，“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公认为适度饮酒无可厚非，若酗酒成风则必须严加制止，以免误事。当时的酒盛之风可谓不言而喻。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是一个酷爱饮酒的人，他曾说过：“唯酒无量，不及乱”，历史上也曾有“尧舜千钟，孔子百觚”之传说。此外，《论语》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是没有什么事值得争夺的，惟有在射箭比赛时相互作揖，走下赛场后还能恭敬地敬酒，这才是知礼懂礼的君子。作为孔子第十九世孙，孔融也是一名爱酒人士，他曾自诩：“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东晋时期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也将“一觴一咏”视为至乐；李白当年游历山东时，偶饮当地的兰陵酒后，也写下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家乡”的千古名句。此外，《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还将小说背景置于酒文化浓郁的水泊梁山，《寿张县志》中曾有诗这样描写这一带的饮酒习俗：“终日朔风吹玉树，连朝塞雾落琼花。南邻闭户书为枕，北里围炉酒当茶。”简单的“酒当茶”三个字很形象地展现了当地人的好酒之风。在《水浒传》中，每一章似乎都可以见到酒的身影——庆功、送行、结拜，诗歌，酒宴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此角度看，《水浒传》甚至就



是一部由酒串连起来的民俗文化作品。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感受到,酒以各种形式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它甚至成为了齐鲁大地的一条重要文化纽带。在宋代,当地的饮酒之风更可谓是达到了高潮,张能臣在《酒名记》中列举了北宋出产的200余种酒中,其中齐鲁酒就占了27种,它们分别是:德州的碧琳酒;滨州的石门酒、宣城酒;博州的宣城酒、莲花酒;青州的拣米酒;齐州的舜泉酒、近泉酒,清燕堂酒和真珠泉酒;兖州的莲花清酒;曹州的银光酒、三酸酒、白羊酒和荷花酒;郓州的风曲酒、白佛泉酒和香桂酒;潍州的重酝酒;登州的朝霞酒;莱州的玉液酒;济州的宣城酒;濮州的宣城酒、细波酒;单州的宣城酒、杏仁酒;棣州的延相堂酒。宋代齐鲁之地酒风之盛,由此足可窥见一斑。

### 三、齐鲁酒文化与苏轼作品及命运的交融

从苏轼涉“酒”作品统计中可以看出,他在任密州知州以前也有若干篇涉“酒”文字,甚至也有过对酒的赞美之辞:“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壬寅重九,不预会……》),“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绿筠亭》),“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自普照游二庵》)。但当时苏轼的酒量颇为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点“畏酒”:“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跋醉道士图》)“酒社我为敌,诗坛子有功。”(《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题子明诗后》)“浅量已愁当酒怯,非才尤觉和诗忙。”(《景纯见和,复次韵……》)此外,苏轼在凤翔县任签判时,其同僚彭乘还曾说过:“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不难发现,早期的苏轼纵然饮酒,亦是浅尝辄止。而到了密州之后,他则逐渐融入了当地的饮酒之俗中。相对于早期的不善饮酒,苏轼在密州则逐渐对酒心生好感,“近稍能饮酒,终日可饮十五银盏。”(《与王庆源十三首》其二)“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雨中花慢》)“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留别雩泉》)此外苏轼《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云:“但恐酒钱尽,烦公挥囊金。”可

以感受到,此时的酒在苏轼的生活中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饮品,他将酒视为一种享乐以及品味生活的途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缺一不可的。

对于这一转变,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齐鲁地区的酒文化浓郁,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属官场之人,必然要入乡随俗去体验当地的民风。尽管苏轼之前曾多次称自己“不喜酒”,但面对齐鲁大地的繁多名酒,他很有可能在此处遇到了适合自己口味的酒种。

其次,当地的民俗风情让苏轼的内心感受发生了转变。在早期,苏轼常常只身对酒,“吾今幸无事,闭户为饮酒”,“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行乐及时虽有酒,出门无侣漫看书”,“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世事如今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不难看出,纵然生活中有酒,但独饮之味却难免枯淡。而密州的人文风土却改变了这一切。当时的地域环境并不乐观,苏轼《后杞菊赋》云:“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可以说,贫瘠荒芜的密州与风光旖旎的杭州相比实在大相径庭,初至密州的苏轼甚至略感失望,但他却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在密州近两年的时间里,苏轼除蝗虫,救弃婴,防盗贼,费尽心血地缓解当地的各种灾情,日子虽苦,但他却感受了难得的知足与喜悦,“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此句可谓是苏轼与吏民相处融洽的最好写照。

在密州,苏轼与当地的各层人士皆有往来,同僚、朋友、百姓、老农,质朴醇厚的民俗风情让苏轼敞开心胸,尽管环境艰苦却未感落魄。胶西先生赵明叔虽家境贫寒,但却嗜酒如命,常常不醉而归,他曾作诗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读罢此诗后,也饶有兴趣地模仿了二首: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

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柩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其一

薄薄酒，饮两钟；粗粗布，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从，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其二

其一以酒、粗布衣、丑妻为喻，通过层层对比，认为人死之后万事皆空，生前纵然有金缕玉衣也不如衣衫褴褛但却能享受阳光更为温暖。同样，其二也是从酒出发，苏轼认为贫富贵贱虽有差别，但若与生死相比，一切都是浮云。两首诗都传达了超脱外物的旷达情志，字里行间也不乏苏轼在经历了种种世间不平后的体悟与感慨。可以说，这两篇作品虽然不是对饮酒的直接描述，但却可以感受到，苏轼是带着一种激情，很“流畅”地创作出了这两篇佳作。这种激情与酒后的微醺之感颇为相像，或可视为苏轼的酒后之作。两首诗所表达出知足常乐的超脱之情，一方面可视为苏轼性格中的达观面，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密州豪迈之风的影响。当然，苏轼与赵明叔之间亦不少往来，他还曾将好酒赠予对方一起品尝，可见，二人之间的交情可谓因酒而生，与酒同乐。

密州期间，苏轼还曾游访过当地的卢山，此山西岭处有石名饮酒台，苏轼行至此处曾作《饮酒台》一首：“博士雅好饮，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诗中的博士即是秦博士卢敖，据说当年他曾与众儒一起抨击秦之暴政，秦始皇大怒，因而焚书坑儒。“秦既焚书，苦患天下不从，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种瓜于丽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诸博士诸生说，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儒。”卢敖逃至此山并曾在一石台处饮酒，故此处被称为“饮酒台”，而此山也因卢敖而得名“卢山”。苏轼在此诗中可谓

是实现了与卢敖的时空对话，这一对话中不仅回忆了卢敖归山饮酒之经历，同时更像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同在卢山时，苏轼还曾作《障日峰》一诗：“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此诗首两句抒发了对家乡蜀地的深深思念，后两句则将障日峰视为小峨眉，可见此时的苏轼已把密州视为自己的家乡。对于卢山的爱恋，苏轼在一送客诗中也有记述：“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甚至在十年后，苏轼重新返诸城时，依旧清晰记得那座被自己称作“小峨眉”的卢山：“海山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何处故乡不堪回。”可以说，这座因卢敖归山饮酒而闻名的卢山，也让苏轼对此地产生了更多的感慨与眷恋，他在饮酒台的所见所想可谓是触及到了内心的最深之处。苏轼借卢敖之饮让自己沉醉，甚至在这似醒似醉之中找到了家乡的感觉。

任密州期间，苏轼还曾参与过当地的修禊之俗，“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满”字与“争”字很形象地展现了全城百姓涌观曲水流觞的盛况。苏轼对当地的狩猎活动也是情有独钟，除了《祭常山回小猎》以及《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中有所记载外，《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成为了如今人尽皆知的名篇佳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开篇气势不凡，一个“狂”字足以展现了英姿飒爽的狩猎场景，满城的军民追随前行，更是增加苏轼的报国情怀。“酒酣胸胆尚开张”，狩猎后的苏轼开怀畅饮，“酒酣”足以见得味浓十足，其中不仅洋溢出了慷慨激昂的安邦之志，更是流淌出了对百姓满满的浓情厚意。苏轼与密州人民在一起的时间虽不长，但别离时却万千不舍，“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九年后的苏轼再经密州时，又一次作诗表达了对密州人民的深厚情感：“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此诗首句回忆了当年在雩泉饮酒的情景，进而又描述了如今再见乡亲父老时的场面。可以说，苏轼

在密州时期并不孤独，他曾说过：“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人的热情奔放则恰恰与苏轼这一个性格相契合。笔者在前文中虽提到苏轼早期也喝过酒，也有过对酒的赞美，甚至密州的酒在味道上也许并非会比其他的酒好很多。但苏轼之所以在密州写下了数篇情感浓郁的酒文字，是因为他对酒的品尝已经远远超越了感官的层面，这一饮一啄中包含的不仅仅只是酒本身的味道，更是饱含了对质朴民俗的热爱以及对醇厚人情之味的眷恋。

最后一点关于苏轼对酒的态度转变则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经历了“乌台诗案”，此时期被历代学者称为苏轼人生的转折点。而事实上，这一转折并非是突然的，早在苏轼第一次请求外任时（1071），就已经是这一事端的前奏，而密州时期则恰恰是二者的过渡阶段。苏轼早年步入仕途时顺风顺水，本心怀壮志，欲施己才为国报效一番，但由于频频与朝廷意见不合，而迟迟无用武之地。相比于早期的意气风发、凌云壮志，此时的苏轼已经逐渐走向了不惑之年。苏轼在之前曾先后于京城、凤翔、杭州等多地任官，无论于人于事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验以及心智上的成熟。到了密州，尽管环境艰苦，远离了朝廷，但苏轼却与民为友，这让他困顿生活中寻找到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身处密州也让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面对生活中很多不可回避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痛苦，苏轼不再纠结执着于此，他借酒消愁，欲醉寻超然，“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醉时，苏轼忘记祸福，忘却得失；酒醒时，苏轼再次整理衣冠，正视生活。可以说，恰恰就是在这一醉一醒中，苏轼实现了超越。正是因为苏轼敢于“超然”，所以他才能在醉后用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切。

## 结 语

苏轼在密州之后时常饮酒，甚至不止一次地去亲自尝试酿酒，他的酒量虽不大，但于酒

中体悟到的情味却愈加浓烈。这一系列的变化与苏轼之后的所闻所见固然有关，但若从苏轼的整个人生去俯瞰，齐鲁酒文化的出现则恰恰是苏轼将涉“酒”文字视野打开的一个开端。从上文的涉“酒”作品统计图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密州时期的涉“酒”文字虽然在数量上不是最多的，但其蕴含的情感却格外丰富。可以说，齐鲁酒文化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扮演了很主要的角色，但这一主要角色之所以被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也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经历、环境、性格等重要角色的配合。无论如何，酒只是一个单纯性的助因，多方因素的巧合，才使得苏轼笔下的酒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饮品的层面上，它被苏轼赋予了特殊的情感与含义，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点缀于苏轼的文作中，并使他的人生变得熠熠光辉。

陆雪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在读硕士。



书名：寻访东坡踪迹

作者：韩国强

出版：海南出版社 2015 年版

开本：787×1092mm 1/16

页数：301 页

定价：39.00 元

# 东坡枯木笔迹禹城沉浮考（上）

## ——从东坡先生枯木笔迹沉浮看文物兴废

夏爱民 赵艳娟

**内容提要** 本文考证了东坡枯木笔迹在禹城的沉浮史，解读了东坡枯木意象以怪为美、以怪达意的禅学趣味，作者从东坡枯木笔迹的沉浮中看到了文物兴废的影子，感叹文化会因人类的保护而生生不息，也会因人类的破坏而命悬一线，并期盼文化能得到保护、发展、传承、创新。

**关键词** 东坡 枯木笔迹 禹城 浮沉 文物兴废 文化传承

### 一、文本及史料

禹城旧县志有王表《禹城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年），董鹏翔、牟应震《禹城县志》（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汝汉、张青莲《禹城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盖景延、王九思、孙似楼《禹城县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种。其中，康熙本、嘉庆本、民国本收录《东坡先生枯木记》一文。现以康熙本为底，综合嘉庆本整理《东坡先生枯木记》一文如下：

东坡先生枯木记

明县丞 于槩 邑人

有宋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后，自书年月日，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盖先生一时精思神会，浑然天成，有非世间画工好手所到。元祐间，亭主刘诏模石未及，复流浪于别馆。禹城王国宝见之，乃徙置于远尘庵。盖大定二十九年也，有常山李彦文记之。后不知何人又移于儒学大成殿

之左壁，予意远尘庵必黄冠缁流所寓或者一时废弃，乃为好事者鉴赏，私置学宫中间耳。迨及永乐东狩，先生济南笔迹漂荡无存，独禹城仅存此石，往来士夫求之者众，学中坐是贗本，日夜不给。县中小吏往往以此遭谴，乃伺夜无人投其石于井，碎为数段。后岁余，独学中老苍头知之，白于学官，乃发取碎石，仍置原处。自是，贗者皆有断文，而先生全笔不见于天下矣。吴大尹于原记之末附跋数语，以纪其事。至正德辛巳罗山张大尹以石碎之故不便于贗品，命工翻诸木板，有老教读者中添二枝以补其缺，视石刻虽为较全，而精神衰飒（似为竭）不及原笔远矣。嘉靖甲午，有闽人教谕王某者，贪昧无知，敢于妄为而不顾，一日，忽白于人曰：吾堂树枯木，学中其得有生意！遂将先生原笔并朱文公字刻及有名笔数种俱移出大门之外。时值修造，寻命碎为柱（似为柱）础，识者追救已无及矣。尝闻先生在昔过常州报恩寺，会僧堂初成，偶题于壁数语最为健妙。后党人祸作，凡先生遗墨俱令除去，寺僧乃预令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顿以全。至绍兴中，召求苏黄墨迹，寺僧乃除去纸漆以献，高宗大喜。夫先生当在有宋时，虽人知敬重，然追贬远窜，不容在朝，至今除去笔迹，其恶可谓极矣！而此独加珍重如此。今天下学士大夫存先生片纸只字，不啻获拱壁，而此人独弃毁之，是何其见反是僧之不若耶。至于文公，上继往圣，下开来学，犹吾人一日不可不景慕者，而



并黜其手泽焉,又何其拂人之性以至是耶!予尝因是而叹:今天下虽山林草泽以及穷乡下邑,岂无环瑰奇伟抱负不凡如此数石者,然终于流落无闻得如此石:始为人所知,幸而入于学宫者绝少,其又有幸而为人所知矣,不幸而摧败于非类,枉其才质,戕其性命,卒至于颠灭不存如是石之终者,又岂无一二耶?予尝欲与故家求原刻本翻之于石,以垂先生之笔于有永,且识其中间移置成败之故,然恨力未之能也。姑记于此,以俟好古君子他日有所考证。时嘉靖戊申秋七月也。

《康熙禹城县志》又载:

苏东坡枯木石刻:东坡与李公择会济南刘诏家,写枯木一枝,题名檻泉亭壁,诏刻石安遇堂。金大定二十九年,邑人王国宝、李彦文得之帖石间,徙置远尘庵,上有李彦文题记。移置儒学明伦堂。永乐后,往来士夫求之者众,下吏苦于应接,碎而投之井中。至正德间,知县张公出而重镌。嘉靖甲午,教谕王某碎为柱础,有识者惜之。万历九年,知县任于士夫家索得命工重刻。

《嘉庆禹城县志》“古迹”条下:

苏东坡枯木石刻,旧自远尘庵移置明伦堂,嘉靖间教谕王晃碎为柱础,知县任宗美命工重摹,今废(旧志)。

《光绪禹城乡土志》“古迹”条下:

苏东坡枯木碣前明王教谕毁为柱石。

《民国禹城县志》“古迹”条下:

苏东坡枯木石刻,旧自远尘庵移置明伦堂,嘉靖间教谕王晃碎为础,知县任宗美命工重摹,今废(旧志)。

## 二、东坡先生枯木笔迹沉浮脉络

根据以上记载,梳理东坡先生枯木笔迹禹城沉浮脉络如下:

### (一) 北宋熙宁十年诞生济南趵突泉边:名园名泉名亭中的名士名笔

今天的趵突泉,北宋时称作檻泉,为齐州名泉。所建之亭称作檻泉亭,为齐州名亭。园亭主人为刘诏,北宋熙宁年间史学家,时任齐

州属官,有寺丞之衔(宋代“九寺”的助理官员)。当时,趵突泉坐落在旧城外西南,民间称为爆流泉,为刘诏所有后,取古雅之意称为“檻泉”,并建了檻泉亭。檻,通“滥”。《诗经·大雅·瞻印》:“鬻沸檻泉,维其深矣。”《朱熹集传》:“檻泉,泉上出者。”

苏辙(1039~1112)于熙宁六年(1073)任齐州掌书记,在任三年,对齐州名胜古迹多有吟咏。有《檻泉亭》:

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  
汹汹秋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  
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  
滓秽未能妨洁净,孤亭每到一依然。

曾巩(1019~1083)于熙宁五年(1072)至六年(1073)知齐州,期间治理齐州,兴修水利,并写下了大量赞咏齐州山水的诗文。曾巩始将檻泉称为趵突泉,其熙宁六年(1073)《齐州二堂记》载:“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各名之曰趵突之泉。”有诗《趵突泉》:

一派遥从玉水分,暗来都洒历山尘。  
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真。  
已觉路傍行似鉴,最怜沙际涌如轮。  
曾城齐鲁封疆会,况托娥英诧世人。

此后,齐州趵突泉的名气越来越大,如王羲之兰亭,一时为盛。北宋赵抃、曾巩、李常、苏轼、苏辙、刘诏等都有诗文记载。

第一次雅集,为北宋名臣赵抃、曾巩、刘诏之会。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赵抃(1008~1084)由资政殿学士、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赴任资政殿大学士、成都府路安抚使、知成都府,自青州进京面圣,路过齐州。此时的齐州,已在曾巩一年多的治理下大见成效。曾巩、刘诏等齐州人士在檻泉寺(今趵突泉观澜亭)为赵抃饯别。曾巩有七律一首《送赵资政》赠别:

镇抚西南众望倾,玉书天上掇持衡。  
春风不觉岷山远,和气还从锦水生。  
学舍却寻余教在,棠郊应喜旧阴成。  
归来促召调炉冶,莫为儿童竹马迎。

(“岷山”、“锦水”皆蜀中地名;“持衡”指执掌大权。)

赵抃有《寄题刘诏寺丞檻泉寺》:

泉名从古冠齐丘，独占溪心涌不休。  
深似蜀都分海眼，势如吴分起潮头。  
连宵鼓浪摇明月，当暑迎风作素秋。  
亭上主人留我语，只将尘事指浮沤。  
有七绝《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酬谢：  
太守文章耸缙绅，两湖风月助吟神。  
讼庭无事玲斋乐，聊屈承明侍从人。  
——其一  
乐天当日咏东吴，一半勾留是此湖。  
历下莫将泉石恋，而今天子用真儒。  
——其二

这两首诗，不仅高度肯定了曾巩文章才华、治理齐州特别是大明湖的政绩，肯定了为政简易、以讼庭无事为乐的执政理念，提醒挚友“莫将泉石恋”、将有更大的作为。

第二次，为李常、苏轼、黄好谦雅集。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奉旨调离密州，过安丘经潍州、青州，于熙宁十年正月底到济南。当时好友李常（字公择）正在齐州知州任上，并赋诗相迎，苏轼亦为之作《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而苏辙的三子苏迟、苏适、苏远亦皆在济南，亲友相聚自然十分高兴。苏轼此次在济南前后盘桓月余，在亲友的陪同下游历了槛泉（趵突泉），观赏了梅花，并“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见《济南金石志》卷四），可惜苏东坡的这一手迹未能得到保存。此外，他还代李常作了为灵岩寺聘请住持长老的《齐州请确长老疏》（见《东坡文集》卷六十二），并与李常策马畅游龙山，欣然写下了《答李公择》：

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  
使君莫忘雪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

槛泉亭当时已成为诗人、文士赏泉、觞咏之佳所。苏轼、李常、黄好谦等同访刘诏，热情好客的刘诏喜出望外，奉为上宾，热情款待，良辰美景，宾朋相聚甚欢。此时此刻苏轼心花怒放。所以，当刘诏请求墨宝时，苏轼慨然应允，当众挥毫，题字作画。据《济南金石志》载：“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由于语焉不详，易造成误解。有人认为是苏轼在槛泉亭的粉壁上写了“枯木一枝”四个字，其实不然。

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有宋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后，自书年月日，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盖先生一时精思神会，浑然天成，有非世间画工好手所到。元祐间，亭主刘诏模石未及，复流浪于别馆。

《康熙禹城县志》载：

苏东坡枯木石刻：东坡与李公择会济南刘诏家，写枯木一枝，题名槛泉亭壁，诏刻石安遇堂。

写，这里是作画的意思。实际上，苏轼在槛泉亭之壁（后面）既作了画（一枝枯木），又写了字（枯木一枝四字），还自书年月日，还有题名，是一件书法精品，“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盖先生一时精思神会，浑然天成，有非世间画工好手所到”。

此次济南之行，给苏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后来的诗文中，苏轼曾多次提及。如作于哲宗元祐二年的《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一诗中，苏轼深情地回忆此次济南之游：

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  
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

此外，在《与几道宣义》一信中，苏轼说：“每思槛泉之游，宛在目前。闻河决阳武，历下得无有曩日之患乎？”（见《苏轼集》卷八十）

## （二）济南安遇堂（别馆）隐世：幸运躲过三次危险，大定重现

刘诏对这件书法珍品的处理，有两种说法。一是，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元祐间，亭主刘诏模石未及，复流浪于别馆。别馆不知名字，当在济南。一是《康熙禹城县志》：诏刻石安遇堂。安遇堂当在济南，不知具体地点。

这件书法精品问世后，政局动荡，遭遇了数次劫难，所幸全部躲过了。其重要者：

第一险。北宋崇宁年间，宋徽宗、权臣蔡京等对苏黄字迹，必欲赶尽杀绝。

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尝闻先生在昔过常州报恩寺，会僧堂初成，偶题于壁数语最为健妙。后党人祸作，凡先生遗墨俱令除去，寺僧乃预令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顿以全。……而此独加珍重如此。

所幸，东坡枯木笔迹，可能也同常州报恩

寺东坡遗墨一样，为人“预令厚纸糊壁，涂之以漆”，躲过了一劫。

第二险。靖康二年，北宋灭亡，今人虜宋徽宗、钦宗北去，大量中原文物、书画、珍宝也被掳金国。当时的济南，成为刘豫伪齐地盘，东坡枯木笔迹，命运又当如何？

第三险。宋金和战，屡起战火，济南都是重要的战场区。

可能被毁掉了，但留下了帖石，流落民间。总之，乱世流离，又躲过数劫，金大定年间重现济南，为禹城人王国宝所发现。

（三）大定徙置禹城：从禹城远尘庵，到儒学明伦堂

于棻《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禹城王国宝见之，乃徙置于远尘庵。盖大定二十九年也，有常山李彦文记之。后不知何人又移于儒学大成殿之左壁，予意远尘庵必黄冠缁流所寓或者一时废弃，乃为好事者鉴赏，私置学宫中间耳。

《康熙禹城县志》又载：

金大定二十九年，邑人王国宝、李彦文得之帖石间，徙置远尘庵，上有李彦文题记。移置儒学明伦堂。

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禹城王国宝、常山李彦文等两人见之（原物，当在济南，东坡枯木笔迹可能也同常州报恩寺东坡遗墨一样，为人“预令厚纸糊壁，涂之以漆”，躲过了一劫）或得之帖石间（可能被毁掉了，但留下了帖石，流落民间，当在济南），徙置远尘庵。

远尘庵，当在禹城。自此，东坡枯木书迹失其故所、落户禹城。于棻认为：远尘庵必黄冠缁流所寓或者一时废弃，乃为好事者鉴赏，私置学宫中间耳。

黄冠：道士所戴束发之冠。用金属或木类制成，其色尚黄，故曰黄冠，因此也作为道士的别称。缁流：佛教术语，僧着缁衣，故谓之缁流或缁徒。流为流类之义，着缁衣之类也。因此是僧人的别称。

这件书法精品曾避难、藏身于道观僧庵多年，在乱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也是一件奇事。后乃为好事者鉴赏，移于禹城儒学大成殿之左壁（即儒学明伦堂）。这些好心的好事者没有留下姓名。

金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但很快就汉化了，朝野崇尚汉族传统文化，因此得以保留。

从远尘庵，终于移入学宫，存放在儒学大成殿之左壁，即儒学明伦堂，离孔老夫子近了，更算一件幸事。

（四）金末至明初又历三险，靖难之役后，东坡济南笔迹漂荡无存，禹城此石成为孤品、迎来盛世

第四险：1234年，元灭金。禹城为金统治核心地区，经历战乱，又躲过一劫。

第五险：1368年，明灭元。禹城为元统治核心地区、腹里，经历战乱，又躲过一劫。

第六险：明靖难之役，东坡济南笔迹漂荡无存，禹城此石第四次险中之幸，躲过战火。

于棻《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迨及永乐东狩，先生济南笔迹漂荡无存，独禹城仅存此石，往来士夫求之者众，学中坐是贗本，日夜不给。

《康熙禹城县志》又载：

永乐后，往来士夫求之者众。

永乐东狩，也就是靖难之役。1401年，济南成为主战场，经历战火后，东坡先生在济南的其他笔迹漂荡无存，独禹城仅存此石，成为孤品。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上皇位，重视文化建设，东坡笔迹愈加珍重。往来士夫求之者众，学中坐是贗本，日夜不给。

禹城，称为东坡笔迹印刷厂，一时称盛。然而，泰极否来，好景不长，明代中期发生了两次劫难。

（五）成化年前第一次劫难：为县中小吏“投其石于井，碎为数段”

第一次劫难可谓祸起萧墙，大致时间在成化年以前。

于棻《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县中小吏往往以此遭谴，乃伺夜无人投其石于井，碎为数段。

《康熙禹城县志》载：

下吏苦于应接，碎而投之井中。

（六）成化、正德年间两次修复：先失全笔，后失精神

于棻《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后岁余，独学中老苍头知之，白于学官，乃发取碎石，仍置原处。自是，厝者皆有断文，而先生全笔不见于天下矣。吴大尹于原记之末附跋数语，以纪其事。至正德辛巳罗山张大尹以石碎之故不便于厝品，命工翻诸木板，有老教读者中添二枝以补其缺，视石刻虽为较全，而精神衰飒（似为竭）不及原笔远矣。

《康熙禹城县志》载：

至正德间，知县张公出而重镌。

吴大尹，成化初知县，吴厚，闽州人（嘉庆县志）。于原记之末附跋数语，以纪其事。因此，首次劫难应在成化年前。至正德辛巳罗山张大尹。嘉庆禹城县志载：正德末知县，张璧，罗山人，仕至知府。（正德辛巳，为正德十六年，1521年。）

#### （七）嘉靖年间第二次劫难：为教谕王晃“碎为柱础”，追救无及

更有甚者，第二次劫难及补救。

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嘉靖甲午，有闽人教谕王某者，贪昧无知，敢于妄为而不顾，一日，忽白于人曰：吾堂树枯木，学中其得有生意！遂将先生原笔并朱文公字刻及有名笔数种俱移出大门之外。时值修造，寻命碎为住（柱）础，识者追救已无及矣。

《康熙禹城县志》载：

嘉靖甲午，教谕王某碎为柱础，有识者惜之。

嘉靖甲午年（1534）。嘉庆禹城县志载：嘉靖中教谕，王晃，邵武人。这位闽人、朱熹的老乡，教谕王某，不仅贪昧无知，认为“吾堂树枯木，学中其得有生意”，而且敢于妄为而不顾，“遂将先生原笔并朱文公字刻及有名笔数种俱移出大门之外。时值修造，寻命碎为住（柱）础”。

确实，禹城县自正德丙子（1516）后四十余年，无人中举。明刘士骥《蟋蟀轩草》中《寿凤翁杨老先生八十序》载：

吾邑自正德丙子后四十余年，士无成乡荐者，人不识孝廉何状，岂天人也耶，而凤岗先生始举，嘉靖辛酉（1561）则争慕说，以为景星卿云出，辄群聚观之，然

先生试礼部辄数奇，久之，乃起家灵宝令。

凤岗先生，即杨堪，禹城房寺南店人。1561年前即为举人，嘉靖辛酉（1561）进士不第。后出仕为灵宝县令，后为陈州知州、苏州府同知。所至有政绩、有口碑。

四十多年的时间，禹城无一人中举，好容易出了一个举人，又中不了进士。这与周边县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非东坡枯木笔迹所致，在嘉靖甲午（1534）王晃“碎为住（柱）础”后几十年间，并未带来生机、有进士及第，可见与东坡枯木笔迹无关。直至1561年间，近30年后，才有杨堪中举。本来已经贫瘠的文化土壤，采取自杀方式，只能更加贫瘠、荒漠。连同其福建老乡朱熹的笔迹（耕云钓月四字图片），也一同毁灭。

有明一代，在杨堪前，禹城县有4名进士；在杨堪后，又有6名进士。都是因为当时的知县、教谕、训导用力兴文育人所致。

#### （八）嘉靖戊申禹城于氏之叹：文化之叹，以石喻人，同病相怜

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尝闻先生在昔过常州报恩寺……予尝因是而叹：今天下虽山林草泽以及穷乡下邑，岂无环瑰奇伟抱负不凡如此数石者，然终于流落无闻得如此石：始为人所知，幸而入于学宫者绝少，其又有幸而为人所知矣，不幸而摧败于非类，枉其才质，戕其性命，卒至于颠灭不存如是石之终者，又岂无一二耶？予尝欲与故家求原刻本翻之于石，以垂先生之笔于有永，且识其中间移置成败之故，然恨力未之能也。姑记于此，以俟好古君子他日有所考证。时嘉靖戊申秋七月也。

邑人、县丞于槩写作此文时，为嘉靖戊申（1548），在第二次劫难后十年间，著文斥责教谕王晃。并以石喻人，有同病相怜之意。

#### （九）万历重生：明代万历年间禹城知县任宗美于士夫家索得命工重刻

于槩《东坡先生枯木记》载：

予尝欲与故家求原刻本翻之于石，以垂先生之笔于有永，且识其中间移置成败之故，然恨力未之能也。姑记于此，以俟好古君子他日有所考证。时嘉靖戊申秋七



月也。

《康熙禹城县志》又载：

万历九年，知县任于士夫家索得命工重刻。

在近五十年之后，万历九年（1581），任宗美，县令，找到拓本，再刻石。做了好多事。有传记。万历初，任宗美。有传。

### （十）明末至清初又经两险，乾隆年间第三次劫难，再毁

知县任宗美命工重摹的石碑，命运又如何呢？《康熙禹城县志》没有说坏掉，《嘉庆禹城县志》说“今废”，《光绪禹城乡土志》没说。

《民国禹城县志》说“今废”。

在修志的嘉庆十三年（1808）之前，任宗美摹碑就毁掉了。清代乾隆年间诗人王初桐的诗文看（见后），早在乾隆年间，任宗美摹碑就毁掉了。任碑大约存在了200年。期间，至少有两次大的险情：

第七险：李自成部下攻破禹城县城。

第八险：清军多次入塞，最远到达兖州，经过禹城，后入主中原，期间战火不断。

第三次劫难。乾隆年间。编修了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毁掉了大量文物、书册。东坡笔迹，如何没有得到保留？可称为盛世之难。

### （十一）王初桐、董芸乾嘉咏叹调：枯木至今磨灭尽，小劫匆匆五百年

乾嘉学派，以考据为能，凡是都要考出个究竟。有两个诗人，对东坡枯木笔迹情有独钟，咏叹不已。

一是清代乾隆年间诗人王初桐。在他的《济南竹枝词》里写了这件事。他把苏轼在槛泉亭赏梅、作画和杜甫在历下亭饮宴、赋诗等量齐观，视为文坛佳话。原作如下：

东藩皂盖已飘零，尚有髯翁屐齿径。

枯木至今磨灭尽，更无从问槛泉亭。

二是清代嘉庆年间诗人董芸。董芸，生卒年不详，字香草，号书农，山东平原人。清嘉庆三年（1798）举人。著有《济南杂咏》、《半隐园诗集》。有《槛泉亭》诗，在诗前的笺注中，对苏轼的这件珍贵文物遭破坏的经过乃至消失的事实作了翔实的记述，其中云：

醉墨淋漓洒槛泉，一枝枯木起苍烟。

远尘庵上空怀古，小劫匆匆五百年。

千余年的时光悄然逝去，槛泉亭几经变故，早已废圮无存，但“一枝枯木起苍烟”的逸事至今仍然发人深思。

### 三、枯木意象：两重扭曲——可怜、可爱、可羨、可摹

王羲之爱鹅，赵抃之爱鹤，苏东坡为何独爱画枯木怪石？寓意、意象如何？寄托了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苏轼枯木一枝，今天已无从见。但从其传世的《潇湘竹石图》、《偃松图》、《枯木竹石图》、《古木竹石图》中，可以想见。这些画作内容都以枯木、怪石为对象，在难言的古怪、奇特、嶙峋、丑陋中渗透着一种浪漫、趣味、可爱。现存于日本的《枯木竹石图》中，石头又瘦又丑，枯木横倒着长，打着360度的拐弯儿，在自然界难以见到，也完全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审美。

虽然不像现实中的枯木，却画出了一种精神。苏东坡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谪贬的迁徙与奔波之中。元丰三年（1080）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政治对手以“文字毁谤新法”的罪名投入大牢，史称“乌台诗案”。经过103天的狱中生涯后，被谪贬到黄州。几年后，王安石下台，苏东坡被召回京城，不久又遭排挤离京，最远贬到海南岛。生活的坎坷、政治的压迫，反映到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便演化成枯木、怪石，昂扬着向上的生命激情，反映了苏东坡对于险恶逆境的抗争与不屈。

问题是，熙宁十年作枯木一枝时，正是苏轼仕途相对顺畅时期，为什么爱画枯木一枝？这与苏轼的性格、所处时代有关，苏轼才华横溢本来容易招人嫉妒，性情耿直更加招人厌恶，加之北宋中后期党争加剧，自21岁考中进士、走入仕途之后，便陷入错综复杂的党争之中，坎坷不断。到熙宁十年，已经宦海沉浮、饱经沧桑，不难理解为什么爱画枯木怪石。此外，这也与他高深的禅学修养有关系。

（未完待续）

夏爱民，德州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公共管理硕士；赵艳娟，德州市历史学会会员。

## 读《东坡志林》（十）

徐 康

### 可资参考的养生秘诀

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sup>[1]</sup>！如商君<sup>[2]</sup>法，如孙武<sup>[3]</sup>令，事在必行，有犯无恕！”又用佛语及老聃语<sup>[4]</sup>，视鼻端白<sup>[5]</sup>，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sup>[6]</sup>，云蒸雾散，无始<sup>[7]</sup>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sup>[8]</sup>，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养生说》

#### 注释

[1] 便堕地狱：古人迷信，编造出“若做坏事、恶事，死后必将坠入十八层地狱”的恐怖故事。这从“忌恶”、“嫉恶”的角度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坠地狱”之说，终究仍是一种迷信。

[2] 商君：即商鞅（前390～前338）。战国时卫人，姓公孙名鞅，因封于商，也称商鞅、商君。为秦相十九年，辅助秦孝公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加强集权，主张法治，奖励农耕、征战，使秦国日趋富强。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诬陷其谋反，商鞅被车裂处死。遗著有《商君书》二十四篇。

[3] 孙武：春秋时齐人，名武，也称孙武子。生卒年不详。尝以兵法求见吴王，用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其著录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是我国最古老、最杰出之兵书。孙武善用兵，令在必行，有犯无恕。

[4] 佛语及老聃语：佛语，即佛家语，指佛教教义之语言表述。佛教称教派创始人释迦牟尼为佛祖，称他的话为佛语。老聃（dān），即老子，春秋战国时楚国苦县（今属河南鹿邑）人。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五千余言，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颇大。

[5] 视鼻端白：佛教《楞严经》中，孙陀罗难陀说的话里，有“视鼻端白”（与此文中“视”鼻端白同义）。佛教界对这句话中的“白”有两种解释，一是说鼻尖有一白相，二是指鼻孔中呼出的白气。本文赏析部分取其第二种解释。

[6] 八万四千：古代认为人体有八万四千个毛孔。

[7] 无始：佛家语。指一切世间，如众生、万物，皆无有始源，即未有起源。

[8] 诸障渐灭：障，烦恼之异名，烦恼能障碍思维，故名障。有二障、三障、四障、五障、十重障等。诸障渐灭者，即指烦恼消失也。

#### 赏析

东坡善养生，并且自拟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养生秘诀，这是有史可查，有文可考的。为了便于记忆和推广，他常常将自己总结的经验之谈，写成可供背诵的“四言体”。本篇《养生说》即为一例。

感觉饥饿才进饮食，半饱而未“饱胀”时，即终止进食。食后散步，步履放松，逍遥自在，务必使肚饥而腹内空空。而当腹中已空时，便迅即进入室内，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坐下或仰卧均听任自便，唯需注意的是要收拢、控制身体，使之如木偶一般。常常自言自语地念道：“现今我的这个身体，若有哪怕毛发般大小的丝毫的动摇，便将坠入地狱！犹如战国时政治

家商鞅的治秦之法，亦如春秋末年军事家孙武的治军之令，令下则势在必行，对违犯者绝不饶恕！”又用佛家释氏（释迦牟尼）及道家老聃的练功之语，凝视着自己鼻尖呼出的白气，默数着或出或入的呼吸次数，断断续续，绵绵延延，仿佛存在，而又用之不甚尽力（“用之勤”此处当“用之不尽”讲）。当默数到数百下之多时，觉得心寂寂而安然，身空兀（wù）而茫然，与静虚、空廓等同，不需要禁止制约自己，便自然地静止不动。当数到数千下时，或许不能再往下数了，则另有一法，名曰“随”：随着呼吸时与气息同出，再与气息同入，或许会觉得此种气息，从身体的八万四千个毛孔中释放出来，犹如云彩蒸腾，雾幔消散，从源头开始而来的各种病症，便自然消除；各种障碍（或病瘴），便自然灭绝，人也自然变得明晰、颖悟。就好像盲人忽然间有了明亮的眼睛，这时何必还用求人指路呢！以上便是佛老或聃老教给我（苏轼）的养生之法，至此而言尽也。

对于苏轼总结成文的上述《养生说》，若是放在当时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来看，自然不失为一种养生、健身的秘诀。苏轼集佛家、道家的养生之术为一体，在认真总结经验并身体力行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形成一套养生之术，将佛家重养性与道家重养生两方面加以融汇，各取其长，并述以文字，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承，应当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养生说》之类秘诀，已成为后人谈及养生时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 纵是“贫子”之言，亦要学其精要

赵贫子<sup>[2]</sup>谓人曰：“子神不全<sup>[3]</sup>。”其人<sup>[4]</sup>不服，曰：“吾僚友万乘，蝼蚁三军，糠粃富贵而昼夜生死，何谓神不全乎？”贫子笑曰：“是血气所扶，名义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问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尝梦见乎？”曰：“多矣。”“梦中知其亡乎？抑以为存也？”曰：“皆有之。”贫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计议而知者也。昼日问子，则不思而对，夜梦见之，则以亡为存。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物之眩子而难知者<sup>[5]</sup>，甚于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学<sup>[6]</sup>，

可忧也哉！”予尝与闻其语，故录之。——《录赵贫子语》<sup>[1]</sup>

#### 注释

[1] 这篇系苏轼于元丰六年（1083）十月作于黄州。

[2] 赵贫子：即筠州高安之乞丐赵生，名吉。曾事五台僧，不能终了，舍之而周游四方。敝衣蓬发，未尝沐浴，好饮酒，醉辄（zhé，总是，就）殴詈（lǐ，骂）市人。故高安之人皆谓之狂人。

[3] “子神不全”：子，你；神，神情和精神；不全，不完备。

[4] 其人：此指苏辙。前面之“人”亦指苏辙。苏辙，苏轼之弟。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生，字子由，一字同叔。嘉祐二年与兄（轼）同举进士。神宗时，反对王安石行新法。哲宗时，累官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徽宗时辞官，筑室居于许州，晚年自号颍滨遗老。北宋文学家。其著作有《栟城集》五十卷、《栟城后集》二十四卷、《栟城三集》十卷、《诗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卒。

[5] “物之眩子而难知者”：世间万物迷惑着你而使你难于了解。眩子，迷惑着你。

[6] “子自以神全而不学”：你（苏辙）自以为精神健全而不深入学习、探究。

#### 赏析

在封建社会，有“礼贤下士”之说，是指上层人物（居高官显位者，或学问、知识高深者）以“礼”贤待或善待“下士”。下士者，一般指贵族阶级（或官吏中）最低一级的人士，也泛指读书人中的地位低下者。至于“贫子”即沦为乞丐之人，一般为官之人或学问高深者是看不起且耻于与之交往的。然苏轼兄弟则不然。元丰三年（1080），苏辙谪居高安，曾与乞丐（贫子）赵吉论养性。苏辙与赵吉（贫子）“对谈”养性之事，苏辙曾写信告诉其兄苏轼，苏轼便将苏辙转述的话，录记为这篇“赵贫子语”。

赵贫子对苏辙说，你的神情和精神均不健全。苏辙不服，答曰：“我的同僚和朋友有万乘之众；我视阵前三军如蝼蚁般渺小孱（chán）弱，视富贵荣华如糠粃般毫无价值，视生死如白天黑夜般瞬息即逝。

（下转第72页）

## 《龙川略志第二》译评

胡先酉

彭山有隐者，通古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单骧从之学，尽得其术，遂以医名于世。治平中，予与骧遇广都，论古今术同异。骧既言其略，复叹曰：“古人论五脏六腑，其说有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谁信者？古说：左肾，其府膀胱；右肾，命门，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以理主之，三焦当如膀胱，有形质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脏无形，不亦大谬乎！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何以藏系哉？且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异。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则精气散在三焦，荣华百骸；及其欲念一起，心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入命门之府，输写而去，故号此府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谬而不悟，可为长太息也。”予甚异其说。后为齐州从事，有一举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尝学医于卫州，闻高敏之遗说，疗病有精思。予为道骧之言，遁喜曰：“齐尝大饥，群丐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遁以学医故，往观其五脏，见右肾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夹脊而上贯脑。意此即导引家所谓夹脊（“脊”后一字上为“雨”字头，下为“隻”）阙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为三焦也。单君之言，与所见悬合，可以正古人之谬矣！”——《医术论三焦》

**译文：**彭山（今四川彭山）有位隐士，精通古代医术，其医术与现在的各位医者所用的医法不同，没有人能了解他的医术。单骧跟随这位隐士学习，完全得到了他的真传，于是凭借其精湛的医术闻名于世。治平年间，我同单骧在广都（今四川双流）相遇，谈起古今医术的异同。单骧在谈了其大略之后，又感叹地说：“古人在论说人的五脏六腑时，里面有的说法有错误，而一代一代的医者在继承古人的医理时都不去细察，现在想把这中间的问题告诉人，可谁会相信呢？古医理说：人的左肾，膀胱是它的脏腑；人的右肾为命门，三焦是它的脏腑，男子用它来贮藏精子，女子用它来维持子宫。

按照这个医理来说，三焦就应该像膀胱那样，其形体器官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西晋时的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却说三焦是有脏腑而无形体，不也是大错吗！正因为三焦有像膀胱那样的形体，所以可以藏精、能够系包；如果它没有形体，那它凭什么来藏、来系？况且之所以称它叫三焦，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三焦分布在人体之中，有上中下的区别。当人的内心平静沉寂时，各种欲念都没有起来，那么此时人的精气就散布在三焦的各个地方，以滋养人的躯体；等到人的欲念一起来，心火燃烧，就聚集收缩起三焦的精气，进入命门的脏腑运送宣泄而去，所以才称这个脏腑叫做三焦罢了。各代的医者秉承王叔和的错误而不了解，真可为此而长长地叹息啊。”我觉得单骧的说法很特别。我后来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职时，有一个叫徐遁的举子，他是本朝著名学者石守道的女婿，它年少时曾经在卫州（今河南卫辉）学医，懂得名医高敏遗留下来的学说，他治病有精心的思考。我向他说起单骧的那番言论，徐遁听后高兴地说：“齐州曾遭遇大饥荒，有一群乞丐没有吃的，就相互割身上的肉来吃。有一个人他的皮肉全割完了，可全身的骨骸与脉络却还完整。我因为是学医的，很想了解人体内部器官的构成情况，所以我就去观看他的五脏。我见到右肾下面有一块像手那么大小的脂膜，正与左肾下面的膀胱相对，有两条白色的脉络从里面出来，夹着脊髓向上直达脑部。估计这就是导引家们所说的夹脊（“脊”后一字上为“雨”字头，下为“隻”）阙，却不了解那块像手大小的脂膜就是三焦。单骧先生的话，与我的所见遥相符合，这可以纠正古人的错误了！”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饮酒，醉卧涂潦中，不以为苦。尝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气勃然，雪辄融液。游于市中，常髻角戴花，小儿群聚摔骂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贩鬻饼饵，晚不能



售，辄呼与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饮，醉饱即睡，妇女在侧，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无他也。以此陈人敬爱之，至画其像，事以香火。刘述为京西漕，至陈，欲见江。方入城，江当道大骂，刘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撻之。明日，召江愧谢。江笑曰：“骂运使受杖，分也。”亦不谢。士大夫知其异，百计欲问其术，辄佯醉极口骂，终莫能问者。熙宁中，予为陈学教授，屡以酒邀之，饮不甚多，曰：“年老气衰，不能剧饮如往日矣！”大肉、硬饼，亦皆不食。每欲啖，辄中止而咽，若喉中时有流水者然。畏其骂，不敢问也。一日言及养生事，江拂然欲骂，予曰：“予以畏骂，久无所问，今日语，适然耳，非欲盗法也。且吾欲学道，开卷求之，虽不尽得，亦过半矣！顾方溺世故，妻孥满目前，虽使吕公来，其如我何，而况尔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决不问子术。姑告我昔本何人，缘何学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居妻家，不事生业，妻父屡谴我，至加殴捶。一日，闭门不纳。我傍待其门者累日，忽发愤弃之而游。少尝举学究，能诵《周易》。”试之，不遗一字。久之，太守陈述古招剑州李昊，使作符禁。昊为人大言多诞，欲见江。江即逃去，遂不知所在。——《王江善养生》

**译文：**有个叫王江的乞丐，住在宛丘，喜欢喝酒，喝醉了睡在泥水中，不觉得难受。曾经在大雪天，有人用雪把他埋起来，可埋他的雪堆上却冒出热腾腾的气，把盖在他身上的雪融化成水了。他经常把头发绾成妇人的丧髻那样，上面戴着花，满街游走。小孩子看见他样子可笑，又揪他的头发又骂他，他却依旧笑嘻嘻的，一点儿都不生气。他常常还去买些糕饼来卖，到晚上没有卖完，就叫别人来同他一起把糕饼吃了。他走进农家，家中老人请他吃饭喝酒，他一点也不推让，吃饱喝足，倒头就睡，就是有妇女在旁边，他也毫不顾虑，照睡不误，别人也相信他不会有什么出轨的行为。因此，陈州（宋时陈州的治所在宛丘）这一带的人都敬爱他，以至于画了他的像，挂在家中用香火供奉起来。刘述任京西路转运使，来到陈州，想见王江。刘述刚进城，王江就站在道路中间大骂他。刘述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江，就派人把他抓起来，送到州衙去用棍子打。当知道此人是王江后，第二天，刘述召见王江，向他赔礼道歉。王江笑了笑说：“我骂转运使而挨棍

打，这是应该的。”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向刘述道歉。士大夫们知道王江有特异功能，想方设法地想问他其中的奥妙，可只要他们一开口，王江立刻就假装喝醉了口中不停地骂，最终没有人能问得点东西出来。熙宁年间，我任陈州州学教授，屡次邀请王江来喝酒。他喝不了多少酒，他说：“年老气衰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猛喝了！”对大肉、硬饼这样的食物，他也不吃。食物在他的口中，每当要咀嚼时，马上就停止，直接把食物咽了下去，他的喉中好像时而有水在流一样。我怕他骂，不敢问是什么原因。有一天，我同王江在摆谈中刚说到养生的事，他便很不高兴地要开骂，我就对他说：“我就是因为怕你骂，所以好久没有提养生的事，今天是谈话合适了才提及这话题罢了，并不是我想偷学你的养生之法。再说我如果要学养生法，我可以在书上去获取，即使不能全学到，也可以获得一大半！不过我现在正沉溺于世俗生活中，妻儿老小一大家子需要我来供养，即使让你们道家的神仙吕洞宾来叫我去学道，我也不会跟他走，更何况你那点养生法，我还看不起呢？”听我这么一说，王江笑道：“您说得对。”我趁此对他说：“我决不问你的养生法，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去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学道而已。”王江说：“我本是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年轻时也娶过妻，居住在妻子家中，游手好闲不做谋生的事，岳父经常责备我，还打我。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岳父家关上大门不让我进去。我靠在门旁好几天都不给我开门，我忽然一发愤，离开了妻家四处游历。我青少年时曾参加过举学究的科考，能背诵《周易》。”听他这么一说，我便请他背诵一下《周易》，果然是一字不漏。这件事之后很久，陈州太守陈述古招剑州（今四川剑阁县）人李昊，请他来作符禁（道家法术）。李昊平时爱说大话吹牛，没有什么道家的真本事，他到陈州来后想找王江请教。王江一听说马上就逃跑离开了，连去了哪里也无人知晓。

高安丐者赵生，弊衣蓬发，未尝洗浴。好饮酒，醉辄殴骂其市人。虽有好事者时常与语，生亦慢骂，斥其过恶。故高安之人皆谓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与人遇，虽未相识，皆能道其宿疾与其平生善恶。以此，或曰：“诚有道者耶？”元丰三年，予谪居高安，时见之于途，

亦畏其狂，不敢问。是岁岁暮，生来见予，予诘之曰：“生未尝求人而谒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见尔。”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阳不降，阴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疮。吾将教君碗水以灌溉子骸，经旬，诸疾可去，经岁不怠，虽度世可也。”予用其说，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极其妙。生尝约予会宿，既而不至。予问其故，曰：“吾将与君出游，度君不能无惊，惊或伤神，故不敢。”予曰：“生所游何处？”曰：“吾尝至太山下，所见与世说地狱同。君若见此，归当不愿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与官吏，僧逾分吏囊物故耳。”

（按：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第四册第492页注释③：“僧逾分吏囊物故耳：本句难解，疑有脱误。”《三苏全书》第十八册396页苏辙集卷八五《丐者赵生传》中此处则为“僧逾分，吏暴物故耳。”而国学网上此处又为“僧逾分，吏囊物故耳。”虽然联系上文看该句应该是说当官的在阴间下场不好，但意思也难解，所以在下面的“译文”中，笔者不敢妄加揣测翻译，只好保留原文。）予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则见彼，彼不见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见人，而人不见鬼也。”自叹曰：“此亦邪术，非正法也。君能自养，使气与性俱全，则出入之际，不学而能，然后为正也。”予曰：“养气，从生说可矣；至于养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问曰：“君亦尝梦乎？”曰：“然。”“亦尝梦先公乎？”曰：“然。”“方其梦也，亦有存没忧乐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尝问我养性，今有梦觉之异，则性不全矣。”予矍然异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生两目皆翳，视物不能明，然时能脱翳，见瞳子碧色。自脐以上，骨如龟壳，自心已下，骨如锋刃，两骨相值，其间不合如指。自言：“生于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台僧不终，弃之游四方。少年无行，所为多不法。与扬州蒋君俱学，蒋恶之，以药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蒋不循礼，槁死无为也。是时，予兄子瞻谪居黄州，求书而往。一见，喜其乐易，留半岁不去。及子瞻北归，从之，与兴国知军杨绘见而留之。生喜禽鸟六畜，尝以一物自随，寝食与之同。居兴国畜骏骡，为骡所伤而死，绘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与子瞻皆召还京师，蜀僧法震来见，曰：“震沂江将谒公黄州，至云安酒家，见一丐者曰：‘吾姓赵，顷在黄州识苏公，为我谢之。’”予惊问其状，良是。时知兴国军朱彥博在坐，归告其父，发其葬，空无所有，惟一杖及两胫在。予闻有道者恶人知之，多以恶言秽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掩，故

顺德时见于外。予观赵鄙拙忿隘，非专自晦者也，然其言时有合于道。盖于道无所见，则术不能神；术虽已至，而道未全尽，虽能久，亦未可以语古之真人也。古书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岂假者耶！——《赵生挟术而又知道》

**译文：**高安（今江西高安市）有个叫赵生的乞丐，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很少梳洗。他喜欢喝酒，喝醉了就打骂街市上的人。就是那些喜欢热闹经常同他说话的人，他也照样谩骂，指责他们的过失与恶行。因此高安人都说他是狂人，不敢同他接近。但是他有一个奇特的本事，那就是他不管同谁相遇，虽然彼此从不认识，他都能说出那个人过去得过什么病，平生做过哪些好事哪些坏事。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便说：“赵生真是个有道行的人吗？”元丰三年（1080），我被贬谪到高安，经常在路上看见他，我也害怕他的疯狂，不敢问他的情况。这年年底，赵生突然来见我，我盘问他说：“你从不求人却来拜访我，是何原因？”赵生回答说：“我心里就是想见你。”过了一会儿，赵生对我说：“我知道您喜欢道家的养生之道但却没有得到其中的关键要领，你的身体阴阳失调，所以你显得肥胖而有些浮肿，脸色赤红还生些疮。我将教您怎样用一碗水来浇灌洗涤你的身体，一个月过去，身上的各种疾病就可去除，如果能一年到头地坚持，即使是超脱于现世也可以做得到。”我按赵生教我的方法去做，确实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不太懒不能长期坚持，所以不能完全领略到它中间的奇妙。赵生曾邀约我一同住宿，可以后他却不来叫我。我问他是何缘故，他回答说：“我准备与您在睡梦中出去游览，我揣测您会吃惊，而受惊可能会伤着您的神志，所以不敢与您一同住宿。”我说：“你游览到了什么地方？”赵生回答说：“我曾经到泰山下，所见的同人世间所说的地狱一样。您如果见到这里的情况，回到人世后很可能不愿再当官了。”我问道：“为什么？”赵生说：“那里有许多僧侣与官吏，僧逾分吏囊物故耳。”我问他：“你能到那个地方，他们也知道敬重你吗？”赵生回答说：“不会。因为虽然我看得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这就譬如我们说的鬼罢了，鬼到了人的家中，鬼能看得见人，而人却看不见鬼。”赵生说了又自己叹息道对我说：“我这也是邪术，不是正道。您能够自己修养，使自

己的养生之气与精神情志都齐全完整，那么，进出于阴阳两世，不需学您都能做得到，这样才是正道。”我说：“关于养气，我按照你说的去做就行了。至于养性，怎样才算养成呢？”赵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赵生突然就问我：“您也经常做梦吗？”我说：“是。”他又问我：“也经常梦见您已故的父亲吗？”我说：“是。”他说：“当您在梦中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清醒时那样感觉到您父亲已经作古了，自己还为之悲伤呢？”我说：“这种情况有，但并不经常是这样。在梦中，多数时候父亲还是同生前一样活着的。”赵生听了笑道：“您曾经问我养性怎样才算养成，现在看来您在梦中与清醒时感觉各不相同，那么，这就表明您的精神情志是还不齐全完整的。”我听后感到了惊奇地看了看他，觉得他的话很特别，从此我就感觉到赵生不仅仅是有道术，而且对道家的哲理也深有了了解。赵生两只眼睛都长了翳子，看不清楚东西，但是时而翳子会脱落，可以看见他眼中碧绿色的瞳子。他身上从肚脐往上的肋骨有如龟壳，从心脏的地方往下的胸骨有如锋利的刀刃，两边的骨头相对，中间没有合拢有一指宽的距离。赵生自己说：“我生于甲寅年，今年一百二十七岁了。我是代州人，叫赵吉。我先在五台山学做僧人，最终没有坚持，便放弃了去云游四方。我少年时品行不好，经常为非作歹。在扬州我同一个姓蒋的人一道学习，姓蒋的厌恶我，他用药来毒我的眼睛，于是我的眼睛便长翳子了。”然而赵生也指责姓蒋的不遵循礼义，结果姓蒋的到死也没有什么作为。这时，我的兄长子瞻谪居黄州，赵生请我写了封信带着前去见子瞻，赵生去了后，很喜欢子瞻兄的和乐平易，留在那里住了半年都没有离开。等到子瞻兄遇赦北归，赵生又跟随着到了江西兴国，兴国知军杨绘见了赵生后就留他在那里。赵生喜欢喂养禽鸟和猪、牛、羊、马、鸡、狗之类，身边经常跟随着一只宠物，睡觉吃饭都在一起。他在兴国的时候，养了一头漂亮的骡子，结果被这头骡子所伤而死去。知君杨绘具办了棺木埋葬了赵生。元祐元年（1086），我同子瞻兄都被召回京城，蜀僧法震来看我们，他说：“我溯江而上准备来黄州拜见各位，走到云安这个地方，在酒店里见到一个乞丐，他对我说：‘我姓赵，

不久以前在黄州结识了苏公，请替我告诉苏公。’”我听了法震的话十分吃惊，赶忙问他这乞丐长的样子，从法震的描述中表明的是赵生。这天，刚好兴国知军朱彦博也在这里，他听了这个奇闻后，回去告诉了他的父亲，他们去打开赵生的坟墓，里面空空的只有一根拐杖和两根胫骨在那里。我听说有道行的人厌恶别人了解自己，大都用恶言秽行来隐藏自己，但是也不能完全遮掩得着，所以他的上进精神有时要显现出来。我看赵生虽然浅俗拙劣，性情偏激，不是一个一心要掩藏自己的人，但是他的话时而有符合哲理的。大概一个人对于哲理不了解，那他的道术也就不能神奇；而一个人道术虽然已经达到极致，但如果他的精神思想境界还不完全，那么，即使他活得很长，他也不能与古代的得道成仙的真人相比。古书上说那种下等的留下身体躯壳而去的人，会留下一块骨头。赵生难道也是这样的人吗？

#### 简评

《龙川略志第二》共三则，记述的内容为医术与养生，所记的人和事都有些奇特，但都或含蓄或鲜明地表达了苏轼对学术对道家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在《医术论三焦》中，作者借两位医者的看法与见闻，含蓄地表达了对从古流传下来的一些见解不能盲目相信，要通过思考并用事实来辨明其真伪的这一观点。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记述医者单骧对三焦的看法，后一部分记述另一医者徐遁关于三焦的见闻。在前一部分中，作者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把单骧的看法写出来，而是介绍单骧得到彭山一位“通古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的隐士的真传，成为了名医。这一介绍绝非闲笔，而是颇有意义的：一是表明单骧是位名医，名医论说医术自然就有分量，二是单骧师从的一位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的隐士，因此，单骧能对“世诸医”所遵从的一些医理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文章开始对单骧的介绍，完全是为他论说三焦的话做支撑和铺垫的。接下来，作者借自己与单骧相遇“论古今医术同异”而引出单骧一番关于三焦的看法。单骧认为，“古人论五脏六腑，其说有谬者”，可一代一代的医者却不认真分析，把错误的东

西继承下来，以至于现在你要指出它是错的，都不会有人相信，可见问题相当严重。以三焦而论，按照“左肾，其府膀胱；右肾，命门，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的古说来推理，那么，三焦就应该像膀胱那样，其形体器官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西晋时的著名医学家王叔和这位古人却说三焦是有脏腑而无形体，不也是大错吗！正因为三焦有像膀胱那样的形体，所以可以藏精、能够系包；如果它没有形体，那它凭什么来藏、来系？可是，对这样一个道理，一代一代的医者秉承王叔和说“三焦有脏无府”的错误而不了解，真可为此而长长地叹息啊。如果说单骧的看法仅停留在推理上的话，那文章后一部分写徐遁关于三焦的见闻，则是以事实来证明了单骧推理的正确。徐遁是本朝著名学者石守道的女婿，也是一位名医，他告诉苏辙，他从一个“皮肉尽而骨脉全者”的身体上见到的那块右肾下“正与膀胱相对”“如手大者”的“脂膜”就是三焦，这表明三焦是“有形质可见”的，完全符合单骧的推理，是可以纠正王叔和说“三焦有脏无府”的错误的。

其实三焦是“有脏无形”，还是“有形质可见”，孰是孰非，笔者非医家，对此无发言权，即便是写作本文的苏辙，尽管他因小时候就多病而对医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他也没有直接在文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苏辙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写作此文，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三焦是“有脏无形”，还是“有形质可见”，而是要借此表明对待那些从古流传下来的知识见解应持的一种态度，即对从古流传下来的一些知识见解不能盲目相信，而要通过思考并用事实来辨明其真伪。苏辙的这种态度，是一个追求真知的学者对待知识遗产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其实不仅苏辙，在北宋时期，持苏辙这种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苏辙的兄长苏轼在其著名散文《石钟山记》中通过记述对古人郦道元、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说法的怀疑并亲自夜访石钟山而弄清了其得名的真正原因的经过，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著名观点，即对古人的见解要通过思考找出其可疑之处，并要用亲身的“目见耳闻”的实地考察以纠正错误，得出真知。与苏轼苏

辙兄弟同是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也在其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中借人们把褒禅山的原名“花山”误读为“华山”这一情况，指出由于“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的现象是“何可胜道也哉！”提出“学者”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必须要持“深思而慎取”的学习态度。苏辙、苏轼、王安石这些学问大家用心思考、严肃认真对待知识遗产的态度真值得今人推崇与学习。

《王江善养生》《赵生挟术而又知道》两文则写了王江、赵生这两个学道狂人的奇特之事。两个人有两个鲜明的共同之处：一是善养生，身体好，王江“醉卧涂潦中，不以为苦。尝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气勃然，雪辄融液”，赵生高寿已有一百二十七岁，并用养生术帮助苏辙解决身体阴阳不调问题；二是二人虽处于人世之中，但都不把人世当回事，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放浪形骸，都喜欢饮酒且醉则骂人，二人都对做官持否定的态度，王江“当道大骂”京西路转运使刘术且不理睬刘术的“愧谢”，赵生则借夜晚“出游”告诉苏辙官没有什么做头。总之，让人感觉二人虽处于人世间，可一点也不在乎人世的一切，什么衣冠整洁，什么尊卑贵贱，得失荣辱，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统统不管，整天不思不想、不忧不虑，醉饱了倒头就睡，完全超然世外。不过，对苏辙、苏轼兄弟这样的学官、贬官，他们都持友好态度。王江没有拒绝时为“陈学教授”苏辙的邀请，赵生则主动接近贬谪之官苏辙、苏轼兄弟。如果说同中有异的话，赵生似乎道行要比王江高一些：王江说自己是“年老气衰”，饮食大不如以前，而赵生不仅身体奇特，年岁高达一百二十七，且有“与人遇，虽未相识，皆能道其宿疾与其平生善恶”之术而又“知道”，就是消失，王江是“逃去”，而赵生则是神奇的“尸假”。

从《王江善养生》《赵生挟术而又知道》可见，苏辙对道家的神奇之处相信不疑。处于千年前的那个充满迷信的年代，今人对其应无可厚非。不但苏辙，就是其兄苏轼，也对道家的奇特深信不疑，苏辙、苏轼兄弟幼年的启蒙老师张易简就是一个道士，苏轼在《陈太初尸解》一文中就写了同自己一起受教于张老师并都受张老师喜欢的同学陈太初学道修成之事。而且，



北宋朝本身就十分推崇道家,从宋初的宋太宗、宋真宗到北宋末的宋徽宗,都是崇道者。皇帝崇道,社会自然普遍信道。所以苏辙对道家神奇之处的深信不疑,也就很自然了。

但笔者认为,苏辙写王江、赵生,绝不在于仅仅展示道家的奇特,而是还有用意的:一是借王、赵二人的言行举止来含蓄地表达对道家养生术的肯定向往,二是含蓄表达自己对道家超然世外、等闲看待世态炎凉的处世态度的心向往之。

“王江善养生”,这个标题中的一个“善”字,就表达了苏辙对道家养生术的向往,而对王江“醉卧涂潦中,不以为苦。尝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气勃然,雪辄融液”的描述,透露出苏辙对王江养生成果的肯定。对赵生,苏辙虽然没有直接说他善养生,但文中记述的赵生帮自己解决身体阴阳不调问题且立竿见影的疗效,以及赵生的高寿、鬢子自脱落等事情,都无不表明赵生更是一位让作者心向往之的养生高手。苏辙对道家养生术的肯定向往是有来由的,他自小多病而身体不好,用药治疗也效果甚微,直到他32岁时在陈州得到道家的养生“服气法”,才治好他的病。他在《服茯苓赋并叙》中谈到了这一令他难忘的过程,他说:“余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有二,官于宛丘(陈州治所),或怜而受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周年)年,二疾良愈。盖自是始有意养生之说。”自己从小以来长期治不好的病,竟然让道家的养生术治好了,苏辙怎能不向往道家的养生术呢?岂止苏辙,笔者敢说,任何有这个经历的人,肯定都有像苏辙那样的感受。苏辙对道家养生术的向往可以说是念念不忘,他四十多岁谪居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在其撰写的《筠州圣寿院法堂记》中又提到道家养生术治病的良好效果,他说:“余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所以说,苏辙在《王江善养生》《赵生挟术而又知道》两文中借对王、赵二生的养生情况的记述来表达他对道家养生术的肯定向往的这一用意是十分自然而明显的。写到这里,笔者不免有些感慨,当今之人,虽

然物质生活不错,但患病者也多多,以至稍微有点档次的医院都是人满为患,不少人的病还久治不愈,既耗钱财,又徒增身体痛苦。如果当今之人能得像王江、赵生那样的养生之术,可谓是一大福音啊!

至于说借王、赵二人的言行举止来含蓄表达自己对超然世外、等闲看待世态炎凉的道家处世态度心向往之,那也是对两文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你看,宛丘的“学道”者王江,高安的“有道者”赵生,尽管都是衣衫褴褛,行同乞丐,可他们整天不思不想、无忧无虑,醉饱了倒头就睡,什么衣冠整洁,什么尊卑贵贱、得失荣辱,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统统不在乎,完全超然物外。苏辙在描述这两人的行径时,虽然基本上是丝毫不作评判的客观记述,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对二人是持肯定之态的。苏辙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要借王、赵二人来含蓄表达此时自己谪居龙川的超然豁达心情。苏辙作为一位一贬再贬的罪官,虽然因为遭受打击和地位境遇的巨大落差变化而难免不失意痛苦,但饱经几十年宦海沉浮,他已经修炼出处变不惊的平静心态,加之他多年来在与众多的道家交往中,深受道家淡看得失荣辱、炎凉世态的旷达超脱思想的影响,他早已是能等闲看待自己被一贬再贬的坎坷境遇。苏辙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心态直接公开用文字来宣布,而是借描述道家的旷达超脱来含蓄表达,这样,既可避免因直接公开表示自己不把贬谪当回事而招致政敌对自己再下毒手,又能把自己等闲看得得失荣辱的超然世外的心情表达出来,这真不失为是高妙之举。

关于谈到苏辙从道家的超然世外的思想中获取精神力量从而等闲看待人生遭际、世态炎凉的这一人生态度,笔者不妨多说几句,对苏辙在贬谪生涯中与道家交往的情形作一作追述。元丰二年(1079),苏辙受兄长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年过四十的他被贬谪到“峻且远也,士之行乎当时者不至于其间”(《筠州圣寿法堂记》)的筠州,而且这一贬就是五年。苏辙在《颍滨遗老传》中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在仕途上虽说不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但也还相对比较安稳的苏辙首尝遭贬,且长达五年,其内心的

失意、痛苦是不可言状的。年过四十，“视听衰耗，志气消竭”，面对“多病”与“多难”的双重打击折磨，苏辙却在与僧道的交往中，吸取了僧道超然世外、看淡世态炎凉名利得失的精神思想，使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心情都变得好起来。筠州自古至今，道家风化盛行，苏辙在《筠州圣寿法堂记》中说筠州在“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至于妇人孺子亦喜道士服”。筠州又是一个佛教盛行之地，从唐代“马祖兴于江西”，至今“则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筠州可以说是僧道众多，苏辙在这里同他们频繁交往，论道悟禅。据熊朝东《大写三苏》记述，在筠州：“经常与苏辙往来论道悟禅的各洞山僧则有克文和石台长老、黄檗和能禅师、鉴清和善正医僧等人；道士则有扬腾山人、方子明道人、扬智远道士等人。交往之众，甚为热闹。”《赵生挟术而又知道》中的赵生也是苏辙在筠州交往的道人之一。在与众多僧道交往论道悟禅中，的确让苏辙体会到了“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的好处，不仅身体无恙，尤其是因遭受贬谪而失意痛苦的心情一扫而空。他在筠州写的《东轩记》一文，借对孔子高徒颜渊安贫乐道的理解，充分地表达了他悟道后看淡名利得失、安贫乐道的愉快心情。他说：“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苏辙在筠州还写下了一部融儒道释于一炉的奇特著作《老子解》，力图将儒学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旷达超脱结合起来，以具体实践儒家提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主张，苏辙二次遭贬在雷州又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修改。苏轼看了后对其评价极高，说：“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如果说，苏辙三十二岁时，在宛丘仅对道家的养生术十分肯定与向往的话，那十年后从第一次贬谪起，道家的旷达超脱思想境界就成

了苏辙在困厄之中淡看得失荣辱、笑对炎凉世态的精神力量。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崩，宋哲宗亲政，年已六十的苏辙被一贬再贬，拖着一家老小十几口子，水路陆路行了近万里来到龙川。龙川这里连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一所，生活比第一次贬谪还要苦，而且几乎无人可以交往，与第一次贬谪筠州比起，真是天壤之别。不过，也有道士与他往来。有个叫陆有象的道士与苏辙交往甚密，情谊笃厚。苏辙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住在龙川这样的鄙野之地，有如“野鹤堕鸡群”。后来苏辙北归隐居颍川，他还曾专程往访。此时的苏辙虽然对宋哲宗及章惇等奸臣把持的朝政心灰意冷，但对生活的态度却是开朗的。几十年宦海沉浮的他早也是处变不惊，加之不久前在雷州完成了融儒道释于一炉的奇特著作《老子新解》，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世哲学已沁入骨髓。所以他在龙川面对无比艰苦的生活环境，不怨天，不尤人，用身上仅余的钱买下一所破屋，“补苴弊漏，粗庇风雨”，带领家人开荒种菜，自力更生。不仅如此，他还以口述的方式，进行《龙川略志》这本书的写作以表达自己谪居的心情和回顾自己从政以来的是是非非。《龙川略志第二》中描述的王江、赵生两位学道者，就是苏辙借他们的行径来含蓄地表达身处贬谪际遇的自己对道家的超然世外的思想中获取精神力量从而等闲看待人生遭际、世态炎凉的心情。

古往今来，不管是高官伟人，还是一般百姓，其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大起大落，有的小起小落，都有遭受打击、失意倒霉的时候。面对巨大的落差变化，是唉声叹气、痛不欲生，还是从痛苦失落中解脱出来，平静豁达地看待得失荣辱，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笔者认为，后者的人生态度是可取的。千年前的苏辙在这方面为我们作了一个榜样。虽然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像苏辙那样与道家交往，从道家身上吸取超然豁达的精神力量，但细心感受和理解苏辙淡然面对困厄逆境的精神境界，对修养我们的人生态度是不无益处的。

胡先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笃行：德艺双馨的不懈追求

## ——读方永江《且行：苏祠外仰视》

张志烈

永江在10月下旬给我发短信，要我为这本书写个简评。我应允了，但说要等手头的一件事完成后才能做。惭愧的是没想到竟拖了这么久！

两个月前，川大古籍所的工作人员来找我，说历史系任乃强先生的遗著《周诗新诠》经整理后即将出版，巴蜀全书负责人和出版社领导想请我看看稿子，“把把关”。我仰慕任老师的学问和这个研究的意义，亦由于和古籍所的友谊，便答应了。任老师是资深史学家，尤强于古史地理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还对西南地区羌、彝、藏少数民族地区1949年以前的社会形态作过长期深入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周诗（即“诗经”）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时段，与建国前羌、彝、藏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态处于相似相近阶段。所以，他产生兴趣，从把握准社会形态特点切入来重新审视《诗经》。他还花很长时间，把汉以来直到清末的几十种解读《诗经》的著作精细地咀嚼了一遍。这样，她的《新诠》中纠正前人的陈说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校字、断句、分章、定地、定时、划分乐类、考订作者、钩稽本事、阐释意义等多方面都有大面积的创新突破。我兴奋地认为，此书出版将会引起古代文学研究界的震动。但是，由于打印制作人员的有关知识技能跟不上，书稿中凡涉古籍文字的地方，到处都发生严重错误。于是，我得用先秦的所有重要文籍为之校核。二十天下来，只看了六分之一。这时，我向联系人员反映：不可能按他们要求的时限完成。出版社着急出书，不同意延

期，于是把书稿收回去了。我以为就此“解脱”。哪知早晨拿走书稿，下午就打电话来，一再道歉，仍要请我看。第二天早晨又送书稿来，说时间照我的要求延展，不设期限了。事情又套上了。我老伴病重躺床，要我24小时不离开她，到隔壁书房看书也不行。我只好在床边安把木椅当桌子，经史文籍放在床上，坐在小凳子上审改稿子。中间，我还到重庆参加两天关于杜甫的会，到西华大学参加两天关于苏轼的会。直到几天前，才把一百万字的书稿审改完，交出去，

我终于开始读方永江的散文集了。

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听到回声，找到启迪，而散文作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广阔时空容积，使之成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最佳展示平台。果戈理曾说普希金的诗“每个字都是无底的深渊”。几十天看《周诗新诠》书稿形成了对每个字都要用钉锤敲几下看它究竟装载些什么的惯性，使我在读方永江散文时，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更陷入另一种途径的兴奋中。我不是一块海绵，但他散文中的诸多意象、情感、理念、追求，却无间隔地浸入我的心田。

长话短说，只讲三点。

其一，是认识东坡。

我大半辈子读苏轼的书，但我由衷赞同王水照先生“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感受。再加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作品接受规律，我觉得我们对东坡的认识永远

走在路上。永江对东坡精神、价值意义的理解感悟，个性鲜明，感染力很强。

《东坡今年 970》开头描绘东坡诞生，就不仅是叙述文字，而是一串串情感跳动的音符。接下来三章，分别从“东坡属于人民”、“东坡属于大自然”、“东坡属于全世界”来论其一生，各章从多角度审视，而又集中最亮点观察。最后一章，高吭礼赞，势如黄河奔瀑：“你属于人民：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创造奇迹，你的名字不是刻在石碑上，而是刻在人民心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属于大自然：雨露滋润，大地清新，帝王的霸业灰飞烟灭，你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你属于全世界：东坡精神激浊扬清，东坡文化春风化雨，你不仅是眉山的骄傲，中国的骄傲，而且是世界的骄傲……”诗的飞动、诗的激越、诗的征服力。这样的书写，与其他多角度、多形态的弘扬东坡文化之作，存在不可或缺的互补性。

集子中这些感悟东坡的篇章，汹涌的文思总是立足现实。《东坡书楼》，放眼古今中外，讲了许多书楼、图书馆的故事，然后点睛：“苏东坡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千年英雄。是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是中国的唯一。他是世界的骄傲，中国的自豪，眉山的荣光。既然如此，眉山何不建一个世界英雄园呢？”《坠在枝头》，像是一篇新时代的“秋思赋”，中有句云：“苏轼密州任上，既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亡，超然物外的乐哉游乎，又有把酒问天，欢饮达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使密州那轮明月成为照耀古今、温暖人心的最亮最美的寄托。”这是立足现实、引人入胜的新体会、新语言！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散文中幅集思维与辐射思维运用自如。“寂寞子由辙”这个题目中的“辙”字就用得很具匠心。在叙议中又融贯三苏，融贯古今。穿透、打通、汇聚：“性格即命运。不知深浅、不懂世故、不擅权变、不明进退、不晓操作，三苏的寂寞是古往今来所有正直良善的学人的寂寞，一切皆是注定。而我更认为，是良心使然，亦正如鲁迅所谓中国的脊梁！”愤激包裹着的是崇敬、追求、坚持、守卫。

我们的确可以从中体会：一颗永恒的赤子

之心，矗立千古的独立人格，不被任何邪恶打垮的精神堡垒，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哺育出的崇高性灵。

## 其二是认识眉山。

眉山是一本很耐读的有趣的书。

2005年，我和邱俊鹏先生想方设法下决心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址从四川大学迁回眉山时，我曾用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韵，写了一首《蝶恋花》：“中国眉山名不小，苏海汪洋，声浪全球绕。学会兴隆天下少，五湖四海连芳草。巨著同研扬大道，经济腾飞，故里人民笑。铁板铜琶何可消，心弦会处无烦恼。”后两句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宗旨。

几十年与眉山文化界朋友接触，他们人才济济，各有风华，然而隐隐中似乎总有些与三苏文化相联的共通的气质。我甚至在想，除了人文精神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之外，这里的空气、河流、山峦、农田、森林、花草，是不是还含有什么特别的元素，不然为何如此钟灵毓秀呢？

《仰视》中记载了丰富的史实，发人深省。

《殆是前缘》中记述了2005年苏轼学会迁眉史实，市委市政府成立三苏文化研究院的关键决策，省、市社科联的指导扶持，一批三苏研究力作的诞生（如《三苏产生的历史背景》、《苏轼的为官之道》、《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等）。这个“缘”就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的汇聚，而持续发展下去，就还当继续“缘”下去。

《“潘基文”归来》，记录了“眉山恒久的光芒”如何照耀今日眉山的不断前进。集中突显：继承发扬、创新性转化，就是“要把东坡文化的精髓浸入我们安身立命的城市的血脉中。苏轼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千秋功业，才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啊！”这已经成了眉山人的共识。

说到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远景楼月色》中有一段具象而精彩的描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眉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日眉山，干群同心，务本力作，在岷江古河道修建了十里景观长廊，把一条糟糕的污水沟改造成烟波



浩渺的东坡湖。碧波之上，重建远景楼，主楼13层，高度80米，为国内最大仿古塔楼；两侧仿古裙楼，名‘超然阁’、‘醉月阁’，浑然融合，景象万千。春之柳，夏之杏，秋之桂，冬之梅；楼之巍，像之庄，碑之广，琴之雅，万千宠爱集于长廊。……东坡外滩横空出世，俨然蜀中上海外滩。东坡醉月，仙乐袅袅；远景楼台，明月皎皎；精品餐饮一条街，中华名店鳞次栉比，东坡外滩十里夜来香……”这段描写，展现了眉山的现实，留存了眉山的奋斗，更揭示了眉山的创造精神，是外地人认识眉山的好画图。

景物如此，人更佳焉。《刘小川〈苏东坡〉之于眉山的现实意义》，用五个判断句为纲——“是眉山时代精神的绚丽绽放”，“是‘文化立市’的奠基之作”，“是人才工作的重要成果”，“是东坡奋厉当世的生动实践”，“是眉山名片物态化的有益尝试”，并通过每段发挥，把“人杰”与“地灵”的辩证关系说得淋漓尽致。此文和《倾注‘三心’写三苏》中对熊朝东《大写三苏》之书内精义和书外故事的深情叙说，都是认识当代眉山文化人群体的最精彩的镜头。我敢肯定，将来续修眉山市志时，这些内容都将是新“文苑传”所依据的重要史料。

### 其三，是认识方永江其人。

马、恩曾引用布封的话，肯定“风格就是人”。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可知文如其人是古今中外的共识。读方永江的散文就有一种跟他在茶桌上品茗抽烟时的放松感，对面感，看得见这个活生生的人。

他的刻苦学习，使人佩服。“为着一篇拿得出手的‘豆腐干’，哪怕做上上百万字的笔记！”（《服务中成长》）这就是《中庸》上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朱熹解为“勇之事也”。这种学习上的勇猛，《仰视》中随处可见。《文化的自信》中提到西方的情人节时，作者追索文献，理出西方情人节的四种起源。这种精神的养成是自少年、青年开始。读书时“白天，三分之一时间上课，三分之一时间泡图书馆，三分之一时间茶馆枯坐，聊天，冲壳子”（序二）。儿童时代，冬天，竟把奶奶疼怜孙子耳脸生冻疮而添置的灯芯绒帽

子拿去交换同学的一本《官渡之战》（《阅读之今昔》）。“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要做学问，必须要有自找苦吃的洒脱、勇于吃苦的果敢”（《苦根上长出的甜果》）。

他的志存高远，也是从小培养，一生奉行，很使人钦敬。《东坡书楼》的结尾，引用了林语堂先生的精彩叙议之后，他冲口而出：“每每读书至此，忍不住拍案叫绝，更忍不住掩卷太息。就是这样的几句话，就算再过一千年，眉山也没有人写得出啊！这时，我才多少理解了东坡先生‘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惋叹和李调元‘怜尔有才偏早逝，愧我无能却后天’的悲鸣……”我读《仰视》至此，也忍不住拍案叫绝：“好小子！这不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潜意识在变相流露吗？”感叹的背后，是追赶的潜在冲动，是他自己也没觉察到的一种力争向上的激情。

促使我这样想的因由，就是那首20年前的《你，没有港湾》：“红帆船就是红帆船/红帆船没有港湾/浪漫是顺风的风/信念是顺风的帆/船体是目光的延伸/延伸的目光是力之源/红帆船不需要港湾/靠一次岸/多一次心灰意懒/恋一个站/几缕忧愁平添/红帆船与港湾无缘……”且看如今作者自己的评价：“蕴含其中的对信念的固守、对理想的坚持、对远景的憧憬，仍然让我感叹同学当年！”

《娱乐片的悲哀与出路》中提出“找回和重新建构艺术、艺术家的灵魂”，这正是其一贯坚持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的展现。《一脉相承的“天问”》，则是作者与付庆一先生心心相映的“天问”——从另一角度表现对自然、生命、社会、家国、人文、历史的最深沉的热爱和关切。文中明确宣言：“用自己的一生甚至生命，构建起人类精神的高地和可与日月同辉、山河共存的文明传承。”

他对东坡文采的某种追步和传承。

东坡故里的文化血脉滋养着眉山文化恒久的发展繁荣。就艺术层面说，我在1986年平顶山召开的苏会上提出东坡散文有“真、精、妙、达”四大鲜明特色。

（下转第70页）

# 我的抗战

## ——《且思：苏祠外浅尝》序二

方永江

毫无征兆地，几乎就在苏轼生日的那天傍晚，暮云低垂，寒风萧瑟，心华邀我在杭州路街边小桌一聚。一锅热气腾腾的青菜园子，一壶甘冽深醇的老酒，一番言辞恳切的交流，定下了服务苏学、服务苏学专家学者，一同筹组三苏文化研究院的事。时在2007年年初，我的抗战悄无声息地打响了。

建区设市十年过去了，开办费五万元，同十年前一样。两名事业编制，为领导职数；三名人员控制数，用于招兵买马。腾出三苏祠南堂四面透风的一间文物储存室，权当办公室，其时，市级机关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早已享受一杯清茶、一张报纸、中央空调优哉游哉不亦乐乎的老康日子了。上无挂靠，下无对口，人、财、物极度匮乏、极端落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异常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当初，有朋友好心劝告我，年纪轻轻跑到研究院做什么？在他们的眼里，研究院就是一个养老的地方，典型的清水衙门，既没有报社实惠，更谈不上风光。中途，又有领导私底下许诺，到我部门，随便让你分管一坨，都巴适得很。我终是不为所动，坚持了下来。

3月16日，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成仕为我们授印、授牌，本院算是正式开张了。在周先生热情洋溢致辞的同时，一位市领导把我叫到一边耳语：不要挂牌之日，就是死亡之时。他的一番良苦用心，从此让我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枕戈待旦、高度警惕。

盛夏，蒸笼里烧烤，摆一盆水于脚边，一台廉价电扇呼呼对着脑壳吹，汗水酩糊了脸面，就洗一帕；严冬，冰霜里冷冻，风拍打窗户啪

啪直响，鼻涕稀里哗啦地流，卷一张纸擦了这边顾不上那边，鼻孔擦得通红、生痛。就是这样，不到半年，我们相继完成了《三苏文化研究规划》和《三苏文化创作规划》，不啻为千百年来苏学研究的“平型关大捷”。不因小弱而自甘堕落，在东坡国际文化节中，敢于作为、大胆作为、有所作为，年轻的研究院被市委表彰为先进集体，我也被表彰为先进个人。

成仕者，成事也，能成事、能成大事。我与之共事的日子，感觉其不因老资格的市领导而高高在上，反倒是处处体谅下属、平易近人如哥兄老弟。一天，我带着女儿在小区玩耍，碰上周部长一家，我说，让我的女儿叫你周爷爷呢还是啥？他快人快语，叫啥子周爷爷？别把我叫老了，就叫周伯伯。工作上，他是严厉宽厚的好领导；生活上，他是谦逊温良的好兄长。故而，以我如此这般粗疏率性的性格使然，有时叫他周部长，有时喊他周大哥，他竟不以为怪，哈哈。研究院由宣传部代管，最初，我们想背靠这颗大树好乘凉。周大哥一脸严肃地说，管啥子管？！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去整。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少些约束羁绊，让我们甩开膀子干。其实，他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关照着研究院，在经费划拨、人员选调、课题立项等方面开小灶，以至于有些人不无醋意地称研究院为宣传部的“小幺儿”。他更站在战略的高度，助我们开辟战场，力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挂靠我院；帮我们拓展阵地，促成《苏轼研究》交由我们编辑。这对于以党政的力量来推动苏学研究的“眉山模式”的形成，意义特别重大。

除日常的行政工作外，周大哥还要日夜操

劳三苏纪念馆的修建。就是在这种不分节假日、不分上下班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厌其烦地组织我们对课目录、章节撰写等反复讨论、修正，岂止三易其稿？正因为有了这种执着这份担当，精益求精，《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等课题专著才填补了苏学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斩获省、市社科评选的一个又一个重要奖项，于战火纷飞中，展示了我们血染的风采。

打仗的事，难免有牺牲。有的人想来，终不愿来；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来了，俨然汪精卫，又仿佛溥仪，甚至白吃干饭不干活的是什么也不是。正如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用人不当、用人失察时所说“进人太锐”，不加深思熟虑、盲目招人进人，不敢亮剑、屈于外部压力用人晋职，只能祸害抗战，贻误苏研大局。沉痛的教训不亚于淞沪失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方志敏先遭受挫、吉鸿昌遗恨千秋，苦泪暗咽；开辟珠峰航线、打通中缅公路，自己的肚子痛只有自己才知道。也有柯棣华山不转水转搭起心的天路、白求恩漂洋过海来看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要血战长沙、保卫武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经费，还是经费。不是公务员序列，也参不到公，人头经费只有一半，人员控制数分都不分，职工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一分都不能少。特别是目标奖，年年增加，年年压力在增加，事业编制发一半，人员控制数照样分都不分。每到年终，经费问题总是让人格外焦心。残酷的现实就是，狗眼往往看人低，锦上添花多的是，傍大款望土豪趋之若鹜，无需撒钱的偏偏大把大把撂荒；而确乎需要关心关爱关照的，常常熟视无睹，装聋作哑，装疯迷窍，落井下石。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纯粹公益学术机构，别说创收，化缘也难。全年经费，不够半年开支。负债14余万元入不敷出之时，我只得取尽工资积蓄2万余元垫付同事们出差，大半年后才分次分批还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大女儿相依为命，我这个工作近20年、也算有一官半职的人，存折上只有四十二元五角！耄耋之年的双亲，身体随时都可能出状况；乡下的兄弟姊妹，翘首以待渴望周济一二。四面楚歌、危如累卵、忧心如焚的绝望，非身临其境而不能有切肤之痛。恰似

当年苏文忠，漂洋过海首作棺！再苦再亏自己也不能亏欠与自己一同坚守阵地、创新创业、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兄弟。以至于心华在政协会上发出了“研究院有娘生没娘养”的呐喊，令人肝胆俱裂。所幸财政的一帮友人菩萨心肠，深切同情水深火热中的弱势群体，盟军的援助每次都是雪中送炭，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公而忘私的阶级感情和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还有车辆，还是车辆。到如今，公车都要改掉了，研究院没有配备过一辆公务用车。而那些强势强权不差钱的部门领导，坐骑是换了一茬又一茬，甚至至于他们的中层也是专车来去若干年。还是心华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地发出了关于配备一辆公务用车的第N次请示（应当修入市志，载入院志、苏研会志，让历史告诉后人，我们当初是有多么的不易），我劝阻他说，这样恐怕不妥吧？他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没什么不妥！当然，一样的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知道，他是要把所有的风险独自承担，一心只为我创造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惟有这样的性情中人，才是真正可以并肩作战、视死如归的人！

虽然也遭遇了豫湘桂大溃退和败走野人山的种种厄运，也被有些人故意抛弃，任其自生自灭，宛若苏轼贬谪黄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但是历史的铁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坚定迈向胜利的步伐！抱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力行持久战，打好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扎实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跳起来摸高，飞起来跨越，一跳跳过一千年，一飞飞过太平洋；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凝心聚智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苏轼学术研究眉山号令一出，其遗址遗迹地莫不闻风而动。有为有位，强劲的生命力转化为爆发力、开创力和影响力，要钱给钱、要编制给编制，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喜日子，也迎来了我们八年抗战的全面胜利：

——新发展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200余人；

——与乐山师范学院合作共建“三苏文化

资源研究与建设数据库”；

——平稳推进《规划》，出版学术专著、应用性课题 100 余种，创作三苏题材文学作品 300 余种；

——指导苏轼遗址遗迹地成立苏轼文化研究会 10 余家，研究院内设机构也从无到有，分别成立了办公室、研究室、创作室，人员精悍，4 名事编均为国字号；

——成立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创办会刊《东坡学校》，定期举办三苏端午、中秋沙龙等品牌活动，不遗余力做好三苏文化普及工作；

——召开全国性苏轼学术研讨会 24 次，年均 3 次，特别是分别成功召开了全国首届苏洵、苏辙学术研讨会；

——会刊《苏轼研究》从最初发行不足 200 份，到海内外广大苏学爱好者竞相求索，一再增印，发展到每期印刷 2000 册，免费赠阅苏学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和各大高校图书馆；

——《四川社科界》连续刊发《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等四篇文章，向全省推介我院社科工作经验，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年来之从未有，亦为 21 个市州社科界所罕见，使名不见经传的三苏文化研究院一举成名天下知！……

缅怀历史，是为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胜利日的光辉岁月里，我躲在陋室一隅，细数战争的创伤，细数无悔的抉择，细数天上的流岚，细数窗前的落叶，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八年过去了，人在，阵地在，旗在飘，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可以自豪地说，方永江无愧于——

组织的岗位！

国家的俸禄！

人民的纳税！

八年过去了，九年、十年已来到，还有十三五、十四五，路漫长。战斗正未有穷期，必须随时以血肉之躯筑成铜墙铁壁，捍卫河山、抵御外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苏山有路勤为径，苏海无涯苦作舟，横刀立马看我川军！

2015 年 9 月 3 日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会秘书长。

（上接第 67 页）真，是在文章中见真事实、说真心话、显真性情，读来如与故人晤谈，心随语出，仿佛触其脉搏跳动。精，是对事物特征理解深透而语言严俭，一针见血，一语破的，一字传神。妙，是文字意味深长，魅力无限，神思飞动，妙语连珠。达，是能求物之妙，而又能了然于心，成竹在胸，再了然于口与手。这些苏文艺术“基因”，在眉山文化界朋友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看到。常使我产生强烈的喜悦。个人平心思忖，觉得方君散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气盛”。孟子讲“养吾浩然之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陆游说：“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觉成虹霓。”气盛，就是激情奔涌给人的力量感，那一泄无余，喷射的词语，读起来就像机关枪子弹出膛般无法停止。我在上文举过的《远景楼月色》第三部分那段具象而精采的描述，可为一例。

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有引领精神的进步的核心价值和超强的审美感受能力。以东坡而言，其节律感应能力使之能“以万物为我”。诗文中闪亮的“博喻”是其表现之一。《远景楼月色》的最后一章：“海上生明月，照我远景楼。朗朗月色中的远景楼，伟岸、端庄、祥和，是除夕夜的团圆饭，是元宵节的红灯笼，是清明节的一炷香，是端午节的雄黄酒，是中秋节的月饼，是重阳节的茱萸，是离人游子的床前明月光，是我们骨子里最温暖的一滴血……”这明显地追步东坡妙丽的博喻精神，而且气盛言宜，自然挥洒，颇为得体。

以上是我读《仰视》后的一些粗浅感受，虽然挂一漏万，然确是面对尊作时才获得的印象。拉杂啰嗦，就此打住。意犹未尽，只有留待他日眉山的茶桌了。

2015 年 11 月 15 日 于川大花园

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 “苏学”开启新征程

## ——眉山市2016年“寿苏会”纪略

熊 莉

1月28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是“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979周年诞辰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隆重举行“寿苏会”。眉山市领导李建章、杨常沙，苏学泰斗、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苏学专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与眉山市部分苏学爱好者齐聚一起，虔诚膜拜、默诵祝词，心香一瓣、致敬先贤。

鉴于三苏祠处于芦山地震灾后保护性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活动主要以座谈会的形式举行。整个活动庄重、简朴，内容丰富，新颖别致，取得了圆满成功。

### “寿苏会”：淬炼灵魂新载体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东坡文化无疑是眉山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品牌。

眉山市委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坚持文化立城、文化立业、文化立人，东坡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的血脉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认真履行市委赋予的研究、创作和发掘、交流三大职能，紧紧围绕眉山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研究和传播并重，积极探索普及苏学的有效途径，持之以恒地为城市发展注入东坡文化元素。“‘寿苏会’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不仅仅是表面文章、形式主义，而是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的有效载体，是普及苏学、塑造城市灵魂的重要场所。”该院院长方永江表示，此次“寿苏会”对眉山强力推进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自南宋以降，苏轼遗址遗迹地陆续开展起“寿苏会”。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扩大，后来，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许多国家也竞相开展

起“寿苏会”。到了苏东坡被评为“世界千年英雄”的时候，毫无疑问地表明，东坡文化已经具备了世界影响力。作为苏轼的故乡，眉山不仅要去做，而且要做得最好！

苏学专家、原眉山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说：“三苏文化研究院邀请苏学同仁共襄‘寿苏’盛典，与他们清明赴苏坟山扫墓，首尾相连，可谓善始善终。这些活动与他们坚持不懈开展的端午、中秋品三苏沙龙，珠联璧合，探索和创新了苏学普及的全新路径，值得发扬光大。”

### 接力棒：传承苏学谱新篇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自1980年9月在眉山成立，特别是眉山市委力主其从川大回迁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眉山市委成立三苏文化研究院作为其专门机构（秘书处），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财政拨出专门工作经费和办刊经费，其凝聚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历届会长、名誉会长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为苏学穷首皓经、奉献一生。他们的率先垂范是苏学研究的宝贵财富，激励一代又一代学人继往开来、不断谱写新的辉煌。

在去年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张志烈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会长一职。理事会选举学会副会长、川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裕锴为新一届学会会长。周裕锴选择此次“寿苏会”履新与眉山同仁见面，寓意良深。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等老专家、老学者多次深情地谈道：“东坡是他们心灵的明灯，他们一生都在替三苏跑腿。三苏祠是他们的文化坐标，来到眉山从不迷失方向。”

周裕锴说：“在眉山市委、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确定的以党政的力量来推动苏学研究的‘眉山模式’，成果显著、人才辈出。眉山在全国苏学研究领域的地位非同一般，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将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秀传统，充分发挥眉山的独特作用，努力把眉山建成全国苏学研究中心、创作中心和资料信息中心。”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原眉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宋明刚语气铿锵地说：“新一代学人在不断成长，这是苏学研究大有希望的关键所在。年富力强的同志接过接力棒，一定会开创苏学研究的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 强阵地：展示苏研新气象

《苏轼研究》季刊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刊，定期出版，免费赠阅苏学专家、学者、有关高校、各大图书馆和广大苏学爱好者，其影响力日益凸显，颇受关注。

此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集思广益办好会刊。“寿苏会”上，与会者畅所欲言，为其发展壮大建言献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原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一语中的：“会刊是一本学术刊物，首先要充分体现严肃性，办出权威性。”

在慰留未果的情况下，鉴于其在学界的号召力和巨大影响，出于对苏学的热爱、对会刊的关心，张志烈先生欣然答应继续担任会刊主编。这是张志烈等学界前辈“扶上马送一程”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一代学人的责任和担当，成为座谈会上最温暖人心的一幕。

“寿苏会”形成共识，眉山学人将按照做好一次规模适度的全国性苏轼学术研讨会、做足两次苏学普及品牌活动、做实三个应用性课题研究、做优四期会刊的要求，扎实推进“1234”工程，把会刊办成学术交流的平台，办成全国苏学研究出人才、出成果的阵地，办成宣传眉山“文化立市”成果和展示眉山苏研实力的窗口。

风雪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瑞雪兆丰年，在迎来 2016 年的第一场雪

后，又迎来了文化巨人苏东坡的诞辰，真可谓吉祥眉山、喜事连连，与会者在交相称赞眉山“十二五”的辉煌成就时，更对“十三五”的美好远景充满憧憬！

熊 莉，眉山日报社记者。

（上接第 57 页）我活得如此超脱，怎么还会神志、气色不全呢？”赵贫子笑着回答：“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体内血气所撑持，抑或社会名义所激发，而并非神情、精神所造就的啊！”第二天，赵贫子又问苏辙：“你的父母还在吗？”苏辙回答：“已亡故多年也。”贫子又问：“你曾经梦见过他们吗？”苏辙回答：“经常梦见啊！”赵贫子再问：“你在梦中知不知道父母早已亡故？抑或以为他们还活着吗？”苏辙回答：“两种情况都有。”贫子说：“父亲、母亲的存亡与否，是不等思考计议就能知道的。若是白天问你，则可以不假思索就能回答；但若是在夜晚梦中，便常常会以为亡故的父母依然健在。生与死，在梦中所见和在醒时所知是会有差别的。世间万物就更复杂，迷惑着你而到了使你难于了解的程度，比知道父母亲的存、亡更难。你自以为精神（神志）健全而不去深入探索、研究，这是令人担忧的事啊！”赵贫子曾经对苏辙讲过的这段话，我（苏轼）也曾听轼辙转述过（“予尝与闻其语”），便将这些话记录下来。

苏轼记录赵贫子与其弟苏辙的“对话录”，居然如此详尽，足见他对“赵贫子语”重视的程度，至少是觉得“此语”不无道理吧。苏轼好学不倦，以人为师，是不论“师”之贵贱的。按照赵贫子的说法，像父母是否还在人间这种近似于“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问题，人若在梦中也常会“迷糊”而弄不清楚，何况世间更复杂的事物给我们造成的迷惑呢！所以，避免故步自封，终生好学不倦，乃是人生遵奉之准则。苏轼所记录的这一番“赵贫子语”，无论对古人、今人，无疑都大有好处。尤其是苏轼不以贫贱论人，即使是地位低贱的乞丐之言，亦详记而且恭谨地学习其话中要义，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效法。

徐 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五）

〔韩〕洪瑀钦

## 二、模拟苏轼的散文及其他

近世朝鲜前期文学理论家成倪<sup>[1]</sup>，写了《题苏东坡墨竹》十绝，其四云：“与可襟胸回出尘，雪堂分得十分新。至今遗迹鹅溪绢，千载知音会有人。”（《虚白堂文集》卷一一）除《题赤壁赋后》（同上，卷四）以外，他还有《拟东坡十论》（《王者不治夷狄》、《春秋定天下邪正》、《儒者可与守成》、《物不可以苟合》、《形势不如德》、《形赏忠厚之至》、《刘恺丁鸿孰贤》、《礼以养人为本》、《好德锡之福》、《重巽以申命》）。韩国文人接受苏轼文学之历史上，取苏轼的散文题目而写的这《拟东坡十论》，在比较文学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原作与拟作，应该精心对照，借以探讨苏轼散文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按现传近世朝鲜前期文献，最初借苏轼诗韵而作诗的文人，是虚白亭洪贵达<sup>[2]</sup>。他留下了《借东坡韵》四首，其第一首云：“黄道高悬白日光，大平歌吹奏伊凉。柳垂平地风吹细，花满佳城露浥香。恭己圣人时令晏，委身多士早衙忙。四方回首烟尘息，拭目行看凤集冈。”（《虚白亭集》卷一）《虚白亭续集》卷三也有《借东坡韵》诗。

除了模拟作文以外，还有借用苏轼的雅号“东坡”一语，来作某一个驿站和旅馆的名称，以表达其羡慕之心。

李荇《慵斋先生集》卷八有《次韵正使次东坡馆韵》，其《东坡馆》（同上）云：“葱岭自与尘凡隔，苏仙昔时遗胜迹。董仙去后今几年，一日溪山复生色。……”

金安国《慕斋集》卷八有《次东坡驿韵》<sup>[3]</sup>：“藩仪罄谨诚，迓诏饰宾馆。揭额岂无因，佳号居一半。三更渐近百里隔，况复江山多胜迹。后有宝山前赤壁，适与东坡值物色。理数契合或感通，地同自令人又同。锦袍手擎彩凤

纶，罗胸星斗文章公。陋邦自是一裨县，敢籍兹名为贄见。珠玑散掷晦外宝，不独声华震禹甸。吁嗟何幸于身亲见之，抠衣愿质胸中疑（东坡馆西有宝山，馆东有石壁临江，皆苏公故事）。”近世朝鲜后期文人朴世采（1631～1695），也作了一首《东坡驿有感》。

## 第五节 近世朝鲜中期文坛接受苏轼文学的影响

近世朝鲜前期，遵奉建国理念（性理之学）之士大夫文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实践君君臣臣之义理，故当王权篡夺之祸和各种不义之士祸时，不免遭到削夺官职，流配贬谪，斩首示众，剖棺斩尸等酷刑。在这里，畿湖人徐敬德（1489～1546）、岭南人李彦迪（1491～1553）等性理学者，不得不将实践性理学之节义精神，转换为以学问为主的探究理气之性理学。结果，李滉（1501～1570）、曹植（1501～1572）、李珥（1536～1584）、奇大升（1527～1572）等研究理气很活跃，而朝鲜性理学实是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期。纯粹文学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受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和李廷龟、申钦、张维、李植等所谓朝鲜中期古文四大家和受容唐诗风的崔庆昌、白光弘、李达等所谓三唐诗人，都是这个时期的文人。所以，文学史家把这个时期称为“穆陵盛世”。但是，1592年，突发日本来侵之壬辰倭乱，约七年间的国难，使朝鲜王朝直面风前灯火之危机。

这种矛盾和混乱时代背景下的朝鲜中期文人，对苏轼文学之关心，比前代文人略有逊色。而另有些人对苏轼仍有很深的情结，他们受苏轼影响的痕迹大概如下。

李滉，号退溪，岭南礼安人，代表朝鲜中

期的文臣，性理学者。其《退溪文集》第一卷，有《湖堂梅花暮春始开用东坡韵》二首、《湖堂晓起用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韵》、《晨至溪庄，偶记东坡新城途中诗，用其韵》二首、《二乐楼次东坡黄楼诗韵》、《拜聋岩先生，令侍儿歌东坡月夜饮杏花下诗，次其韵示之，混亦奉和呈上》、《十一夜陪聋岩先生月下饮酒杏花下用东坡韵》等几首次东坡韵诗。值得注意的是有次东坡韵的诗，而没有有关赤壁船游之故事。那原因，可能与李混以穷究理性为主的道学世界观有一定关系。

可是金奉祖、尹善道就有不少追慕赤壁风流之痕迹。金奉祖（1572～1630），号鹤湖，近世朝鲜学者，文人，柳成龙之门人，有《鹤湖集》。《鹤湖集》（韩国文集丛刊第八十集）卷一，有模拟赤壁风流的《七月既望泛舟江城壁下》：“千载苏仙赤壁游，初秋既望泛中流，佳莘清兴无今古，月色波光满一舟（江城旧名赤壁）。”

尹善道（1587～1671），号孤山，近世朝鲜中期文臣，经过壬辰倭乱以后，在全罗南道海南，闻国王降伏于清军之消息，深感耻辱，在放舟向济州道的海上，发现甫吉岛的秀丽风光，而定住那无人岛。他称其定住地为“芙蓉洞”，花了莫大的财产，建立以乐书斋为主的12栋楼亭，充满浪漫风流。官至礼曹参议，著有《孤山遗稿》。在《孤山遗稿》卷一，有下面的几首诗：

《次韵酬李季夏赤壁歌》：“野城逸人申夫子，宿昔一见欣相遇。谓我县西有赤壁，其下澄江如练布。苏仙仙去已千年，今世何人肯相顾。江上秋光方准备，江神应要具眼睹。……造物不许支大厦，赤壁之游已分付。天仙游戏浮沔间，几时乘槎上银浦。……君不见苏仙只携洞箫客，当年不及今日趣。君不见渺渺余怀望美人，今日宛踏当年步。此地谁为后来者，后视今如今视古。”

《又用前韵（同年）》：“赤壁自古争战地，风流偶与苏仙遇。如无苏仙前后赋，岂得佳名天下布。乃知江山如冀马，增价要须白乐顾。至今人咏桂棹歌，万顷茫然如目睹。……此地闻有小赤壁，千仞断崖映秋浦。……江流纵非接天波，节序依旧横江露。地之大小何足较，我与坡老同心素。……九原可知论此诗，赤壁

始知无今古。”

《季夏用前韵赋临镜台，又次》：“自知坡翁穷迫出天赋，肯效柳子反贺兹兵遇，我爱胜地如美女，求之有如蚩蚩来抱布。胜地以我为知音，又如鸣箏欲得周郎顾。虽然不有投闲遣谪时，海外绝境奇秀何由睹。……”

从传下来的资料看，朝鲜中期文人当中，真正憧憬苏轼《赤壁赋》的艺术世界而创造自己艺术的文人，可能只有尹善道一人而已。

## 第六节 近世朝鲜后期文坛接受苏轼文学的影响

近世朝鲜后期，是对性理学的反省时代。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等外患以后，学术界和文坛开始批判不能解除国难的性理学的空论性。他们认为性理学不过是虚荒无实的空洞理论，故以它为精神武装之朝鲜中期的各界各层，不管哪一个阶层或者是集团，都不能对付外势侵略，终使国家不免倭贼和胡兵的侵攻。不但如此，到了这个时候，从中国清朝传入了重视证据的训诂考证学的学问研究方法和西洋科学文明之消息；1794年，清国神父周文谟依北京天主教主教的命令，到朝鲜汉城展开宣教活动，让还在性理学梦幻里彷徨的朝鲜人，真是一个使之觉醒的灵丹。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形成了排斥“空理空论”，追求“实事求是”的各种学派。

所谓经世致用学派有柳馨远（1622～1673）、李翼（1681～1763）、丁若镛（1762～1836）；厚生学派有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朴齐家（1750～1805）；训诂考证学派有安鼎福（1712～1791）、柳得恭（1749～？）、金正喜（1786～1856）；接受苏轼文学而达到了三绝境界的申纬（1769～1845）和金泽荣（1850～1727）、李建昌（1852～1898）、黄玗（1855～1910）等，他们是朝鲜后期代表性的文人。

在朝鲜后期文坛，接受苏轼文学影响的现象大概如下：

### 一、沉醉于苏轼文学的申纬

申纬（1769～1845），号紫霞，或云警修堂，与清朝翁方纲交游而受到他的影响，私淑苏轼，



为近世朝鲜后期的最大诗人，兼攻书、画，世称三绝，著有《警修堂全稿》。他学近世朝鲜前期李荇、朴闾等词章派文人，酷好苏轼，学习其富有新意之艺术精神和技巧，而完成自己艺术的境界。

我们先看申纬对苏轼的生平和文集了解的深度。其《余所藏东坡文字旧有全集、王注、施注、查注四种，又得覃溪补注及〈海外集〉二种，兹集之聚，殆无遗憾，喜而有述，凡四百一十字》（《申纬全集》太学社第一集）云：“我有苏集癖。大小种三四。大固味全鼎，小亦废歌芟。梅溪始注诗，犹有踳驳议。分门最其失，恐非王氏志。旧分五十门，卷为三十二。因袭或为咎，细究岂无自。八注与十注，怵望空予跂。尧卿及子西，重复沈黄暨。皆今所未传，义例嗟永闭。兹集注最难，放翁言之亟。施注从编年，善本称无愧。后出者虽巧，踵前或多利。苏氏之功臣，王氏争座位。商邱补施阙，两家太轩轻。我当跋宋槧，面目今颇异。复出固可散，冗龙岂轻弃。查注录其删，用意颇密致。笺疏不肯同，无乃各立帜。可恨子湘辈，潦草于藏事。竟使初白庵，补缀得自庇。附见同时作，注家之独至。《坡门酬唱集》，邵浩已发秘。和陶例编年，足为全书累。年月虽确指，分编意不类。翁注最后出，补查所未备。古书勤摭拾，援证资一字。雪衣证墨迹，精核无与比。诸书聚次第，并蓄方快意。得失互考镜，一一皆心醉。近得《海外集》，发凡有别致。首尾居僭书，再以琼海侧。海外字包得，集名始完粹。樊庶也奇士，兹刻非俗吏。老杜入蜀余，长公海外次。笔墨一翻跌，洞天辟深翠。拈出全集内，后学表以示。于一峰一岛，提挈山海邃。文章得滋味，一嚼胜齑馐。犹读佛藏者，《阿含》小品始。公灵散诸集，譬如水在地。酌之无大小，吾所皆拾坠。层叠新旧签，红白间妩媚。拥此足以豪，何物可希觊。庆我文字缘，入杜闻精义。”

可见申纬热诚地收藏苏轼文集及诸家苏诗注，对照其异同长短，探索一字一句里的东坡心灵，所以，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醉心于苏轼艺术。

《七月既望召阳江泛舟》（同上）：“元丰壬戌秋，后七百余年。既望风月笛，借载貌人船。

壬戌不必同，公我两适然。”从“公我两适然”，可以知道申纬这个伟大诗人为甚么写了那么多的有关苏轼的作品，如：

《申纬全集》（太学社第一集）：《寄男彭石用坡公韵》、《早春煮雪点茶，偶读东坡病中大雪答赵荐诗》、《五月九日雨后草坪至林溪看水田次东坡韵》、《涵思堂用东坡韵》、《十二月十九日重摹赵松雪画东坡遗像》、《戏题男彭石和东坡像》、《雨蕉筱斋见和东坡生日韵，复此寄谢》、《七月十三日夜同人雅集，拈东坡韵》、《郑清州社谷新第，同人招集，拈东坡韵》、《题东坡逸诗后（并序）》、《寒食后一日，看雨无聊，偶阅坡公黄州寒食诗帖》、《闲步亭歌送李鲁卿赴任象山，次东坡韵》。

《申纬全集》第三集：《读东坡和陶诗》、《十二月十九日之翌日，追作坡公生日》、《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余适恩补海上》、《论诗用坡公答孔武仲韵》五首、《三月三日杏花下用坡公定惠院月夜韵》、《次韵坡公谪居三适诗》三首、《滨行喜雨次坡公西斋诗韵聊以见志》、《哭醒仙老侍郎用坡公韵》三首、《腊十九日作，坡公生日有诗》。

《申纬全集》第四集：《次韵答荷裳雨中闲居用坡公韵见寄二诗》、《梦拜青莲、东坡二公像，觉而记之》、《赵文敏小楷〈赤壁赋〉，字仅如蝇头，题此二首》、《腊十九坡公生日，用墨农进士所视轴中韵》、《翌日蕉砚追作坡公生日诗寄来为谢答》、《绛雪与内翰灯下阅坡集〈传神记〉，使人就影画之，不作眉目，宛是一绛雪，遂题五绝句寄示，即用原韵》、《七月既望病中月明》、《七月既望碧庐舫对月》、《余一生诗盟在由苏入社》、《秋七月既望，又是壬戌日也，竟夜耐畅，共赋》、《渊泉老尚书留约闰七月既望泛舟同游》、《羹河豚，晚饭作》（“碧芦舫子芦芽短，正是河豚腴味佳。饱食缓行日亭午，杏花一簇红映阶”）、《秋七月既望，从孙杭与客游于东湖之奉恩寺》、《记昔余闰七月既望东湖之游有感》、《覃溪临东坡天际乌云帖奉圣旨公跋有诗》。

由以上资料可看出，这“一生诗盟在由苏入社”的申纬，可以说是近世朝鲜后期文坛苏轼文学的最大专家。

（下转第 77 页）

## 冷成金老师教学研究散记

马 蓉 董宇宇

冷成金老师于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增补为博士生导师，今年是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执教的第25个年头。

问起他研治苏轼的历史，却还要稍长一些。他早年就醉心苏轼，后入苏学大家朱靖华先生门下攻读硕士，随朱先生研究苏轼，算来已28年有余。

这些年来，冷老师发表的苏轼研究的相关论文有数十篇，著作多部。在多年的研究中，冷老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苏轼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史料为基础，以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哲学精神为指导，并融入西方哲学文化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揭示苏轼其人其文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对苏轼与苏学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冷成金老师对苏轼的研究成绩体现在很多方面。冷老师早年对苏轼人格特征有深入的揭示。冷成金先生指出苏轼的人格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早期的一般士大夫人格、黄州时期的自由人格与岭海时期的天地境界，他的论文《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话的走向及其意义》等以苏轼的生命历程与其诗文互为佐证，有力地诠释了苏轼不同时期的人格特征。苏轼的自由人格是指“君子无党”，正道直行，摆脱了现实政治派别、个人利益羁绊的自由，用苏轼的话讲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主要体现在黄州时期。天地境界是超现实的审美人格，体现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思我无所思”）而不在于目的（“吾生本无待”），以现象为本体，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契合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神，最

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用苏轼的话讲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中国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合理性，这种人格主要体现在岭海时期。

冷老师在对苏轼哲学思想和文艺观的研究方面有着重要建树。他先后发表了《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等论文，后来更出版了重要专著《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在这些论著中，冷老师分析了《东坡易传》的宇宙生成论、存在论等，提出了苏轼哲学思想中的“情本论”观点；在对俗常的文艺思想的研究中，提出了苏轼的“不能不为之”的心灵本原论、“无不尽意”的审美本体论、“诗是穷人物”的文艺本质论、“冲口而出”和“随物赋形”的创作方法论、“有道有艺”和“辞达”的艺术创作的表现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艺术精神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论、“寓意于物”的审美鉴赏论等系统观点。这些观点将苏轼哲学观、文艺观以及人格研究系统化，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冷老师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史哲互证，在这种互证中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精神和文学作品的真义，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等。这些文章初步探讨了中国诗词解释学的基本理论，为解释包括苏轼诗词在内的中国诗词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作为学生，我们很希望老师经常带我们出去开

会，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冷老师似乎没有出去开过会，也不见他有什么人际交往。我们有时也忍不住问起，老师的回答很简单：“没有时间。”但冷老师在苏轼研究上向来舍得花时间，他主持并参与主编的同人学术辑刊《中国苏轼研究》迄今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5辑，第6辑的稿件正在征集编辑中。该刊为繁荣苏轼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术之外，冷老师对弘扬东坡精神也不遗余力。2004年，冷老师受国家广电总局及制片方之邀签约成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44集电视剧《苏东坡》的第一编剧，经过艰苦的创作与修改，该剧于2008年拍摄完毕，自2009年起先后在东南卫视等多家电视台播出。该剧引起很大反响，被广电总局推荐为当年的四部优秀电视剧之一，后被网友评为中国梦题材剧，《光明日报》等媒体专门举办座谈会，《人民日报》对冷老师进行了专访。对这部电视剧，从剧本创作到导演、演员选定，甚至到后期制作和播出，诸多事宜冷老师无不亲力亲为，可谓有呕心沥血之劳。2014年，根据剧本改编的小说《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出版，全书八十余万字，充分表现苏东坡的“不惟上，不惟权，不惟书，不惟古；只惟民、惟实、惟善、惟美”的“文士道”精神，生动地诠释了苏轼的文化人格。该书出版后，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先生为苏轼治学术，做小说，拍电视剧，苏轼研究已然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冷老师在教学上也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些年来出版并修订的主要教材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唐诗宋词研究》，这些教材站在学术的前沿，反应了新时代的科研成果，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冷老师还参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马工程”项目《中国美学史》（隋唐五代部分）等多部教材，另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唐诗宋词审美类型”（6讲）在“爱课程”网上线。多年来，冷老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唐至北宋文学的嬗变”和教育部博士点项目“宋代理学的演进与文学的理性化进程”，现在主持着国家社科项目“唐诗宋词审美类型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项目“中国古代诗词悲剧意识研究”等。

冷老师经常给学生讲苏东坡，讲诗词，讲先秦诸子，常是座无虚席。先生的课堂堪称校园里的一道风景，老师上课从来不用讲稿，“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老师的课讲知识，但以深情为底蕴。人大的校园媒体曾经整理了老师课堂上的一些妙语记为《冷子语录》，在同学们中间广为流传。学生说冷老师的课是最轻松的课，也是最难的课，因为老师的课趣味性很强，但问题意识和思辨性更强，学生笑言：“上冷老师的课能把我们的脑汁绞干净。”2009年，冷成金老师被搜狐教育评为全国中文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之一，2010年又被评为各省市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之一。

跟冷老师读书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难事。老师待我们这些学生亲切随和，关怀备至，但要求颇严，期许颇高。先生屡言：“治古代文学要有高僧大德的情怀，非发大宏愿不可。”弟子克尽精诚，惟愿不负先生所望。

马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董宇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

#### （上接第75页）

#### 注释

〔1〕 成侃（1439~1504），号慵斋或云虚白堂，近世朝鲜前期文臣，与柳子光著《乐学轨范》，著有《慵斋丛话》、《虚白堂集》。

〔2〕 洪贵达（1438~1054），号虚白亭，近世朝鲜前期文臣，依王命著《续国朝宝鉴》、《历代明鉴》等书，官至成均馆大提举，有《虚白亭集》。

〔3〕 金安国（1487~1543），号慕斋，近世朝鲜前期文臣，大学者，官至大提学，有《慕斋集》。

韩洪瑀，韩国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 寻访湖州苏轼遗迹

刘清泉

湖州曾经让苏轼流连忘返、声名鹊起，亦让苏轼失魂落魄、不堪回首，它影响了苏轼的生命走向、形态和能量，是他成为一代文化家的关键节点。从事苏轼研究的学者，恐怕没有不想去湖州的冲动。由眉山市地方志办牵线，十月下旬我如约而至湖州，寻访苏轼遗迹。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湖州市地方志办小姚的陪同下，我和欧忠剑直奔衣裳街馆驿河头139号而去，因为那里有霅溪馆。

霅溪上横跨青莲桥，过桥即见对面墙壁处有“东坡会友”雕塑，刻石曰：“北宋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由杭州通判升迁密州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任湖州知州李常、著名词人张先等六人聚宴，张先有《六客词》记叙这次雅会。他们在碧澜堂欢聚畅饮、吟诗赋词。时隔十五年，苏轼再次来湖，又宴于碧澜堂，仍是六客对酒当歌，只是座上之人除苏轼外，前六客中五人俱已仙逝。苏轼触景生情、悲喜交集，酒酣思故旧，作《定风波·后六客词》。”墙边苏轼的塑像，与真人相仿佛，左手举杯，翘首望月似的。壁上为五客的浮雕，帷屋之内，佳肴上桌，五客围坐，把酒欲饮。此情此景，可知苏轼并非举杯望月，乃举杯相邀也。草木映衬，石块点缀，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我们皆作举杯状，与苏轼塑像合影留念。

塑像左手就是当年的馆驿码头，现在废弃不用，临河修建牌坊，四柱三门，中间门额镌刻三字“霅溪馆”，中间两柱有对联曰：“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临河停泊着一些船只。伫立凝视，我们仿佛看见了当年熙熙攘攘的码头，以及苏轼上下码头的身影和惊魂一刻的情景。与牌坊相对十步，有古建筑，门外匾曰：霅溪馆，门内匾曰：碧澜堂，这是什么缘故呢？“霅溪馆原址在对岸的白苹洲，乃晋吴兴太守谢安故宅，已有1640年左右的历史。唐大历九年（774）刺史颜真卿命名为

霅溪馆，唐大中四年（850）刺史杜牧重修命名为碧澜堂。光启元年（885）毁坏，后在馆驿河头重修，现存建筑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重建，同治、光绪年间重修，2009年整修。2013年作为‘湖州古代贤守纪念馆’，以纪念王羲之、谢安、柳恽、颜真卿、杜牧、孙觉、苏轼、王十朋、陈幼学、劳钺十大湖州贤守。”讲解员还告诉我们说，“这里只有一名讲解员，今天休假，我是‘赵孟頫故居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混迹于十大贤守之中的苏轼让我有些许感慨，但讲解员专门过来为我们讲解颇令我感动。我问小姚：“这里距离湖州府衙有多远？”他说：“大约五六百米吧。”

之后，我们顺着河流前往五百米之外的骆驼桥拍照。开车经过时，小姚曾提示我们，这就是骆驼桥。车虽一晃而过，仍见桥头的不锈钢骆驼造像。桥虽普通，却名噪一时。当年苏轼被拘拿，湖州百姓不约而同地纷纷来到此桥及霅溪两岸。有的拿酒坛，有的拿海碗，有的拿香烛……在桥上、岸边摆满香案，为他们敬重的太守哭祷，一时沸沸扬扬，让官差们心惊胆寒。伫立岸边，我不禁想到，上午在湖州市地方志办座谈时，老主任余方德研究员说的关于“刑不上大夫”的话。他说一些有关“乌台诗案”的插图或者文字，描写苏轼被捕受枷锁、勘问遭鞭打，我以为是不恰当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以苏轼的官职，是不能上刑的。杨伟民主任说，湖州城内河流众多、水网密布，当时美其名曰：水晶宫。许多住宅临河而建，许多商铺伸向河面，来往船只购物，需要用提篮把银两吊上来、把货物放下去，故有此称。

接着，我们驱车前往下一个景点：飞英公园。

那儿有飞英塔，苏轼曾两次登临，有“忽见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句。苏轼游飞英寺还有一个故事：那一天，他乘船绕城观赏荷花，又登上南郊的岷山亭，傍晚才转到城北



的飞英寺。主持一听苏轼到了，急忙撞钟集合众僧出来迎接。慌忙之中，竟然有人把衣服穿颠倒了。苏轼并不见怪，在诗中写道：“我来无时节，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由此可见，他并不喜欢前呼后拥、夹道欢迎的形式。据说，飞英塔是唯一一座“塔中塔”，内塔为唐代石塔，外塔为宋代木塔。登塔的木梯，仅能容一人上下，极其狭窄陡峭，我与欧忠剑手脚并用，拾阶而上，累得气喘吁吁。上到最高层，极目远眺，湖州城尽收眼底，不亦快哉！飞英塔与飞英堂之间有一荷塘，已没有“荷背风翻白，莲腮雨退红”的美景了，因为那些荷叶早已凋敝，但“留得残荷听雨声”耳。

在小姚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墨妙亭。它掩映在浓郁的树阴中，此亭原址在湖州府衙旁边，现移建于此。后人为纪念“六客”雅集，在湖州府衙旁建“六客堂”，现亦移建于公园一角，称“六客堂茶艺馆”。因时间太紧，我们没有进去品茗。

然后，我们驱车前往下一个景点：爱山台。这里是古代湖州府衙所在地。

在四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这个广场显得十分渺小，而那个山头亦显得不像山头。不过，在古木参天的山头，还保留着爱山台遗址。五个长方体黄石拼接起来的石台子，大约十米长、一米宽、零点四米高吧，这就是爱山台吗？我有些疑惑。小姚介绍说：“宋代郡丞汪泰亨取苏轼诗‘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之意而建筑‘爱山台’以怀念苏轼。这里便是爱山台遗址。爱山广场、爱山小学、爱山街的名称，皆由此而来。”“呵呵！原来如此。”

在爱山台一侧有苏轼“醉乌程酒”塑像。“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罪”的苏轼，身着官服，瘫坐地上，侧倚酒坛，左肘靠在倾倒的大酒坛上，右手捏着倾侧的大酒碗边，闭目而憩，醉态尽现。坛口有流水哗哗而出，仿佛乌程之美酒“若下春”，千年流不尽呢。另一侧有爱山广场，广场四周绿树成荫、花卉满圃，是市民休闲之所。紧挨爱山台一侧还有纪念苏轼的建筑雕塑：湖颖桥。

大约四点半吧，杨主任也来陪同我们考察。我们驱车前往太湖边的卞山支峰黄龙山，寻访黄龙洞。可是，一路走来，却找不到标志。杨主任下车去询问，才知原来走过头了，倒回去寻找，才见到那个路口，可是被大铁门锁着。

我们从旁边进入，即见一巨大的石头上篆刻

“金井洞山”四个红色大字。金井洞即黄龙洞也。

沿着水泥路面步行深入五六百米，只见山岭逶迤，山峰巍峨，山下草木葱茏、树木成林，山中灌木丛生、岩石裸露，山顶白云缭绕、雾气腾腾。峭壁上那些裸露的怪石，乃山之峥嵘面目也。我们在山下寻到了几个岩洞。有一个显得古老，洞前有石凳，洞口有铁门，洞顶有篆刻：黄龙洞天。有一个显得稍新，也有铁门，杨主任说是水泥厂采矿留下的。还有一个洞口，灌木丛生，无法涉足。

黄龙山有众多的岩洞，山下有，山腰有，山上亦有，整座山就仿佛是空心似的。苏轼当年去祭祀、祈祷的黄龙洞，是山顶的那个岩洞，据说那才是黄龙经常出没之所。我们没有上山去，据苏轼诗描写可知，黝黑的洞口云烟如盖、空旷的山谷雾气茫茫、蜿蜒的泉水赴壑隐没、惊飞的蝙蝠胡乱飞窜。那是怎样一个神秘莫测的洞啊！

据明张睿卿《游黄龙洞记》载，苏轼上任时，因久旱不雨，曾到黄龙洞求雨；后久雨不晴，又到黄龙洞祈晴。第一次来湖州途中，苏轼有感而作《吴中田妇叹》为民请命。湖州人深表感激，在黄龙洞附近建“东坡祠堂”祭祀。万历二十年（1572），张睿卿在草丛中找到石刻残碑，可见“东坡祠祠堂碑记”等字样。

天色渐暗，我们便原路返回。杨主任和小姚见路边的那些牛羊一样的石头，便过去绕着看，这些就是所谓的太湖石了。他们想选一个载回去，放在即将建成的方志馆里作为景观石呢。

苏轼不下五次来到湖州，其足迹所至还有道场山、何山、岷山、西塞山、苏湾、学士山等等，因行程关系，无法一一前往，甚为遗憾！尤其是道场山、何山，驱车匆匆赶来的尧军先生，甚至趁着夜色也上道场山溜达一圈，以尽雅兴。

我们驱车前往太湖滨的渔人码头“湖滨世家”用餐，顺便远观了月亮形状似的“月亮酒店”，可谓湖州的标志性建筑。苏轼诗云“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运肘风生看斫脍，随刀雪落惊飞缕”（《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其三），餐桌上的“太湖三白”，让我们领略了苏轼垂涎的斫脍白鱼，其言不假。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 “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实践”征文启事

由眉山市法学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东坡司法法学研究所承办，眉山市人民检察院、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眉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四川省佳汇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协办的“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实践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四川眉山举行（具体时间、地点以正式邀请函为准），热忱欢迎您届时携大作光临。

为此面向全国学者、实务工作者和爱好者征集论文。

### 一、征文范围

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部门、苏轼遗址地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法学、法律实务工作者和有志于苏轼法治思想研究的社会人士。

### 二、征文主题

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地方法治建设实践

### 三、征文时间

征文时间从征文启事刊出之日起到2016年9月26日止。稿件请发送到东坡司法法学研究所秘书处徐倩电子邮箱：[chopinxsq@163.com](mailto:chopinxsq@163.com)。

###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作者可围绕论坛主题自拟题目。内容须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深入、逻辑严密、语法规范，着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论文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剽窃，坚持原创，确保能符合学术不端检测要求，避免著作权纠纷；内容提要50~100字，关键词3~5个，注释采用尾注；页面设置：A4纸，题目2号黑体，正文5号宋体。在稿件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尾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QQ，以便联系。主办者将在10月上旬根据论文质量和作者情况，发正式邀请函参加论坛交流大会。优秀参会论文将结集公开出版并在《苏轼研究》、《眉山法学》、《眉州学刊》等刊物上刊发。

### 五、会务联系

东坡司法法学研究所秘书处：徐倩电话  
13696089306

通讯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眉州大道东二段2号，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徐倩收。邮政编码：620020。

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实践论坛组委会

2016年3月10日

## 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月28日，苏轼诞辰979周年“寿苏会”活动之际，召开了苏轼研究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名誉会长邱俊鹏、张志烈、曾枣庄，会长周裕锴，副会长苏灿、宋明刚，秘书长方永江，副秘书长刘清泉，理事杨常沙、张忠全、赖正和、刘小川、尧军等参加了会议。

学会常务副会长苏灿总结了上一届学会工作。学会秘书长方永江重申了秘书处服务学会、服务苏学的宗旨，提出了大力开展普及活动的构想。老会长张志烈教授表示，只要自己还跑得动，将继续为东坡跑腿。新会长周裕锴教授提出，要重视信息平台建设，加强网站建设，开通微博空间，吸引年轻

群体和海外群体加入学会。

会议决定立即开通微博“苏轼研究学会”，主要用于发布学会会员的研究活动、研究成果、纪念活动、学术会议、学术机构等有关信息。学会理事张忠全提出在四川大学学者中发展新生力量，增加眉山本地和外地理事的数量，以扩大学会的队伍和学会的影响。曾枣庄教授提出在全国征集收藏苏轼研究论文、专著，并发放收藏证书。其他与会人员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袁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副主任。